

目 录

呼伦贝尔区域的形成

-花赛·都嘎尔扎布 宝敦古德·阿必德 (1)
- 从甘珠尔庙集会到那达幕大会.....花赛·都嘎尔扎布 (6)
- 昔日海拉尔的“八大家”.....何德全 (12)
- 时轮金刚曼陀罗庙.....伊克忠·乌力吉木日图 (19)
- 甘珠尔庙的喇嘛职称与收入分配.....花赛·都嘎尔扎布 (23)
- 达斡尔民族迁入扎兰屯地区的经过.....包德华 (26)
- 布利亚特蒙古人迁入呼伦贝尔简记.....宝敦古德·阿必德 (29)
- 巴尔虎人的传统习惯.....伊和忠·占其布 (34)
- 巴布扎布事略.....正珠尔扎布 (38)
- 丁巳年动乱.....达喜僧格 (42)
- 色布精额匪帮侵入海拉尔始末.....阿·恩克巴图 (46)
- 仁钦道尔吉的部分罪恶事实.....萨·哈木苏荣 (52)
- 扎赉诺尔煤矿第一个工会的诞生.....何德全 (58)
- “九·一八”事变后，苏炳文军队在海拉尔的抗日活动
.....于家田 (64)
- 伪满兴安东省的成立经过.....巴达荣嘎 (68)
- 修筑海拉尔北山要塞劳工的悲惨生活.....张玉普口述
张福祥整理 (72)
- 日寇对鄂温克族猎民的统治
.....阿力克山德·伊那见基·库德林口述 玛妮整理 (75)
- 将军庙在诺门汉战争中被毁情景.....高其德·玛格苏尔 (78)
- 日寇残害掠夺牧民的罪行.....安布拉 (81)
- 凌升之死.....阿·恩克巴图 (84)
- 我所知道的日本大特务寺田利光.....宝敦古德·阿必德 (87)
- 忆海拉尔第二国民高等学校的始末.....童泽远 (91)

- 抗日联军奇袭伪格尼努图克……耿天乙口述 曾庆丰整理 (96)
- 抗日联军在伊列克得活动的一、二件事……许长华 (99)
- 抗日联军路经郭恩、卡布楚两屯的情景……^{敖立山等人口述}
敖顺整理 (101)
- 抗日联军在郭尼屯和日本鬼子浴血奋战的回忆
……敖长青口述 敖顺整理 (104)
- 记抗日时期盖山和与汪海的事迹……王淑珍 (108)
- 伪满第十军管区所属部队投降苏联红军前后情况
……正珠尔扎布 (111)
- 蒙古自卫军五旅参加解放齐齐哈尔市战役的前后……鄂秀峰 (116)
- 参加内蒙古自卫军五师及一些战斗情况的回忆
……姚凤贤口述 王平整理 (122)
- 鄂温克族自治旗解放前后的情况……宝敦古德·阿必德 (127)
- “九·三”后扎兰屯地区情况……包德华 (132)
- 解放初期《呼伦贝尔报》(蒙文版)出版情况……杨·布图格其 (135)

四个旗，居住于喀尔喀边界至哈拉哈河。达日岗嘎马场，付给足够3,000名壮丁生活的的生活资料，即每人骡马5匹，乳牛3头、母羊30只。并按察哈尔地区同样的赏赐，给总管马10匹、乳牛10头、羊80只，副总管马和乳牛各8头、羊60只，佐领马和乳牛各7头，羊50只，骁骑校马和乳牛各6头、羊40只。共给了马15,734匹，牛9,734头（每头乳牛按五两银子计算，共付买乳牛价银48,685两），羊95,140只。

(2) 巴尔虎人虽分住在喀尔喀各扎萨克旗，终因不合，1731年，一部分人跑到俄罗斯。俄罗斯不收，送回来后，把带头出走的气勒迪，以法处决，其余达日等民众免罪，仍住在原地。1733年，喀尔喀贝子章奇布多尔吉、管理巴尔虎旗章京车仁，及其亲戚都固尔等，被征入伍时候，因贝子章奇布多尔吉辱骂他们，而有了仇恨，到额尔德尼昭军营后，请求志愿编入旗，被皇帝批准后，于1734年7月，移居到呼伦贝尔，又调查新移来的巴尔虎，除了超龄者外，又选出（包括15岁小孩在内的）3,984名男子，从中将2400名壮丁按每索木领催6名，披甲各54名进行安置。每个旗为5个佐，共编50个佐、八个旗、两个翼。并给每户搬家费银10两。

(3) 雍正10年（1732年），原额鲁特大臣色布腾说，你们两个佐的群众，新来的乌梁海们，居住于地区辽阔、水草丰美的呼伦贝尔海拉尔河附近地方。因而色布腾大为欢幸，派佐领那木吉勒等，看了地点后说，赏给了我们好地方，我们应各自安家立业。因为他们都愿意住下去，由户部拨给一千两银，为安家之费。

乾隆55年（1790年），把杜尔伯特部台吉布图库、布仁、德木其一、白勒嘎斯、嘎勒咋特部台吉达喜哲格伯，明嘎特部德木其布朱日等三部的额鲁特，与旧额鲁特两个佐合并。

这样，原在呼伦贝尔有索伦、巴尔虎、达斡尔八个旗，50

个佐，壮丁3000名；额鲁特两个佐，壮丁100名；新巴尔虎八个旗，40个佐，壮丁2,4000名。总编制为，总管5名、副总管17名、佐领92名、骁骑校92名、十长2名。后改为壮丁2000名、总管5名、副总管8名、佐领50名、骁骑校50名、十长2名、笔贴式2名。

(4) 光绪20年(1894年)，黑龙江将军增祺奏准收拢管理鄂伦春壮丁等变通章程案，裁撤部分原设兴安城的鄂伦春总管、副总管，于黑龙江、莫尔根、布特哈、呼伦贝尔四城，各填设协领一员，专管鄂伦春事宜，呼伦贝尔设有协领，其原设之托河路一路两佐划归呼伦贝尔副都统管辖。

(5) 布利亚特蒙古人于1922年迁到呼伦贝尔，在锡尼河地方，建立了布利亚特旗，管内设四个佐，任旗长一名、副旗长一名、佐领四名、骁骑校四名、宝什格(领催)16名。嗣后，由于布利亚特人越来越多，于1929年春扩大了旗的组织，置总管一名，副总管两名、佐领8名、骁骑校8名、宝什格32名。当时布利亚特旗总人口有三千人。

(6) 1922年从苏联移来鄂温克(通古斯)人，共500多人，归索伦左翼管辖，划为两个佐外，有一部分归了布利亚特旗的第四佐。

上述情况是从1730年到1930年，二百年来呼伦贝尔的形成经过。

三、行政机构

(1) 呼伦贝尔是施行满清内属八旗制的地方，因此，它不属于盟、部，是清朝中央政府直接统制的行政单位。

雍正十一年至乾隆八年(1733—1743年)的十年间，由察哈尔旗兼管，同时由京城派特使统管这些地方。

乾隆八年(1743年)，内务大臣讷钦公、宝迪将军等奏请，改由黑龙江将军管辖，时至1932年的一百八十余年

内，一直归黑龙江管辖。

(2) 乾隆八年(1743年)，停止了由京城派特使，改派一名副都统衔总管统治呼伦贝尔。

光绪七年(1881年)，丁国将军奏请副都统衔总管制改为副都统制。并任命沙格信为副都统。此后的50年间(大约1911—1918年)施行过道、县制外，一直到1932年，基本上施行了副都统制。

(3) 副都统府的组织机构主要有：

1、印务处：其主要任务是掌管副都统官印，以副都统名义上报下达文件，或由左右两厅报来对外联系文件稿时，由笔贴式上交副都统审阅，批准后返交各厅誊写，然后笔贴式向副都统取钥匙打开印鉴盒，盖完印后将钥匙交还给副都统。

2、右厅主管工作为：管理土地、水源；执法审理案件；任免地方官员；掌管征兵、武器弹药；军马饷粮；办理行牧区旅商许可、征收税捐等等。

3、左厅主管工作为：财政收入计划；教育事业；户口和副都统府官员及公立学校；部队官兵的薪饷等等。各厅有厅长外，又有若干名助理人员。

最初，该府官员编制须经将军衙门上奏皇帝批准才定。根据历史记载，该衙门设蒙文和满文正笔贴式各二人。其中，由京城派驻大臣时，理藩院派驻蒙文翻译笔贴式一人处理公事。

同治十二年(1873年)，德银将军上奏后，左右两厅增设正笔贴式两人。光绪七年(1881年)，由将军衙门上报增设领原俸禄的正笔贴式四人，其中两人派驻印务处办公。该衙门还设副笔贴式六人。光绪七年(1881年)，由将军衙门上报，给印务处及左右两厅各增设两名，计六名副笔贴式。此外，在副都统府义务服务的有办事人员五十人，当差的(勤杂人员)十七人，胡甲其(类似法医)十七人，这些人员分三个班，每月轮流驻在，处理文件及其它公务。邮递人员每月十七人，由各

旗索木抽调，轮流驻在。

以上是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组织机构及其变迁的简况。

从甘珠尔庙集会到那达幕大会

花寮·都嘎尔扎布

呼伦贝尔盟那达幕这个名词，是从1948年秋季开始称呼的，原来叫甘珠尔集会，

新巴尔虎僧俗佛教徒，因渴望供奉甘珠尔经，呈请清政府赐予。乾隆六年（辛酉1741年）赐一套甘珠尔经108卷，当取经回来，因未来得及建立寺庙，暂保管在今新巴尔虎左旗吉布胡朗图公社，故当地群众该称地为“甘珠花”，延至如今。

乾隆46——49（1781——1784）年间，在新巴尔虎左翼博彦图布日都附近建庙竣工后，又呈请皇帝赐予庙名，乾隆五十年（1785），皇帝亲书“寿宁寺”三字之匾命乾名。（当地人则仍称此庙为甘珠尔庙）。

最初多伦诺尔、张家口等地的旅蒙商，夏季流动行商在呼伦贝尔巴尔虎地区，秋凉时均聚集在甘珠尔庙附近，销售其剩余货物。然后共同经贝尔湖畔，取道喀尔喀境内，各归原地。

后来集会规模越来越扩大，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成了巴尔虎甘珠尔集会，而名扬远近。从此，不仅限于甘珠尔庙附近牧民与夏季旅蒙商之间的小额贸易，而且扩大到海拉尔商人大批前来，遥远的齐齐哈尔、赤峰、多伦诺尔等地商品也源源流入。外商也通过上海、天津、哈尔滨等大城市来购买牛、羊、马及皮毛等土产品。其中俄商居多。兴安岭东的布特哈、莫力达瓦等地的群众也来出卖黄轴大轮车和零星木料。还有来卖乌珠穆沁双和尔额额盐池之盐的人、由喀尔喀来销仓给达来之盐的人。阿嘎地区的布利亚特人也来做牲畜交易，牵来好马及带兽皮、墨镜石、红珊瑚等珍贵的物品畅销。喀尔喀部、锡林郭勒、哲里木盟的牧民也来贩卖牲畜。

交易市场设于甘珠尔庙之东北，约十来里处，均以白色蒙古包或帐篷毗连成向阳半月形的临时市镇。正街北面以东至西北

角。是海拉尔各商号，其西面是铜铁匠，从南向北街之东西两段是木匠铺，中间几乎都是饭馆，北街是俄商，他们以卖牛羊为主，故称俄商街。正街和俄商街的西端住的是马贩子。由布特哈、莫力达瓦等地来的黄轴大轮车商，在半月形市场南，各个设圆形圈落。新巴尔虎左翼正兰旗和辉、伊敏等地的额鲁特、索伦（鄂温克）卖紫、白轴勒勒车及木料商也都圈落其南边。当地牧民和外地来的蒙古人则围住正场附近。

呼伦贝尔副督统衙门派出管理集会的官员们，在半月形市的正南中心塔红花毡蒙古包，处理当天发生的事宜，除维持秩序外，结束时向每商户征收五元左右的“地皮税”。

集市交易于每年农历八月一日拂晓开始。届时，牧民皆穿节日盛装，牵牛到俄商处去卖。但对牲畜价格，牧民完全不知道，买卖双方进行袖里吞金讨价还价，实际上价格全掌握在俄罗斯等外商手中。卖妥了有现款，起码买全一年所需的米面茶盐布等生活用品。又以现款或以牛马羊和旧毡等换取车、木料、哈沙（圈棚）、柳条筐、粪杈、木掀以及革制品等生产资料。记得我父亲当时也用熟牛皮编制马绊、笼头、牛绳、马缰去卖。用老人们的话来形容：在甘珠尔集会上除“狗的偶蹄和绿色羔羊皮外，无所不有”。市场西面的平原上，每晚都有蹶走马、买马、换马的人们。

据传说，甘珠尔集会先前全用白银做交易，零星物品则以哈达、整块半块砖茶进行交换，后来才用货币，但以物易物的习惯一直延续至今。彼时如布特哈的黄轴大轮车，大体上都以马匹来交换，一匹好骡马能换三辆，较次的换两辆，最次的也能换一辆。一般车辆和木料均以质论价，用山、绵羊或旧毡子、皮革兑换。甘珠尔集会在旧社会即由民国时代至伪满，也有些肮脏的东西在集会上伤风败俗，这就是从海拉尔去赌徒设宝局耍钱，或带去些妓女败坏风尚，牧民对此极其厌恶。因此，新巴尔虎左翼总管额尔钦巴图，曾向督统府递过制止这些行为的呈文。结果始

终未能奏效。

每年集会到农历八月初五结束，来自各地的牧民和商人才各归各地。部分商号和饭馆有的留下来移到甘珠尔庙西，等该庙八月庙会，（这是每年从八月初七到十四的庙会）。销售其剩余商品。这个庙会，因有鄂巴尔虎八旗的全体喇嘛必须都参加的规定，聚集的人是很多的。巴尔虎甘珠尔集会曾延续十年之久，到伪满垮台前三年，在那木古尔庙（今吉布胡朗图公社管内），附近建一座时轮金刚佛曼陀罗庙后，把甘珠尔集会搬迁到鄂盟举行过。

解放后，一九四六年八月初一到初五才恢复到甘珠尔庙举行的，一九四八年元月一日，撤销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成立盟政府，接受了内蒙古自治区的领导，从此开始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改变呼伦贝尔的基本面貌，进入了新时期。

从此甘珠尔庙会在内蒙古自治区和呼盟党委直接领导下举行的。事先派本盟政府民政处副处长博彦毕力格同志，去自治政府请示举行这次集会的有关拨款、经费等。自治政府负责同志，亲自接见予以指示，拨给不少经费，并给会制图案、制做纪念章。

参加集会的有中共呼盟工委书记吉雅泰以及高锦明、苏林同志，盟长额尔钦巴图、副盟长功格尔扎布，各牧业旗旗长及各级负责干部。



图为参加一九四八年八月召开第一届那达慕大会的呼伦贝尔盟党政领导同志。后排左起第三人为当时的中共呼盟工委书记吉雅泰同志。

在八月一日（公历九月三日）集会开幕式上，由吉雅泰同志用蒙语作了关于贯彻内蒙高级干部会议精神的报告。首先谈到解放战争的形势，着重谈的是政策问题。他说：“人畜两旺是我盟一切工作的基础，我盟各族人民要向这个方向努力……，因为我们这里是纯牧区，所以不能和农区一样用平分土地的方式来斗

争、清算，平分牲畜，为了全民族的发展，让富裕牧民日益向前发展外、让贫苦劳动人民从饥饿的深渊中解脱出来，争取大家共同富裕。为此，要团结一致、互助互爱，把牧工的工资适当提高一步。……苏鲁克制度待研究试行。但是它适合于自愿两利原则，有利于贯彻执行发展牲畜、增加生产的目的的。”

这个报告，后来成了在呼伦贝尔牧区实行“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政策的伊始。为牧民民主革命阶段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方针，奠定了基础，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

那末，甘珠尔集会这个名称怎么改为盟那达幕的呢？有一次各族各界百余人参加的座谈会上，当地一名革命青年提出：为适应新时代，应改为呼伦贝尔那达幕的意见，经吉雅泰为首的党政负责人同意而改的。

这次的盟那达幕除和原来一样进行贸易外，又增加了新形式新内容。如借机召开了旗、索木、巴嘎的领导会议和以索木、巴嘎为单位，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学习吉雅泰同志的报告。原来的甘珠尔集会上，如无特殊的情况，一般不举行摔跤、赛马、射箭等民族形式的活动，以后才逐渐有了的。但是这次的那达幕上，为了加强各旗、区之间的团结，预祝未来美好生活的到来，除进行赛马、摔跤、射箭等有民族特点的男子三杰竞赛外，又增加了蒙古象棋比赛。展出本盟牧业经济、人口统计资料、改革与改进蒙古包形式的前景等图片展览，奖励了打狼模范和索木、巴嘎等单位。振奋了牧民群众的生产热情。原来的摔跤队伍是，以陈巴尔虎和索伦两旗为一方，新巴尔虎左右两旗为另一方来比赛。今年则不以旗、索木区分，均按报名者的身体高矮分列两阵，进行比赛。这次共有一百二十八人进行了淘汰赛。结果，新巴尔虎右旗的摔跤手那木斯来苏荣获冠军，陈尔巴尔虎旗胡格勒为亚军。其后，因取这种形式的摔跤、给加强旗与旗之间的团结带来了良好的影响。

总之，这次的那达慕大会，因宣传贯彻了党的政策，稳定了牧民思想，激发了积极性，在牧业生产继续发展的各个方面，起了极大作用。其后十年内，虽有两次特大灾害和传染病的漫延，牧区各类牲畜增长率为60%强，就是一个见证。

嗣后，根据全盟工作情况的实际，改变了原来必在农历八月一日开始的死规定，除在适当时期随时通令召开外，还利用那达慕机会，宣传党的政策、提高文化科学知识、破除迷信、培养教育游牧群众，尤其对青少年的茁壮成长，起了极大的作用。

在牧区物资交换与供销工作尚不普及的历史条件下，盟那达慕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方面，起过重要作用。

延续已久的，经营游牧经济，有蒙古民族特点的那达慕，到1962年以后，近20年来未开了。

昔日海拉尔的“八大家”

何德全

海拉尔位于大兴安岭西麓，座落在呼伦贝尔草原腹地，是呼伦贝尔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一七三〇年（雍正八年）卓尔海任黑龙江将军，他“以呼伦贝尔地广而腴，且邻俄境，疏请筑城”。

清政府很重视卓尔海的意见，于一七三二年（雍正十年），决定向呼伦贝尔地区移民。并于一七三四年（雍正十二年）建成了海拉尔城。初建的海拉尔，城周四里，没有城墙，以商铺和民房当城端，中间空场修起丈余高的土围子，南北有两个砖城门，东西有两个土城门。当时，城里只有两条街，这就是现在的正阳街和东大街。“八大家”就是这座小城市中的八家买卖。它们的出产、发展是和这座城市的命运紧密相联的。

传说

海拉尔建城后，成为呼伦贝尔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各族牧民要从这里购买各种生产、生活用品，同时，出售牲畜及畜副产品。谁来承担这项使命呢？笔者在六十年代初访问了一些年过花甲的老人，在记忆里留下了这样一段传说：当时，北京城的聚长城、隆大号、广太号、晋兴号、鼎升号、大利号、天聚号、弘盛隆八家商铺被指定作这项买卖。八家商铺的主人很害怕，不愿意到草地来。皇帝知道了这件事，就给他们发了“龙票”。有了皇帝的特许证，生命有了保证，本该动身完成这项使命。可是，八家买卖的掌柜，谁也不起身。为什么？千里迢迢，翻山越岭，谁也吃不了那份苦。怎么办？他们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各自从自己的老家招来了穷亲戚，把货物、车辆交给他们，一来完成了皇帝的圣旨，二来救济了穷亲戚。这些投资怎么分成呢？有两种说法：一种说，这些东西给了穷亲戚就算了事，要不然人家也不肯铤而走险；一种说，穷亲戚只拿较高的工钱，利润还要全

都交给总柜。二者各持己见，无从考查，莫衷一是。

龙 票

龙票——也就是清朝皇帝赐给的护照或营业执照。

拿着皇帝发的执照作买卖，本来是理直气壮的。可是，他们为了求得保护，反而更恭维。一进城，先拜访官吏和上层人物，送上金银物品表示敬意，这就使海拉尔的官、商产生了比内地更为密切的联系，他们经常在一起打牌、闲聊、吸大烟。副都统还在天聚号入了股份。“一品官二品客（商）”，这句民谚，就是八大家特殊地位的真实写照。

经 营

八大家设有总柜、分号、行商三种经营形式。总柜、分号是座商。行商统称“出草地的买卖人”，他们深入牧区通过物资交易的方式，牟取利润。

资金大者有白银三万两以上，人员达百，这样的买卖，既批发，又零售，还到牧区进行收购。弘盛隆兴盛时期，有牛车近一百五十辆，八个蒙古包，七八十人出草地做买卖。他们从北京、张家口等地进货，把收购的畜副产品运到齐齐哈尔，哈尔滨乃至上海销售。

资金小，人手少者，只有商号门市和行商。这样的买卖只有两千两左右白银的资金，三二十人经营，他们以“出草地”、“赶庙会”为主，商品依靠八大家购入，再把收购来的畜副产品推销给八大家，与其说他们是二等商铺，不如说他们是八大家的附属分店更为准确。

八大家和他们的“附属分店”下面，还有专门从事游动贸易的买卖人，这些人没有商号，从八大家和各商号把商品买来，在牧区换取畜副产品，再销售给八大家和各商户。

八大家的交易方式有三种：一是以物易物：也就是八大家以生产生活必需品换取牧民的牲畜和畜副产品；二是钱货混合：这种方式是用部分商品加现金换取畜产品；三是现金交易，现金买

畜副产品在八大家的买卖中占的比例很小。

八大家经营的特点是：利用赊欠，抛售剩余商品，赊购畜付产品。他们以交朋友来拉关系，取得牧民信任，不交款先取货，加速资金周转。弘盛隆一次就向牧民赊购千只羊、百头牛。

铺 规

国有国法，铺有铺规。八大家在长期经营牧区生意中，摸索出了一套扩大销售额的办法，推而广之，旅蒙商相约成律，变为严格的铺规。这些铺规从学徒入店那天起，就要认真学习，认真执行，否则，轻犯挨骂，重犯解雇。

学习蒙古族风俗习惯：这包括礼仪、衣服、饮食、居住、嫁娶、祭祀、丧葬、禁忌等内容。八大家认为和牧民交朋友，是做好买卖的基础。学习好当地民族礼俗，才能生意兴隆，财源茂盛。因此，他们对礼俗调查的很详尽，执行的铺规很严格。

礼仪：按着蒙族习俗，听到马蹄声，店铺掌柜、伙计要出门迎客，并接僵牵马，到蒙古包去要绕到蒙古包后面下马，直冲蒙古包门或骑快马而至，意味着报送不吉利之事，是不礼貌的行为；无论见到蒙族男女，必需用蒙语“门德”、“赛音伯奥”问好；接近数步时，屈右膝致礼；交谈时取出鼻烟壶，双手递给蒙族牧民，嗅后，牧民也双手捧出鼻烟壶给店铺人嗅，这时，不能拒绝，若拒绝是不礼貌行为；如果装烟待牧民，那就更表示敬重了；最重要的礼节是献哈达。对于献哈达，牧民看成是最真挚的友情，最大的荣幸，八大家按照蒙族牧民的习惯，用丝绢做成长方形、一丈或几尺长的哈达，一般以白蓝二色为多，淡青色次之；住在蒙古包内不赤身裸体。八大家人员把蒙古族礼仪定成铺规，严格遵守，加深了蒙汉人民的友爱，发扬了中华民族文明礼貌的传统。

衣服：蒙族牧民喜欢穿戴什么？这和八大家进货关系密切。大家调查了衣饰情况，就多从外地进来黄紫绿三色绸卖给牧民，进来红黄紫三色卖给喇嘛；蒙古牧民戴帽子喜欢上缀红缨，

他们就购入红缨缀在帽顶的帽子；巴尔虎人爱戴圆型獬面帽，他们就购来金边镜在帽周；冬天，呼伦贝尔天寒地冻，八大家就提前出售毡疙瘩，至于金银首饰、耳坠耳环，更投妇女们所好。

饮食：一般都说呼伦贝尔的蒙古族及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民族“食肉饮酪”，饮食简单，其实不然，八大家的买卖人经过身临其境的体味，运进了熟稔子米，白酒、砖茶和食盐，使奶茶更鲜美，食品更丰富，受到了牧民的欢迎，扩大了商业经营品种。

婚葬：八大家熟悉蒙古民族的婚葬仪式。每当遇有婚葬人家，他们都备好合乎仪式的商品，任亲友选购，总能使用户满意，拉上了主道，在举行这些仪式时，只要八大家买卖人在当地，就总是去参加，除了表示祝贺或哀悼，还要通过这些场合交朋友、赊出货物或预订收购。

学习蒙语：了解蒙族风俗习惯，还必需学会蒙语。铺规是：上至老闆下至徒弟，关板后必须用蒙语谈话，否则，老闆就要破口大骂。

起蒙古名：老闆和学徒都起蒙古名字，商铺有蒙古名字号。

作息时间：学徒晚十二点就寝，关板后就寝前除学蒙语、学珠算外，还要给老闆点烟、倒茶、铺行李，第二天早起，倒夜壶、扫地……。

招待牧民：接待牧区蒙族，老闆带学徒、劳金出去几十里，迎接牧民车辆；迎来牧民，吃住不收款；牧民存放钱物不点数，以示信任；牧民钱款交老闆，一应物品多由该店代购。牧民返回时，老闆、伙计、学徒一起帮助装货、套车，送出城去。

俄国东省铁路调查局委员阔尔马佐夫，在“呼伦贝尔”一书中哀叹：“俄国商人遂乘机迁入，试与蒙古民族直接交易。不过开始之时，自甚困难，既不知蒙古语言，复不知蒙古之习俗嗜好及需要。而且，一般蒙人因中国商人在彼之历史，为时逾百有余年，彼此多已相习，故对于俄国商人，皆裹足不前。在此种情况之

下，俄蒙商业自无发达之可能。”。八大家以其尊重牧民，加强了蒙汉团结，至使张牙舞爪的沙俄在经济侵略上受到“自无发达之可能”的沉重打击。

流 动

牧民被商铺笑脸送回草原，一般都置备了一年的生产生活用品。在这段时间里，很少有人再次进城买东西卖牲口，他们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逐水草而居”的畜牧业生产上，八大家就出草地流动售货。

流动售货卖畜副产品不是八大家的发明，早在康熙年间，山西商人赵、郭等三人合伙随喇嘛庙一带牧民游牧作买卖，他们以物易物，跟随牧民来到呼伦贝尔。此后，随着畜牧业生产的发展，移居这里的汉人不断增加，八大家才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八大家的老闆、伙计、学徒进入牧区后，“铺规”更严，他们非常尊重蒙古民族风俗习惯，入蒙古包前，先把马鞭放在户外；进蒙古包后就右入座，不能举足向火、向佛龕，表示敬意。

蒙古族是好客的，他们进城时受过老闆、伙计、学徒的礼遇，因此，就更加热情，往往拿出奶酒、肉干、奶皮、奶干……。这些买卖人会蒙语、懂得风俗习惯，搞得主客亲如一家。酒过三巡，伙计才让学徒送“礼品”，这些“礼品”不要钱，等到算账时才往上加，比如：主妇穿的是古铜色旧蒙古袍，老闆使个眼色，伙计就捧来一件紫色新袍，老闆说：“这件袍子送给老太太穿”。主人表示感谢，“朋友之间”磨不开张口讨价还价、只好等结账时再提这件事。其实，滞销的紫袍已经卖了出去。

庙 会

庙会是指甘珠尔庙会的简称。一七八四年（乾隆四十八年），这座庙在海拉尔西南三百二十里的布彦图布尔都草原上建成。当时，甘珠尔庙的门前有乾隆亲笔题写的“寿宁寺”匾牌。

甘珠尔庙是喇嘛庙宇，规模宏伟，在这里举行甘珠尔庙会

既达到了游艺、贸易的目的，又方便了牧民的祈祷，因此，每年八月集期，内外蒙古牧民赶着畜群，拉着畜副产品，从远远近近赶来赴会。八大家买卖和山西、张家口、奉天、多伦、卜奎（齐齐哈尔）等地商人，也携带大批货物来此进行贸易。当时，庙会集期前后半个月，大会五天，小会十天。贸易商场设在甘珠尔寺北的开阔草原上，围成环形市场，设有南北二门，南门两侧是车市，为布特哈及索伦使用；门东向北，是卜奎、多伦商铺；门西向北，是北京、奉天商人；北门外是俄国商摊；市场中央设副都统行幕和税务机关，驻中蒙官员和护卫蒙兵。按行业及地区分类，则是：中国商场、俄国商场、牲畜市、木器市。经营品种齐全：面食、肉类、杂货、棉织、地毯、医药、金银首饰、木器、马具、陶瓷、铜铁具、饭馆、修配、无所不备。至于祈祷用品更是品种繁多

庙会开始，牧民乘赶庙会之机，买齐越冬过春的生产生活用品。贸易市场的头一天，牧民为了获得现金，总是先出卖牲畜和畜副产品，接着到饭馆吃酒行乐，祝贺丰收；第二天，购买各种日用品。在五天大会中，一般都把出卖牲畜和畜副产品，所得现金花净。这时，各商铺往往还剩余不少货物，八大家总不肯把这些物品拉回海拉尔，他们跟随着牧民，和牧民拉关系，论交情，乘机把剩余货物倾销出去。牧民无现金，八大家就进行赊账，等到来年再归还。（这些交易手段很快传到各地商人乃至俄国商人那里，成了旅蒙商人抛售货物、赚取利润的手段。）一九〇六年（光绪三十二年）交易额达二百万银元；一九〇八年（光绪三十四年）牧民卖出牛一万五千头、羊五万只，八大家及各地商人从其中牟取了高额利润。

小 结

八大家来到海拉尔，是清政府防止帝俄蚕食，粉碎帝俄“黄俄罗斯”美梦的又一个步骤。他们学习蒙语，尊重蒙古族风俗习惯，千方百计把牧民的特需品送到呼伦贝尔，在客观上起到了加

强民族之间联系，促进呼伦贝尔经济发展的作用。

八大家在清朝末年与呼伦贝尔各族人民的交易通年不断，扩而广之，发展到和蒙古边远地区进行交易。

辛亥革命爆发后，帝俄政府在尼古拉二世的不要“将机会错过”的指令下，一边进行武装入侵准备，一边派大批俄商进入呼伦贝尔。

八大家唯利是图的本性在这种情况下，充分暴露出来，他们和帝俄商人勾结在一起，走向了所谓的黄金时代。每年将价值一百六十二万五千卢布之多的皮、毛、肉、牲畜从海拉尔运往帝俄，再从帝俄将价值八十三万卢布之多的俄国酒、装饰品、杂货运进海拉尔，可见当时盘剥量之大。

帝俄魔爪的伸入，资本主义竞争的加剧，使八大家时兴时衰，有的倒闭，有的扩大，有的转业。一九三一年八大家只剩聚长城、大利号两家。代之而起的是天增合、普盛魁、巨发号、瑞兴太、福生利、天增厚、永生长、万亿号、晋义成、德合号等经营范围较大的商铺。

八大家几经兴衰，历史情况比较复杂，笔者就其六十年代搞《海拉尔志》所得的一点材料整理出来，当时忆述人有的不在人世，错误在所难免。希望此文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老前辈们兴趣，提供出这方面的更多资料，并对本文以手指正。

时轮金刚曼陀罗庙

伊和忠·乌力吉木日图

一九四二年之夏，在呼伦贝尔新巴尔虎左翼镶黄旗（现在的吉布胡郎图公社）那木古儒山顶上，建造了时轮金刚曼陀罗庙。这是在呼伦贝尔地区建造的最后一座庙，我简略介绍一下建造时轮金刚曼陀罗庙的经过和它的目的，供读者参考，如有不实之处，恕予指正。

清朝时代，尤其在乾隆皇帝时，佛教大规模地传入内蒙古和外蒙古地区，清朝政府把大批的蒙古族喇嘛和藏族喇嘛派往居住在沙皇俄罗斯境内的布里亚特蒙古族地区。于是布里亚特蒙古族地区很快盛行了佛教。并且开始建造了很多寺庙，也出现了不少的喇嘛僧侣。

十九世纪末叶布里亚特蒙古族官僚和宗教上层人士，打算在阿嘎庙建造时轮金刚曼陀罗庙，在端古勒庙建造杰仁哈什日之塔，为此把端古勒庙的僧侣曾在中国拉布楞寺学过教义并受过喇嘛学位的道润巴喇嘛乃登派往多伦城和那里的工匠们商定做佛象的事宜。但由于做佛象时间长，路途遥远，资金不足，加之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做佛象的事便搁下了。

苏联十月革命后，居住在沙皇俄罗斯的布里亚特蒙古族，大批迁入呼伦贝尔地区，呼伦贝尔副都统府报请黑龙江省督军府批准，允许他们在呼伦贝尔锡尼河地区居住为民，于是他们便在锡尼河沿岸建立了一个布里亚特蒙古旗。

一九二九年布里亚特蒙古族贵族仁钦道尔吉诱骗一部分布里亚特人逃往锡林郭勒盟毛敦嘎锡里地方，在该地又建立一个布里亚特蒙古旗。此地离多伦较近，他和乃登道润巴、却敦喇嘛等一伙到，多伦又开始筹备时轮金刚庙的重建工作。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和内蒙古地区以后，仁钦道尔吉和乃登道润巴之流，投靠了日本侵略者，并厚颜无耻地向日本帝国主

义求援，日本为了利用宗教迷信活动，妄图巩固其统治，便积极赞助，予以大力支持，于是伪兴安北省省长和伪军司令官乌日金等决定在呼伦贝尔地区建造时轮金刚曼陀罗庙。

建庙地址的选择是由乃登道润巴一手包办的。他通过伪兴安北省公署向那木古儒庙希热图（首席）喇嘛提议：把时轮金刚曼陀罗庙建立在巴尔虎的伊格宁道润巴喇嘛庙的旧址上，并主张两个庙一起召开庙会，但是那木古儒庙的希热图喇嘛庙等不同意，因此庙址未定下来。

乃登道润巴喇嘛为什么要把时轮金刚庙曼陀罗庙建立在该地呢？其原因是巴尔虎的伊格宁喇嘛曾经在拉萨学习并得过喇嘛学位，于十八世纪五十年代返回他的故乡，在六十年代，他在那木古儒之东自己盖了一座土庙，并且和布里亚特阿嘎庙和础古勒庙有了密切的来往，布里亚特蒙古族喇嘛们，经常从他手里取走“甘吉干却口”经典哲学书籍，从那时起布里亚特蒙古族地区传播了经典哲学思想，因而他对于两座庙的喇嘛和布里亚特宗教上层人物有很深的影响。后来，来呼伦贝尔地区居住的布里亚特人经常在伊格宁道润巴庙旧址上，挖掘出泥做的佛象，更证实了他们的密切关系。由于这种关系，乃登道润巴等人，比较详细地了解那木古儒庙的地形，也考虑它的传统关系，就选择了这个地方。但是乃登道润巴既不能决定，也没有钱，只好依靠逃往锡林郭勒投靠日本的布里亚特贵族仁钦道尔吉去向日本求援。日本侵略者为了防止苏联共产主义的渗入，巩固他们的统治，正需要利用宗教迷信，推行其愚民政策，便立即同意，向伪满政府下达命令，并且责成它的特务机构，在海拉尔的特务机关长、伪满第十军区的顾问日本军大佐寺田利光支持下完成这个任务。

一九三九年春末，镶白旗的巴达玛其木格对我说，有一天，伪兴安北省省长额尔钦巴图叫我去海拉尔，我来海拉尔时额对我说，他要去那木古儒庙，路经镶白旗庙，你是那儿的人，给我做向导。旧历四月初，我同伪省长和他的秘书色文，还有从日本学习

回来的巴珠尔喇嘛等一起坐他的小汽车，还有伪满十军管区伪司令官乌尔金也做了一辆小汽车，驶往那木古儒庙，路经镶白旗庙时，伪省长召见了该庙的希热图喇嘛都希日布扎木苏。都希日布扎木苏对佛教经典造诣很深正在翻译一本蒙古族历史的藏文书。当天晚上我们到那木古儒庙住下。翌晨，观看了那木古儒庙附近地区，都格吉布昏队道润庙旧地和喇嘛因敖包，阿勒腾达苏等地后又返回都格吉布昏队，司令官乌日金说，把时轮金刚曼陀罗庙建立在这个地方怎么样，额回答说，这个山谷和呼伦贝尔湖西北花胡硕对着口，因此这个地方存不住东西，说明不吉利。于是又走到镶黄旗胡硕敖包那里，正式定下了建庙的地址，并做了记号。当时为什么在那么高地建庙，其原因是能看着苏联土地，以达到反共的目的。

建庙地址决定后，那木古儒庙的希热图喇嘛布桑、芒仁巴、罗岱以及卸任佐领巴雅尔图普日布等人，代表众人意见向伪省长额尔钦巴图提出两个问题，不同意把时轮金刚曼陀罗庙建立在他们这里。额当时没有答复。后来因为发生了“诺门汗事件”建庙的事又不了了之。

到了一九四一年，才开始动工建造时轮金刚曼陀罗庙。资金一是在牧民和喇嘛中摊派；一是从国库中拨款（据说拨了伪国币三十万元）；其余是从各旗职员的工薪中按比例摊派。该庙的主楼是由日本的驻海拉尔建筑公司承包，由傅显亭负责施工，由一个姓杨的木匠领着盖起来的。于一九四二年阴历七月竣工。

时轮金刚曼陀罗庙建立后，举行了一次竣工仪式，并且强制挪到和例年召开的甘珠尔庙会一起召开的。参加仪式的有伪兴安北省省长额尔钦巴图、司令官乌日金以及其它日本大官，建庙有功之臣乃登道润巴，并特请多伦甘珠尔瓦活佛来念经，布里亚特仁钦道尔吉等人也都来了。在建庙仪式上把乃登道润巴任命为该庙的希热图喇嘛。

时轮金刚庙的建立，完全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施行其愚民

策的需要。耗费了大量的资金，给广大牧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施工中以投资不够为理由便向牧民征收，庙仓牧畜也是从牧民中强行征收的。当时仁钦道尔吉又向伪省长额尔钦巴图说，在多伦建造的时伦金刚佛像资金不够，要呼伦贝尔拿出一千头犏牛。额回答说建造佛象是最紧急的事情，你先从当地给解决，至于要的牛群，在一九三一年呼伦贝尔牧民向班禅额尔德尼奉献的牛在锡林郭勒，你从那些牛中支付就行了。

当时该庙的亩产有一千只小畜六十多头大畜，放在镶黄旗特古苏管理，配备了一名德木齐（管理员）——新巴尔虎右旗的达格瓦，和一名尼日布（保管员）——镶黄旗巴拉登参布，负责管理庙产。

一九五五年，该庙的佛像搬到甘珠尔庙。在十年内乱时期，不少喇嘛被牵连，有的含冤死去，该庙也在“破四旧”时被砸毁了。

甘珠尔庙的喇嘛职称与收入分配

花赛·都嘎尔扎布

甘珠尔庙是呼伦贝尔地区喇嘛教的主要寺庙。该庙从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开始施工，于四十九年（1784）竣工。次年，乾隆帝赐予“寿宁寺”之匾而命名之，但通常乃称甘珠尔庙。

该庙虽然建在新巴尔虎左翼宝音图布日德附近，但它是新巴尔虎左、右两翼佛教徒共同建立的，因而归两翼管理。因为巴尔虎两翼八旗的喇嘛都是该庙的沙比（徒弟）（清朝规定甘珠尔庙的沙比大约五百名），所以每年一度的八月庙会，各旗的喇嘛都来参加。这个制度在民国以后有了变化。一方面上述规定有所松弛；另一方面随着喇嘛的增多，有的喇嘛就随便不来参加庙会。庙会结束后，他们大部分回到自己的寺庙，有的回家。

一、

该庙原来没有格根（活佛），所以喇嘛的职称都是根据两翼各旗的制度规定的。新巴尔虎左、右两翼都有一个平等权利的希热图（首席）喇嘛，召开庙会的时候，他们的座位是寺庙正殿北部朝南的两个高椅。左翼的希热图坐在左边，右翼的希热图坐在右边。希热图缺位时，由该翼总管上报呼伦贝尔副都统，副都统衙门下令在该翼各旗的喇嘛中选出一名希热图继位。所有八旗都各设大喇嘛、格斯贵（掌堂师）、翁资达（领着念经者）、德木其（财务管理的）等正职。如果他们当中有缺位时，便由该佐领上报总管，由总管在本旗内选出一名喇嘛继位。在上述四种职衔之内，各旗都规定一个首席职衔。如新巴尔虎左翼镶黄旗设有首位大喇嘛，正白旗设有首席格斯贵，镶白旗设有首席翁资达，正兰旗设有首席德木其，新巴尔虎右翼镶红旗设有首席大喇嘛、正黄旗设有首席格斯贵，镶兰旗设有首席翁资达，正红旗设有首席

德木其等等。召开庙会的时候新巴尔虎左翼的喇嘛们坐在正殿东侧朝西的座位上，新巴尔虎右翼的喇嘛们坐在西侧朝东的座位上。其中首席大喇嘛坐在第一排比较高一点的靠椅上，其它大喇嘛依次就座。首位翁资达坐在第一排中间比较高一点椅子上，其它翁资达依次就座。正殿正门的东侧是左翼的格斯贵，右侧是右翼的格斯贵脸朝北就座。两位首席的格斯贵坐在比较高一点椅子上。德木其的任务是经管寺庙的财务，首席德木其坐在左右两侧，其它德木其依次就座。开会研究收支问题，叫“德木其衙门”。

上述正职衔的喇嘛，平时大部分时间不在甘珠尔庙。为了主持日常经典事务，由新巴尔虎左、右翼各派格斯贵、翁资达一人，抓日常经典事务。

二、

寺庙的收入，来自牧民和教徒。除其中一部分是教徒供给外，大部分是患病或者遭到灾难的人家，不得不到庙请喇嘛念经后给的布施。所以寺庙的收入是不稳定的。群众灾难多时，庙的收入就增多，否则即减少。伪满时期，仅以新巴尔虎左翼包括甘珠尔庙的在内的大小十一个寺庙的情况来看，小一点的寺庙收入少，比较大的寺庙收入则较多。各寺庙的分配方法也不一致，有的寺庙从收入中扣除佛爷份（即寺庙内部的小型修缮费）庙际偿还由寺庙借用的物品等外，其余收入不分职衔高低，平均分配。对有职衔的喇嘛当做“嘎拉”赠给一些哈达和其它火柴等物品，以示尊重。这是一种平均分配的方法。但也有的寺庙从月收入中扣除以下两项费用后，以职衔的大小当做“嘎拉”分给他们，其余的部分再分给沙比喇嘛，所以普通的沙比喇嘛收入就少。尤其是甘珠尔庙的两个希热图除了庙会以外，一般不在甘珠尔庙，他们每月收入比沙比喇嘛多十倍。如普通沙比喇嘛每月收入十元，希日图喇嘛就得一百一十元左右。

根据上述情况，1943年新巴尔虎左翼旗公署颁布了该旗

各寺庙分配收入的规定，规定要求在月收入当中扣除两项费用后，其余部分平均分配给本月驻在寺庙里的喇嘛。另外哈达等物品当做“嘎拉”赠给有职衔的喇嘛。本规定除甘珠尔庙外的各寺庙都实行了，受到沙比喇嘛的拥护。甘珠尔庙是新巴尔虎八旗的宗教徒组建的，受左右两翼的管辖，因而不服从一个旗的规定，另外又受到部分保守官吏的支持，因此，它仍坚持旧的分配制度。

三、

解放初期，旧制度被废除，新制度正在建立之际，甘珠尔庙有的喇嘛仍在做着两翼之间混水摸鱼从中得利的美梦。

1949年春末夏初，该庙派镶黄旗出身的吉格木德曾德喇嘛到新巴尔虎右旗，说什么，“东旗旗长用各种办法插手我们召庙的事务，甘珠尔庙是归两翼管辖，西旗也应该有说话权嘛”！这是自伪满时期甘珠尔庙上层喇嘛一贯采用的旧手法。当时，新巴尔虎右旗的旗长听完他的话后，正告说，甘珠尔庙原来是两翼的人民共同建立的，但是目前已经改朝换代了，甘珠尔庙是在新巴尔虎左旗境内，行政方面属于新巴尔虎左旗管辖，我们不能插手。从此甘珠尔庙才接受了东旗的领导和管埋。但是他们在某些方面还是坚持旧的规定，如新巴尔虎的喇嘛们都是甘珠尔庙的沙比喇嘛各种职称仍以八旗的名义命名等等。

1950年初冬，为了解决以上问题，呼伦贝尔盟政府派民政处长到甘珠尔庙并同喇嘛等有关人员讨论了几天，最后取得了一致的意见。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根据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不能一律强求新巴尔虎的喇嘛们必须是甘珠尔庙的沙比喇嘛，自愿往甘珠尔庙的不受限制，参加八月庙会也不受限制。

二、原甘珠尔庙的喇嘛职衔人数是以新巴尔虎两翼八旗为根据的，现在八旗制度已被废除，所以任命大喇嘛格斯贵、翁资达、德木其等都从驻在该庙的喇嘛当中挑选。（下转77页）

达斡尔民族迁入扎兰屯地区的经过

包德华

达斡尔民族清朝时期居住在嫩江流域的纳河、嫩江、齐齐哈尔等城市附近。生活以牧为主，季节性的打猎为副，种植一些自用粮食、蔬菜等。

清朝末年，民国初期（1900）东北军阀头子之一吴俊陞（人称吴大舌头）占据黑龙江省担任督军职务，独霸军、政大权，联合当地土豪劣绅强占土地，大量开垦荒地，立窝铺、霸占草地，设立牧场大批养牛、马、羊。到处都有吴大帅的农场、牧场，在黑龙江省北部地区成立数处所谓“设计局”，派出他的爪牙，将少数民族的土地随意出卖，给买主土地执照，使他们可以随便开垦、买卖。这样，嫩江流域居住的达斡尔民族的土地、牧草场，逐步地被军阀占去。

1931年日本帝国侵占了东北以后，更加残酷地掠夺，要粮、要牲畜、抓劳工、没收枪支、禁止打猎，任意屠宰牛羊，城市商店货架都是空的，人民群众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尤其达斡尔民族更为严重，吃野菜，穿麻袋片。齐齐哈尔市附近居民实在没法谋生，只好携儿带女每天早晨进城喝粥去——这是中国红十字会和万寿会举办的，为的是救济没饭吃的饥民。每天两顿每顿一人一碗，一粒跟一粒的小米稀粥。伪乡公所在这样喝粥家的房子的墙上用白灰写上“穷户”两个斗大的字。

1932年（伪满大同元年）达族上层分子留学生德古来，郭兴元等亲日派积极活动，乘日寇推行“分割统治”的侵略政策之机，在扎兰屯伪成立了省兴安东省公署，下设四个旗：布特哈、阿荣、莫力达瓦、巴彥等。德古来把他的老叔叔原八旗筹办处长额勒春请出来担任第一任省长，巴金宝选为莫旗旗长，不久升为省总务厅长，掌握省全部行政大权，郭兴元担任伪兴安东省警备司令官，金耀洲为布特哈旗旗长。

1934年（伪康德元年）金耀洲等人为了扩大他们的权力，巩固他们的地位，根据日本帝国主义开拓内蒙的殖民地政策，他派大批部下职员前往齐齐哈尔、富拉尔基、扎来特旗等地招募开拓民，将上述地区的贫困农民，大部分是达族，有少数蒙古族，每户只给八元路费，迁入布、阿两旗境内，布旗有齐齐哈尔乡、萨马街乡、卧牛河、尖山子等地，迁入多的是齐齐哈尔乡，这个乡过去只有鄂温克族居住，所有这次移入的开拓民大多数是齐齐哈尔市附近的居民，因此定名为齐齐哈尔乡（四七年后改为达斡尔民族乡）。移民迁来后建立了一至九村，另外还有口门子、尖山子、靠河、靠山、沙里沟子、柞木梁子等二十来个部落，萨马街乡为两个大村（萨马街、洼堤）哈拉苏西北建立一个以鄂伦春民族为主的部落叫阿木金。

开拓民迁来后，没房子住，各家只好用草皮、石片垒上墙，砍些柞桦树等做上房盖，俗称马架子房，一间房子一大铺炕，一家人老少挤在一铺炕上，少吃无穿，政府仅仅配给少量粮食，只能度命而已。

生产时，一户配给一头小牛，每村给一些绵羊，人口多的户能分到二、三只，一个村拨给三、五台双轮单铧犁开地用，其它农具家具都自备，可是这些开拓民都是贫困户，没有钱买工具、家具，只能几户互相搭配开些荒地，也打不多少粮，自食都不足，但是，日本侵略者照样要出苛粮、抓劳工，选拔身强力壮的青年去当伪国兵，生活更是濒于绝境，一切生活必需品都限制，甚至食盐、灯油火柴都没有，吃一顿大米饭如被警察特务发现就是“经济犯”。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1937年在齐齐哈尔乡，开始兴办了国民学校，就是初级小学（共五处）后来在二村增设一个国民优级小学（即高小）学校的校舍、桌、椅及教员办公室，学生宿舍等建筑经费，都由当地居民负担，旗公署除发给教师工资外，每月发给三、四元的办公费。萨马街乡仅建立一所一、二年级小学校，其它开拓

民的部落，都没有学校，孩子们根本念不上书，伪政府只是回头上提倡适龄儿童入学，但居民太穷，哪能念得起书，有的人家每月三角钱的学费都拿不出来，只好当文盲了。有的学生露着膀子，光着脚来上学，念一、二年就退学了。除了地主富农子女外，贫苦移民上中学念书的几乎没有。

移民迁来后，由于住在自建的小马架房子又小又低，房子空气不流通，再加上吃不饱，穿不暖，饥寒交迫，患病的很多，死亡率也很高。最厉害的是“克山病”，这是一种急性病。当时在移民区一个医院也没有，流动医生也没有。得病就要去扎兰屯治疗。得克山病的人得不到及时抢救，就只好等死。这样，有的村死光了，剩下一、二个人都吓跑了。最严重的全家十一口人死了九人，只剩下一老一少三口人。就以齐齐哈尔乡来说，刚建立时二十三个部落，原来有个小村，几乎人都死光了，剩下的跑到别的村子去了，后来只剩下十四个村子，其它移民部落也一样。达族移民迁到扎兰屯后在漫长的十二年中受日本侵略者的压迫和剥削，并在无情的病害的侵袭中度过了笔者实难用笔墨形容的苦难岁月，直到解放。

布里亚特蒙古人迁入呼伦贝尔简记

伊和忠·乌力吉木日图

俄国十月革命后的一九一八年，居住在布里亚特蒙古原籍地的白俄罗斯匪首阿·希门诺夫、巴荣·翁克林等人，纠集白俄残部，继续与苏联红军作战，同时大肆抢掠人民的牲畜、财物，他们所到之处，除进行破坏和捣乱外，还抓了大量布里亚特青年给他们充当炮灰，这给布里亚特人带来了极大灾难。另外，布里亚特的上层人物也利用宗教迷信来反对十月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导致阿古和鄂嫩等地的布里亚特人、鄂温克人从一九一八年冬天开始，驱赶牲畜、携带家眷，陆续迁入呼伦贝尔地区，其人数逐渐达到数千之多。

迁入呼伦贝尔地区的布里亚特蒙古人和鄂温克人，原居住在贝加尔湖以南和鄂嫩河、额尔古纳河、黑龙江一直到和呼伦贝尔相连接的地方。一六八九年清政府和沙俄政府签定《尼布楚条约》，一七二七年、一七二八年清政府和沙俄政府先后签定《布连斯奇》条约和《恰克图》条约。根据条约规定：中俄中段边界自额尔古纳河经恰克图至沙宾巴哈之间，以北归俄国、以南归中国。这样一来，布里亚特蒙古人和鄂温克族人的原居地被划入俄国版图，归沙皇俄国管辖。根据当时政府的规定：任意越境判处死刑。这样使得世代友好相处，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民族同胞因国界的划定而不能象过去一样地密切往来。但这以后，仍有不少人不顾条约规定，穿越边境进行交往，而其中不少的人被判处了死刑。鉴于这种情况，布里亚特蒙古人趁俄国爆发内战之机，纷纷逃离俄罗斯，来到呼伦贝尔。这是从历史的角度追溯布里亚特蒙古人迁入呼伦贝尔的原因。

俄国革命运动蓬勃发展，使布里亚特上层喇嘛及官僚恐慌不安，为逃避革命潮流，他们利用宗教迷信蛊惑人心，说局势已恶化，此地不可久留，首先鼓动阿古和鄂嫩等地靠近国境聚居地的牧民迁移，

一九二一年，布里亚特的上层人物阿毕德，代表迁入呼伦贝尔的布里亚特蒙古人到海拉尔向当时的呼伦贝尔副都统府申请有关入籍事宜，副都统府根据其申请意愿，对迁入户登记造册，并向黑龙江督军府请示，经批准后，准许入籍。实际上，早在一九一六年，布里亚特的上层人物那木德嘎，巴克达诺夫等人，就与呼伦贝尔副都统府暗中商洽。经过他们的同意，从一九二〇年冬天开始，布里亚特人大批迁入呼伦湖，克鲁伦河南部海拉尔河一带。不久，草场紧张，逐渐不够使用，阿毕德又去副都统府要求地盘。一九二一年，呼伦贝尔副都统府派遣总管吉和布僧格、右厅帮办兼佐领，额尔钦巴图等人，前往克鲁伦河旁的阿拉坦额莫勒附近，召集布里亚特、鄂温克的代表人物和一些户主，听取他们的意见，讨论了具体问题，确认了可以居住在呼伦贝尔的人，同时将放管俄国人牲畜的户主或愿意返回俄国的人都送出国境，统计了居住此地的人数，同时，又把迁入海拉尔河附近的布里亚特人，鄂温克人详细统计以后，一起由副都统府呈请黑龙江督军府准许这些布里亚特人、鄂温克人落脚在呼伦贝尔。根据这一决定，副都统府在一九二一年八月二十八日下达公文，决定布里亚特居住在锡尼河草原，成立布里亚特旗，全旗分为四个索木，委任布里亚特的代表人物阿必德为第一任旗长。

阿必德上任后，视查了锡尼河草原的全貌，天穹下，青翠的山，明澈的水、随风送来缕缕的草香，这真是美好的地方，一个永远安居乐业的吉祥之兆油然而起，于是，他喜气洋洋的在锡尼河和伊敏河的汇合处，按着“晒旗”这一古老传说，揭下马鞍，铺上防雨布，供上乳品，表示已接受此地，认为这里将是布里亚特人的乐园，是布里亚特的光明和希望。阿必德上任后，又会见了布里亚特的上层人物那木德格、阿尤西等人。阿必德提出开庆祝会来表达对呼伦贝尔官吏的谢意。经一致同意，决定选择锡尼河下游与伊敏河交叉的河滩举行那达慕大会，以示庆祝。

一九二四年夏天，锡尼河布里亚特旗民在阿毕德的主持下

召集全体布里亚特人举行了盛大的那达慕大会，邀请了安本老爷贵福、成德公爷等十几名呼伦贝尔的当权者，予以盛情款待，还送银饰鞍马和金银等贵重物品，表示感谢，被邀请者高兴地接了谢礼，这对于相互间关系的融洽起了良好的作用。

阿毕德旗长最初是在一九二二年率领一百六十余户，七百多人，来到锡尼河布利亚特定居的。

布利亚特人的新居地锡尼河草原，水草极为丰美，河流清清、林木处处、飞禽走兽极多，是个安居乐业的美好家园，他们由衷地唱到：

“树满北山的锡尼河，
是安本老爷赐赏的。
丛林盖地的锡尼河，
是成德公爷赐赏的。”

“宽阔的锡尼河，
野生果仁饱满，
川流的锡尼河，
水产貂獭珍贵。”

布利亚特人一九二二年开始陆续来到锡尼河，人口越来越多，原有的四个索木已容纳不下，到一九二九年时，便将四个索木划分为八个索木。这时，阿必德旗长已死去，副都统府委任米吉德为该旗总管，阿尤希，绰依门普勒、达喜为副总管，同时对每个索木均配备一名佐领、一名骁骑校、四名领催。

布利亚特旗在一九二八年号召旗民捐款，在锡尼河草原建筑一所新庙，一九二九年春天竣工，六月，举行建庙落成典礼，命名为“丹巴达日杰灵”庙，但一般都称它为锡尼河庙。

布利亚特初到呼伦贝尔时，曾蒙副都统府官员的热情欢迎和关照。特别是得到左厅厅长成德的大力支持，使布利亚特以很短的时间在呼伦贝尔安居下来，呼伦贝尔的各民族人也无私地予以援助，巴尔虎牧民因为和他们是同族同姓更是这样。一九二二年

以前，布里亚特没有游牧场所，新巴尔虎左旗和新巴尔虎右旗的牧民腾出两旗中间的莫能塔拉草场给他们放牧；从此他们同生息，直到一九二二年在锡尼河定居，对于这些布里亚特人至今不能忘怀。二十年代，巴尔虎与布里亚特同牧同迁，有时烧柴也分着用，巴尔虎人用的“比拉包”铁炉就是从布里亚特传下来的。

同布里亚特一起迁来的鄂温克人，原居住在我国境内的黑龙江一带，一六六九年被俄罗斯人所欺骗，其中有个叫钢特木勒的佐领，带领三个索木的人逃到俄国境内，虽然当时几经交涉，但仍未追回，一九二〇年，他们又与布里亚特一起迁入呼伦贝尔，大约有一百四十余户，六百多人口，一九二一年将他们组成两个索木，归索伦（鄂温克）左翼管辖，指定在海拉尔河、特尼河一带居住，其中一部分归布里亚特旗管辖。

总之，布里亚特陆续迁来，人口逐渐增加，到了一九三一年，共达到七百余户，三千余人口。

一九二九年，东北军阀受日本军阀的挑唆，夺取苏联的中东铁路，当年十月，苏联红军与东北军发生武装冲突，事件发生后苏联红军进入海拉尔。当时，一九二六年从苏联境内逃到呼伦贝尔的布里亚特贵族仁钦道尔吉利用战乱，趁机勾结巴彦，玛日嘎等富人和上层喇嘛，欺骗一些不明真相的牧民，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从锡尼河动身，翻越兴安岭，到达锡林郭勒草原。可是受到当地的王公、贝勒、贝子等人极力的反对和歧视，再三的驱逐他们，或苛以繁重的捐税。

一九三〇年，西藏的班禅额尔德尼来到锡林郭勒巡视，给仁钦道尔吉以可乘之机，他想方设法与班禅的亲信堪布胡格齐，翻译陶尼日希木巴等人勾结，将同去的布里亚特人，以拜班禅师的名义奉送给班禅，借此取得信任，从而在锡林郭勒站住了脚。一九三一年夏天，班禅从锡林郭勒到呼伦贝尔赐经叩得不少牲畜、金银等物品。班禅原打算乘火车返回，因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他只好改道经阿尔山回到锡林郭勒。这时，仁钦

道尔吉又与堪布等人勾结，把呼伦贝尔各牧旗献给班禅的大批牲畜送到锡林郭勒，以班禅的苏鲁克名义收留，然后派几名牧民来到呼伦贝尔把献畜赶到锡林郭勒，选择最好的草场——毛冬嘎放牧，在班禅的支持下，仁钦道尔吉在锡林郭勒草原又建立了一个布里亚特旗，自命为旗长。仁钦道尔吉为取得堪布等人的欢心，叫他在布里亚特选一美女为妾，当在暗中选定之后，该女发觉，单人匹马从毛冬嘎草原直奔呼伦贝尔，她经过千辛万苦回到锡尼河的布里亚特旗，与一名布里亚特牧民结了婚。

布里亚特蒙古人和鄂温克人迁入呼伦贝尔后，也象东北各民族一样遭受了日本帝国主义十四年野蛮奴役。

巴尔虎人的传统习惯

伊和忠·占其布

巴尔虎人从祖辈传下来的良习美德，惜今因时光的流逝有的已丧失殆尽或到逐渐被遗忘的边缘。今将其恢复过来对之两个文明建设、实现四化是大有裨益的。因此，我将亲见亲闻略述如次留给子孙后代以资继承。

一、敬老方面：青壮年人若与老年人见面时，不许衣帽不整，敞扣槽袖、掀襟吸烟，尤其没有醉酒持瓶见老人之现象。串亲探友进蒙古包时不能手持鞭棍、腰带马绊。进有老人屋时，不能从他前面通过，也不坐其上位，首先屈膝问安，然后跪坐于旁，绝不盘腿或稳坐。如无老人的许诺时横躺竖卧则必被斥责。在老人跟前伸懒腰、打哈欠、打饱咯、放屁等都是失礼现象，所以格外注意。在野外遇见骑马或乘车的老人，必须急下车马请安问好得到允许后方可走开。骑马同行时必在右侧，马头不许超前。如中途分路，先行请示，准许后下马等待老人走后才能上马慢行与老人同到人家，先接老人的马，拴好，并先去开门，进屋未坐以前铺好褥垫，双手捧碗端茶，敬酒须叩头以求吉言，如老人回赏酒用双手接过酒杯用中指沾滴酒抹在脑门上再将酒杯奉还，不能同老人一起用酒，也不能在旁平坐表现不敬。老人互相谈话时不许从中插话，只能侧耳敬听，老人有吩咐时须“是是”的倾听。称呼老人只能以您或某某的父母、某某的兄嫂相称，决不可以称呼你或直接叫名。

二、教育青少年大家都来负责。保持早起多一见，晚睡多一闻的习惯。始终依适应畜牧经济的需要教育后辈，使之习惯成性。青少年一旦做了错事，不论相识与否均可说服教育。如有不服不理的表现，负责交其家庭教育，对此无一家庭表示反对。更对偷摸撒谎、打架斗殴、喝酒闹事者予以谴责，甚至说句骂人话，见到或听到的老人则都说服教育之，勿须开会批评。对青少年从小就注意勤劳教育，每日叫他们早起在外边观察阴晴、风

向、冷暖等气象现象，并且注意观察昨晚释放的马还在与否，畜群定不定点，还叫看圈开圈、松一松绑畜绳索等，这一切做不到就要遭到责备，而再要求去做到。

父母对钱掌握得很紧，不让孩子们任意花钱，恐怕他们挥霍掉。家长防止孩子们好美，从小养成不穿新衣新靴，新做或新买的衣靴也要暂予保存，尽可能给穿戴稍旧的衣靴。饮食多以奶类与肉类为主，很少给糖果，告诉孩子们说：“锦衣不称身，糖类不利齿”。

三、充分利用畜产品，增加收入，减少支出。利用各类畜乳、乳酸、酪、酿酒，特别是到夏季，用各类畜乳多做奶食，准备冬春食用，一直持续到翌年牲畜下犊羔时仍有充足的食物，以利保护身体健康。另一方面由于掌握了接羔初期愈挤奶出奶率愈高这一规律，产奶一年比一年高。大畜肥，犊羔壮，皮厚毛细，耐寒性强的牲畜日益增多。

四、人人都关心牲畜，发现有无主牲畜就记它毛色、岁口、烙印、形色、发现日期，然后通告失主认领。由于这已成习惯，无一向失主取酬之说。在草原间走也好，无有不为畜群着想的人。若遇放牧人首先注意牲畜吃草，因怕耽误牲畜吃草，先看风向后，从下流通过，绝无由畜群中间穿过之理。如有季节性疫病，善于分析研究口蹄、怀孕、形色、粪尿等，然后与其主人交换意见、调剂牧场、交流管理方法以求牲畜的发展。井口河边有牲畜想喝水而无人照顾时，尽可能待牲畜饮完才走，如有人正在打水饮牲畜时则主动帮助打水而不能袖手旁观。从井旁迁移时，必将井淘净修好，毗邻几户同时搬迁时，先行者必然帮助落后或人手不足户卸包立包，拉马套车，对方也不愿自找清闲而叫别人多劳。

五、互相帮助紧密团结的生活，亲朋故友迁居时必亲切相待殷勤照顾。若逢杀牛宰羊，向隔壁邻居送血肠米饭等物，送给小孩以腰肝，有老人者送以做汤的肉。邻居要搬家则帮助动

址，有新户搬来也必然去帮助落址，大人如无暇去助，也派小孩前去帮忙。邻居如突然有病灾等祸，必然互相帮助。借用他人的牛马，用完必交给本人收管，如不交待清楚也不放入其本群，随便放在野外不管则认为偷盗行为。

时间非常宝贵。特别是早活儿多，所以牢记“晚了难于早，衰了难于复”这句话，天暖时，日出前不等绊马走远要牵回，放牛以前必须挤奶，以防犊吃过饱。夏季在蚊蝇骚动前必叫牛羊吃饱以利抓膘。乘凉迁移，日出前将马群圈回并且点好数。

迁居较远的人必须起早乘凉选好座落，又能防止牛马发热气喘。乘凉拣粪担水，还要注意酷热引起虫类繁飞，牛马跑蜂、役牛远走。冬季也起早迁走，选好座落，在晚风刮起前使畜群吃饱，傍晚在场地冻实前要使畜群归圈安息，属九后在早寒前起身，在畜圈里烧火燎烟，资畜取暖。

六、操办喜事必请亲朋参加。亲朋也只派一两个代表人物帮忙搞好喜事，不邀则不许来，如有不邀而来者，则不理不睬。喜事财礼少，时间短，不论什么喜事都不超半天，过时则由主持人宣布喜事结束。以“喜事喜办，嫩枝应长，话不应多，牛不远走，我非逐客，喜事已毕，请客启程”等话逐客，同时停止斟酒，这样除留住者外各自回归。过年时有走访拜年的习惯，春节的准备工作也很简单，给拜年的孩子以羊脂糖和一指宽肥肉，后来变为一块烙饼或半尺白布。那时富裕人家也同样，这说明旧社会物资缺乏是事实，同时也说明了旧社会牧民勤俭节约的一例。

七、恭敬父母，敬听长老教训，改正错误，坚持到底，如此事例很多。仅举一例：巴尔虎有一人（未记其姓名）生于一九一七年，今年六十六岁，解放时他二十九岁，当时离开他父母过独立生活。生活虽不富裕也无困难。当他三十岁那一年，他母亲听说他有几次醉酒情况，于是在一九四七年秋，其母双眼流泪跟他说：“你虽然没和别人打架斗殴，但我听说你经常喝醉酒，这是极其错误的。酒气冲天，其害无穷。我是从小穷苦出身，只有一只青

羊，还有一所破包，为人劳动，勉强维持生活。你现在享受国家工资，却胡做非为，是否应该？！”听其母亲的严格教育后，当其母面悔其过去，宣誓不再喝酒。从此十二年没喝酒。此时其母年老体弱，又把他叫到跟前，亲一亲他脸说：“我要离开人间了。我儿听我的话十几年没喝酒，今后也不要喝！”说完此话的第二天就逝世了。他到现在记其母教仍未喝酒。他在一九四九年时曾吸过好卷烟，每天吸两盒。他母亲把他叫到跟前问他：“你抽的烟一年多少钱？你给我算一算。”他算了一下说一百二十元左右，其母又问一头乳牛值多少？他说六、七十元，其母说：“你是否一年就把两头乳牛变烟抽掉？你已经吸烟成瘾，我不劝你了，希望你尽可能抽廉价叶子烟。”从此，他接受其母亲的教训，至今不喝酒，不吸高价烟卷了。

上述种种是我们古来的传统，当今正在宣传五讲四美、进行两个文明建设时期，为供做参考资料而汇记如上。

巴布扎布事略

正珠尔扎布

巴布扎布于一八七五年生在蒙古镇旗（原属索图盟土默特左旗）一个贫农家庭。他有一个哥哥，两个弟弟（其中一个出家当了喇嘛）、一个妹妹。巴布扎布自身有三男二女，我是第三子。

巴布扎布以后由蒙古镇旗迁居到苏鲁克旗（今辽宁省彰武县）乌和林果勒，再后又迁到大冷营子，在那里扎了根，成了富农。日俄战争后，成了官僚地主。

一九〇四年在我国领土上爆发日俄战争，这时巴布扎布二十九岁。当时，日本派遣一批军事间谍——松周胜彦、边见勇彦、大岛与吉等到苏鲁克旗一带招募“洋队”，巴布扎布也应募了。同时应募的还有张作霖、冯林阁等人。“洋队”的任务是扰乱俄军的后方，切断运输线，劫夺军需物资。后来，巴布扎布又率领一部分人参加了日本的永沼挺身队，并炸毁范家屯铁桥，切断俄军退路。

由于巴布扎布帮助日军“有功”，因而得到了许多武器、粮食和金钱，发了一笔洋财，充实了自己的实力，在地方上也出了名，部下也日渐增多。一九〇八年他被任命为彰武县区官，保护地方安全。后因打土匪有功，得过奉天将军赵尔巽的奖状（编者：据中国近代史词典第500页赵尔巽条“（赵尔巽）1905年出任盛京将军。1907年改任湖广总督。不久调任四川总督。1911年改任东三省总督”）。由于年代久远，作者在时间上的记叙，可能有误）。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清朝政权崩溃，当时外蒙古的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独立称帝。这个消息传到内蒙古各地，从来迷信皇帝的巴布扎布是不欢迎辛亥革命的。特别是内蒙古东部一带移来的汉族同胞日渐增多，苏鲁克旗亦被编入彰武县管辖。这样一来，大量的牧场变成耕地，处于以牧为主、半耕半牧的蒙古人感到

生活困难，逐渐向汉人稀少的地方移住，不利于巴布扎布对这部分蒙古族群众的控制。所以外蒙的独立，对他的思想影响很深。

一九一三年某天午夜，巴布扎布带着妻子儿女，领着三、四十名部下逃出了大冷营子奔向大库伦，参加蒙古独立。我那时才七岁，模模糊糊记着从家里逃出的情景：黑夜里突然全家坐了一辆七个马拉的大车，盖着被出了大门。屯子里群狗乱吠，前后都有骑马的人保护着。这夜雾下得很大，走出不远有人说后边有军队追来了，我觉得很害怕，不知走了多远的路程，才到金龙镇（以后经过的地方我已记不清了）。住了些日子再往西北通过奈曼旗、扎鲁特旗、阿鲁科尔沁旗、东西乌珠穆沁旗、阿巴嘎旗等地，把家族留在浩齐特旗，巴布扎布率领部队前赴大库伦。一路上跟汉人军队打了好几次仗，最激烈的是优贵吉尔庙一仗。

由大冷营子出奔以后，所经过的路上，蒙古人听说巴布扎布上大库伦参加蒙古独立的消息，很多人前来追随，到大库伦时已拥有二千多人马。

巴布扎布见了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和其他赛得（大臣），受到他们的欢迎和款待，当时的大库伦伪政权给了巴布扎布镇国公和镇东大将军等爵衔。

巴布扎布在大库伦住了一年多后，带着军队到哈拉哈河畔驻了约两年，主要是整顿和训练部队。当时呼伦贝尔副都统胜福曾送给他部份牛、马、羊、粮食、帐篷等物。

清王朝被推翻，清朝内务府大臣肃亲王与日本人勾结，亡命到旅顺。日本浪人头子头山满、川岛浪速、肃亲王、升允等人，在日本东京组织了以复辟清王朝为目的的宗社党。他们阴谋妄想用武力复辟，在关东豢养了一些军队。早在辛亥革命前，川岛浪速曾在北京日本公使馆当翻译，后来又做过清朝的警察教官。他与肃亲王交往很深，肃亲王亡命旅顺，也是川岛浪速为之策划的。后来肃亲王与川岛浪速拜为结义兄弟。川岛浪速没有儿女，肃亲王把自己的第十四女儿金璧辉送给川岛浪速作为养女，改名为川岛

芳子（川岛芳子后嫁给我二哥甘珠尔扎布为妻）。

巴布扎布驻在哈拉哈河畔时，宗社党想把他拉入党内，利用他们的兵力使清朝得以复辟。因此，川岛浪速派了几名日本浪人和他的义弟川岛浪平等到哈拉哈河游说巴布扎布加入宗社党。巴布扎布答应参加，并派其内弟塔萨到日本去联络。宗社党陆续向巴布扎布派去日本浪人斋藤、入江种矩（退伍工兵大尉）、本古辰二（日本陆大学生，后中途退学）、松隈据告（退伍军曹）、井上晴能、北录某等人，并秘密运给许多炸药子弹（藏在火柴箱内伪装成商品），从而加强了巴布扎布的武装力量。

为了表示诚信，在川岛浪速的斡旋下，肃亲王把第七子宪奎（金壁东）送到哈拉哈河。巴布扎布把大儿子浓乃扎布、二儿子甘珠尔扎布送到肃亲王家家里，双方易子为质，以坚信誓。

宗社党这样拉拢巴布扎布，目的是准备使巴布扎布率兵南下，攻打张作霖，先把满洲拿过来，然后进关复辟。

曾经有三、四个德国人带着通事和向导，骑着骆驼来见巴布扎布。听说他们的来意是游说我父亲出兵，攻击俄国的后方。这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我父亲答应没答应我不知道。德国人临走时赠给巴布扎布一箱德国匣子枪，他们走了不远，一部份士兵追上去，把他们全部打死了，时至今日我尚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巴布扎布把所属部队分成两个梯团，自己率领第一梯团，布恩巴扎布率领第二梯团，分路南下，准备攻打奉天城。军中高揭一丈多长的黄旗，人们称之为西喇奇力克（黄军之意）。南下之中，沿途参军的蒙古人很多，兵力达到三千人。一路上同奉军打了很多次仗，攻破了瞻榆县，进攻突泉县。这时吴俊升驻守突泉，在这次战役中，吴俊升肩部受了伤。巴布扎布又经郑家屯北上，进入南满铁路线郭家店车站。张作霖在各地调兵遣将，十万多奉军包围了郭家店，双方对峙了一个多月，日本当局为了保护巴布扎布的军队，借口满铁附属地带不允许双方交战，使奉军

不能很快解除巴布扎布的武装。宗社党又向巴布扎布提供四门青铜炮（日俄战争时日本用的旧式山炮），并派来一个退伍炮兵少尉西园元三郎。这时日本国内许多报刊杂志极力给巴布扎布涂脂抹粉，鼓吹什么“成吉思汗再来”，“蒙古独立的英雄”等等。

正在这时，袁世凯在国民的唾骂声中死去，日本大隈内阁改变了对华政策，不让宗社党活动了，宗社党只好叫巴布扎布撤回蒙古。巴布扎布无奈，准备退出郭家店，但是在奉军重围中突围撤退的话，要付出极大代价。为此，日本以在南满铁路附属地带不准交战为借口，由日本关东军公主岭的骑兵联队派出一个小队，打着日本国旗护送巴布扎布军队撤离了奉军包围。

巴布扎布率众准备再返回大库伦。取道双辽县，东科中旗、扎鲁特旗、阿鲁科尔沁旗等地，途中也不断与奉军交火。到了林西县，清晨时攻打林西县城。奉军在城内驻有一个旅。激战之后，奉军开始由西门撤退，巴布扎布刚要由东门闯进时，一颗流弹打中了左肩上就地阵亡。事后有人说是一个随从打的，真假至今不明。

巴布扎布阵亡，全军失去主宰。林西也不能打了，霎时人员四散而走。有的投降了张海鹏，有的投奔吴俊升，有的拉出去当土匪。色布精额则率领余部二百多人回到哈拉哈河，北上攻占海拉尔盘据了几个月之久，这期间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最后被呼伦贝尔地方军所消灭。

（编者注：该篇文章系正珠尔扎布先生一九六四年撰写）

丁巳年动乱

达喜僧格

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在呼伦贝尔地区发生了一起骚扰民众、坑害百姓的大事件，这就是色布精额匪乱。这个事件给呼伦贝尔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民众生活都带来了极大灾难。本文就是根据少宝迭（鄂温克族人，他当时曾亲自指挥索伦旗军参加了剿灭这股匪徒的战斗）和战士尼苏公（鄂温克族人）等人的叙述，对当时的历史情况进行整理编写的，若有错误不当之处，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袁世凯复辟帝制，坐了八十三天的“皇位”。当时内蒙古卓索图盟苏鲁克旗的巴布扎布和色布精额等人，纠集了几千人马，掀起了光复清朝政权运动，在哲里木盟等地煽动暴乱。但由于巴布扎布于一九一六年十月十八日晨被击毙于林西，色布精额之流率领残余匪帮，暂时驻扎在哈拉哈河地区。为了维持苟延残喘的局面，色布精额派了几名士兵游说于住在辉河和红花尔吉一带的鄂温克人之间，同鄂温克的格登布扎兰（扎兰系官职名），额鲁特（蒙古族部族之一）的那木吉勒佐领、班公扎布等人进行勾结，并欺骗住在这一地区的额鲁特和鄂温克族人，说我们都是蒙古人，不久我们就会合为一体，因而我们应该和睦相处等等。

在现在的鄂温克族自治旗伊敏公社一带，当时驻扎着呼伦贝尔南疆防卫军约七十余人，由照都荣佐领、少宝迭佐领统领。某天晨曦，色布精额率领一百多名匪徒突然袭击南疆防卫军，照都荣佐领带上几名士兵到前面了解情况，被匪徒开枪打死，同时还有三名士兵受伤。

由于事先没有防备，防卫军没有进行有效的抵抗。当色布精额步入防卫军兵营时，少宝迭迎了上去，他对色布精额说：“我们是要投降的，不过我们还有三百名士兵昨天开往哈日胡吉日地

带，如果逃出去的士兵（双方对峙时有几名士兵逃走）向他们报告我们被袭击的消息，他们也许前来救援，最好我立刻前去劝降，那么你们就无需动枪炮。”色布精额听他说得有理，就准许他去了。但是少宝送却骑马飞奔辉河，到了辉河，他对守卫辉河的士兵说：“色布精额匪帮袭击我们，照那荣佐领已被他们打死，估计那些匪徒还要攻打海拉尔，为使我们的家乡免遭灾难，诸位要准备好”。说完，带领二人飞奔海拉尔，去向副都统公署报告情况。第二天他们赶到了海拉尔，可是恰巧赶上副都统胜福去火车站，准备到齐齐哈尔。少宝送立刻赶到火车站，在副都统上车前报告了事件经过。副都统胜福听了之后说：“色布精额匪帮的突然袭击确实很危险，但他们必定逃脱不了覆灭的下场。你们要提高警惕，由于我们目前还不具备立即打击他们的条件，因此暂时躲避一下也好。辉河的鄂温克人可迁往满洲里，伊敏的鄂温克人可转到免渡河，南屯和西屯的达斡尔人可准备迁到齐齐哈尔，我们到了齐齐哈尔再作计划吧”。此后各地便按这个指令行动起来。

一九一七年阴历四月，色布精额匪帮侵入海拉尔，攻占了副都统公署，并建立了所谓“提督府”，委任鄂温克族人冯希嘎拉塔（嘎拉塔为官职名）为“提督府”都统，钟兴嘎拉塔为总管，额鲁特的那木吉勒佐领为额鲁特总管（那木吉勒佐领原是呼伦贝尔副都统公署的守门佐领。他任额鲁特总管后，巴结色布精额，狼狈为奸，沆瀣一气）。

色布精额这股匪徒掠夺成性，不仅庙宇的牲畜财产成为他们的抢夺对象，一般普通牧民的牲畜财产也多被他们所抢夺。更有甚者，这股匪徒还掘开东旗著名英雄杜嘎尔之墓，掠去其中所有陪葬物，引起很大民愤。

当时，辉河和伊敏河的鄂温克人经过密商，选出以兑其耐佐领、莫河荪佐领、陶民嘎佐领等人组成的十人代表团，派往齐齐哈尔，会见副都统胜福，向他汇报了色布精额匪帮的情况以及

鄂温克人已经决定组成五百人的军队，下决心要把色布精额匪帮赶出呼伦贝尔等方面的情况。此次代表团前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呈请副都统胜福批准他们的计划，并申请提供战斗所需的武器装备。经与副都统研究，决定于旧历八月十五袭击色布精额匪帮。

一九一七年旧历八月十四日夜，在海拉尔西屯北部的白沙丘上的拉普敖包旁修筑了工事。从呼伦贝尔各旗来的千余名士兵埋伏在海拉尔和南屯东西两侧。十五日凌晨，先向海拉尔和南屯进行了炮击，然后骑兵由东西两侧冲了进去。匪徒措手不及，乱成一团，死伤甚多。当匪徒二百多骑兵向南屯南面沿公路逃遁时，又遇到了鄂伦春方面军的火力阻击，当场有八十多匪徒被击毙。经过五个多小时的鏖战，共歼灭匪徒四百多人，取得了辉煌的战绩。

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的有鄂温克人兰巴尔、达斡尔人帕日郭图等六人，有两人受伤。从海拉尔突围的匪兵八十余人会同红花岗的匪徒共二百余人逃往大兴安岭去了。

呼伦贝尔政府方面军是在副都统公署的领导下组建的，而具体指挥这次战斗的是少宝迭、福灵等人。鄂伦春方面军的指挥是一个叫宝山的人，而他的助手是他的妻子宋海。宋海不愧是一个女民族英雄，当她看到匪徒从南屯南逃，竟双手各握一支十响枪，冲进匪兵中，挥动双臂左右开弓，打得匪徒溃不成军，狼狈逃窜。当时目击者无不赞叹其骁勇善战。

战斗临近结束时，在海拉尔还剩有少量残匪负隅顽抗，直到天黑也毫无投降之意。这时少宝迭大怒，拔出利剑冲进匪窟，连连砍倒七个匪徒，其余匪徒慑其威武，缴械投降了。

那木吉勒佐领窃去了额鲁特总管印，然后跟随亡匪逃到大兴安岭。这时额鲁特的一位通晓满、蒙文的年青人宝音图追至大兴安岭山麓，见到那木吉勒佐领，谎称说：“他们说勾结色布精额，要杀我，我听说后就逃到这里”。那木吉勒于是收留了他，他就和匪徒一起藏于山中数月，作了那木吉勒的秘书。后来他歇

准机会，窃回总管印，逃了出来，历尽艰辛，徒步回到家乡，把印交给了副都统公署。

歼灭了色布精额匪帮，背井离乡的各族牧民高高兴兴返回家乡。与此同时，恢复了呼伦贝尔副都统公署，并对在战斗中牺牲和立功者发了奖、记了功。又分别给照都荣佐领的儿子，帕日郭图的儿子，耐本格的弟弟等三人授与世袭哈本（名誉职称）之职。对于在战斗中受伤的鄂温克战士班扎拉格说、毛诺海等人奖以六品顶戴和黑翎。除此之外，对在战斗中立功者，视其功劳大小，分别予以记功、奖励和表扬。

色布精額匪帮侵入海拉尔始末

阿·恩克巴图

清朝雍正十年（1732）以来，巴尔虎、额鲁特等蒙古人、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和汉族等民族就劳动生息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上，为保卫国家的北部边疆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东清铁路的敷设，铁路职工、俄国侨民相继而来，此地便成了欧亚交通的要道。

海拉尔是呼伦贝尔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呼伦贝尔副都统公署设在旧城。当时海拉尔分旧城和新城。旧城主要居住着达斡尔族人和汉族商民，新城属于东清铁路管辖区（亦称站界俄语称巴尔恰）主要居住着铁路职工、俄侨以及少数欧美商人，设有俄国侨民事务局，管理侨民事宜，沙俄驻海领事馆和东清铁路俄国护路军也驻屯在这里。

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春，呼伦贝尔草原上，突然乌云笼罩，发生了惊心动魄的匪乱。

（一）

辛亥革命后，和日本帝国主义扶植的“宗社党”相勾结的巴布扎布匪帮，纠集四、五千人，扯起“勤王师扶国君”的破旗企图复辟，串扰内蒙各旗，后为张作霖、吴俊升军队所歼灭。巴布扎布本人被击毙，其残匪色布精额、本巴扎布等人纠合残匪千余人在1916年退至索伦山、哈尔哈河、呼伦贝尔南部一带，妄图生息养兵卷土重来。他们派人来海拉尔，向呼伦贝尔都统公署提出合作的意愿，但立即遭到了副都统肚福的拒绝。可是该匪帮仍赖在边境上不走。在此情况下，呼伦贝尔都统公署感到自己力量不足不宜于武力解决，为了缓和局势，便派都统公署帮办凌升等人携带数十辆牛车的粮食、防寒物资等前往哈尔哈河进行“慰劳”，受到匪帮的款待，双方保证互不侵犯。但色布精额匪帮贼心未死，假借做买卖，经常出入海拉尔市，住在日本特务机关如太阳堂、富山楼等处，与日本特务、浪人相勾结，探听我方内部的

情况，并换取武器弹药。又和与日本特务有密切关系的明保（黑龙江省西布特哈达翰尔人）相勾结，通过他拉笼呼伦贝尔副都统公署门官（相当于卫队长、佐领）那木吉勒（额鲁特人）。那木吉勒长于权谋，善于投机钻营，取得胜福的信任，都统公署的大小会议他都参加，内部情况无所不知，匪帮将他收买过去，窃探情报，作为内应。

二

色布精额匪伙，在哈尔哈河一带经过一冬的生息，恢复了元气，便开始进行入侵海拉尔的阴谋活动，先派明保去旅大、天津等地通款亡清肃亲王求援。

呼伦贝尔胜福等上层人物获悉色匪企图入侵海拉尔市的消息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对策。有的人认为匪军有日本人支持，又有现代化的武器，我们不能轻举妄动，要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求得解决；有的如凌升、福尔格图等青年官员主张用武力对付匪军，以绝后患。于是便派凌升等人去找沙俄驻海拉尔领事吴萨蒂。但他以不干涉内政为由，迟迟不表态。胜福等无奈只好加强防御力量，调兵遣将，在市内布署三百名兵力，派保安队营长荣安、根登布带领五百余名新兵驻屯在第一线新巴尔左旗南部罕达盖地方。又派嫩林陪同那木吉勒和日本人甘风（不知真名实姓的日本人），前往哈尔哈河，探听色匪的意图。色匪借欺骗表示绝不忘恩负义，绝不攻击海拉尔，等春暖后，便移驻他处。于是胜福等人，误以为真，便按兵未动。

经过一冬的养精蓄锐，色匪一到春暖的1917年的阴历四月，便将大批的匪徒集结在却金查干诺尔一带，准备进攻海拉尔。他们先让那木吉勒率领匪帮的先头部队来到驻防罕达盖地方的荣安部队，欺骗荣安说，胜福副都统要和色布精额在海拉尔举行谈判，派我到哈尔哈河迎接他们来海，不许开火，这是副都统的命令。荣安误以为真，任其通过。其实此刻，大批的匪军已绕过罕

达盖第一道防线，逼进南屯地带，直向海拉尔杀来。此时，胜福等人才看清了那木吉勒这个坏蛋，但时机已晚，难以防守，只好率领大小官员，放弃都统公署，撤退到海拉尔铁路管辖区避难。在东头道街俄国人开设的“诺米尔”旅馆内暂设办公室。

与此同时，南屯、西屯所有的达族居民，也随之逃到海拉尔铁路管辖区以及铁路沿线各站避难。

三

色布精额匪军侵入海拉尔后，首先占领呼伦贝尔都统公署，设总指挥部，废除都统公署，另设所谓的“提督府”。为了笼络人心，挟持车和扎（新巴尔虎右旗人，当时为副都统）为提督，邦贡扎布为帮办，明保为顾问，巴达玛齐木格充任俄语翻译官，还有乌泰、义尔格勒太等人为提督府官员，那木吉勒为额鲁特旗总管，但车和扎借口有病，没有赴任视事。

匪军占领海拉尔旧城后，为追捕胜福、贵福、凌升、福尔格图等官员，经常窜入铁路管辖区（即巴尔恰）搜查俄人住宅。当俄国人拒绝开门时，便强行破门而入，翻箱倒柜，甚至打死了一名俄人妇女。有一次，为了追捕凌升、福尔格图二人，匪徒几人窜进开往哈尔滨的国际列车上，鸣枪威胁列车长要交出两人，引起了东清铁路当局和俄国驻海拉尔领事馆的极大愤慨，提出抗议，随即严禁匪军窜入铁路管辖区扰乱。

胜福等人为了生命安全和保存实力，便离开了海拉尔去齐齐哈尔，在海拉尔铁路管辖区及铁路沿线的所有达斡尔人约千余人也都随之逃往齐齐哈尔避难。这些难民到齐齐哈尔后，人地生疏，生活无着落，死亡很多，尤其是儿童死的更多，情景十分悲惨，真是家破人亡，只盼望早日返回故里。

匪帮侵占海拉尔后，得意忘形、花天酒地，每日出动大批匪徒以巡逻为名，到处抢掠，搜刮民财，强奸妇女，无恶不作，商店关门，路断人稀。又派大批匪徒，到牧区各翼各旗，抢夺牧民

牲畜，甚至抢劫喇嘛庙，最后将庙烧毁，激起广大僧侣的愤慨。匪徒们随意打人杀人，索伦左翼的卓德仁佐领、新巴尔虎左翼的副总管多布丹巴勒朱尔、陈巴尔虎旗的骁骑校朋车布等都无故被打死。呼伦贝尔驻外蒙代表成德从外蒙返回途中也为匪军生擒作人质，经过赎金幸免于死。在这样骇人听闻的事端不断发生的情况下，新巴尔虎两翼的牧民纷纷逃到外蒙境内避难，有的便加入外蒙的扎萨克旗；陈巴尔虎的牧民移至三河一带；莫和尔图一带的牧民移入扎敦河以北的山区里；伊敏、辉河的鄂温克、额鲁特牧民去乌奴耳一带避难。

四

在齐齐哈尔避难的胜福，一到齐齐哈尔，便与黑龙江省当局取得联系。组织以贵福、凌升、柴安、福尔格图、倭格吉布等为幕僚的指挥部，拟定了收复海拉尔的具体计划。又向黑龙江省督军请求出兵援助，但由于他们正在发生内讧，自顾不暇，于是又派凌升前往北京向北洋政府求援，而北洋政府也无具体援助行动。只好派贵福、凌升、福尔格图等潜入海拉尔、满洲里、和留在呼伦贝尔的车和扎等各翼官员取得联系，发出各翼官员同心协力、驱逐匪军、收复海拉尔的号召。各翼官员纷纷响应，首先是索伦右翼旗副总管鄂温克人古勒格，带领堆西尼佐领以及达布、索米仓、额尔贺松、努恩格、罗占、贵青等十余名官民代表，骑着马绕过海拉尔一直奔到乌奴耳上火车到了齐齐哈尔，把胜福等人接入海拉尔。随之在满洲里召开了各翼官民代表会议，商定驱逐色布精额匪帮的计划，出席会议的有：呼伦贝尔都统公署副都统车和扎、新巴尔虎右翼总管齐布森格、新巴尔虎左翼总管玛哈扎那、陈巴尔虎旗巴雅嘎、额鲁特旗总管贡扎布，还有贵福、凌升、福尔格图、柴安等，以及地方知名人士牧民等数十人。会议决定各翼共抽调一千二百名民兵；军马、军粮、帐幕各翼自备，并指定进攻日期为阴历八月十五日午夜，进攻目标为海拉尔、南屯匪军的据点。各翼军队由车和扎、贵福统率。并指定各翼部队的

负责人。进攻方法：从海拉尔内部主攻，外部夹攻。另外又派福尔格图和达嘎去哈尔滨、赤塔向俄国人求援，又派成德去外蒙求援。

进攻日期——阴历八月十五日到了，但因各翼军队没能按期集结，又推迟了一天，十六日凌晨，由贵福指挥的以达斡尔人（多数是从齐齐哈尔返回的达族青年）编成的民兵向海拉尔匪军的据点开始进攻，由鄂温克人编成的民兵进攻南屯匪军据点。

在海拉尔街里展开了巷战，呼方军队以东关帝庙为基地向匪军的“提督府”进攻，匪众顽强抵抗，垂死挣扎，战火逼进铁路管辖区。俄国铁路护路军为保卫铁路安全和保护俄侨的利益，配合呼方军队，用四门大炮，轰击匪军。呼方军队立即占领了匪军巢穴——“提督府”。新巴尔虎、陈巴尔虎旗军队也赶到海拉尔外围，呼方军队士气高涨，火力猛烈，匪军被打的焦头烂额，企图从海拉尔撤退至南屯一带纠集残兵，正在此时，鄂温克人的民兵也进攻南屯据点，匪徒无力抵抗，从南屯向哈尔哈河逃窜。匪徒逃窜时，将南屯、西屯的达斡尔人聚居的村庄，付之一炬，所有房屋顿时火光冲天，全村变成了废墟。

色布精额匪帮从海拉尔、南屯向外蒙边界哈尔哈河逃跑，企图向外蒙境内亡命，但外蒙方面拒绝入境，派边防军将他们打出境外，匪军被打得几乎全军覆灭，其残匪四散，往南逃走了。

五

匪乱平息后，恢复了都统公署。对这次平乱中做出贡献的不论大小官兵都分别论功行赏。

平乱中牺牲的人员予以优抚。如成序，当时为副都统公署右厅厅长，胜福的得力助手。当色匪的先头部队临近南屯时，他恰好从南屯的自宅去海拉尔上班，中途为匪生擒，色匪头目亲自出面，软硬兼施，企图诱降，但他意志坚决，当面骂他们是土匪，受尽酷刑，始终没有屈服，当匪徒逃走时，将他杀害了。战乱平息后，为他举行了公葬，将名牌列入祀堂。

福尔格图，当时是都统公署帮办，在平乱中和凌升一样，是胜福的得力助手，在与匪军交锋时不顾匪徒的猛烈炮火，身先士卒，勇猛冲锋，不幸头部中弹，虽然急忙送到哈尔滨医院抢救，但终无效而牺牲，年仅三十三岁，为表彰他的功绩，举行了公葬，将其名牌祭在祠堂。北洋政府大总统规定其长子继承他的哈本（云骑尉）衔，并且其长子在学期间吃官费伙食到十八岁，对其老母、妻子和三个子女发给抚恤金以资慰问。

其它在战斗中牺牲的还有朋车扎（扎兰）、卓德仁等人，其善后事宜，也都得到妥善处理。

对于在此次匪乱中与匪帮勾结，出卖呼伦贝尔的分子，依其罪恶程度依法惩处。其中主要几个人的情况做一介绍：

明保，黑龙江省西布特哈人，早在民国二年，以参加呼伦贝尔独立事件，事泄未成，潜逃至海拉尔，与日本浪人、特务相勾结，为日本人搜集情报，为色匪入侵海拉尔出谋划策，匪帮占领海拉尔后，充当土匪“提督府”“顾问”，民愤极大；在匪帮占领海拉尔期间，他和古如二人带俄语翻译巴达玛齐木格去沙俄驻海拉尔领事馆，要求接管巴尔恰（即站界）的市政，要求东清铁路允许匪军人员自由旅行，沙俄领事馆，认为这种要求违背中东铁路合同，侵犯俄侨利益，将明保、古如二人扣留。战乱平息后俄国领事馆，将明保、古如二人引渡呼伦贝尔都统公署，都统公署根据其罪恶事实，报请黑龙江省当局，依法判处死刑，当即执行。

那木吉勒，原任呼伦贝尔都统公署门官兼额鲁特旗某佐领。早与日本特务相勾结，供给情报。民国六年色匪侵袭呼伦贝尔时与匪帮相勾结，里应外合，为匪帮占领海拉尔铺平道路。色匪占领海拉尔后，封为额鲁特旗“总管”，依仗匪帮，欺压牧民，民愤极大。战乱平息后，他畏罪与匪帮逃窜南下，据说逃至扎赉特旗后，走投无路，呜呼哀哉了。

此外，对投靠匪军，进行阴谋活动的根登布、额尔登布等人，予以免职处分。

仁钦道尔吉的部分罪恶事实

萨·哈木苏荣

布里雅特蒙古封建贵族、历史反革命分子仁钦道尔吉，顽固地坚持反革命立场，于一九二六年从苏联逃到呼伦贝尔。据说他来的时候偷窃苏联远东运输机关的资金三万二千卢布。来到呼伦贝尔后，他渴望当一个大官。但是，实现这个愿望并非那么容易。一九二九年秋冬，由于东清铁路问题，苏军和东北军阀之间发生了军事冲突。仁钦道尔吉利用这个动乱的机会，欺骗在锡尼河的部分布里雅特牧民（约七十多户），带领他们越过大兴安岭路经满洲屯、大石寨、图谢图、扎鲁特、阿鲁科尔沁等旗，在一九三一年的春季，到达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境内，在这里呆了一个时期后，经好其德王爷松金旺其格的批准，在毛登嘎西里草原定居了。他欺骗牧民，带领他们从呼伦贝尔到锡林郭勒的目的就是为了升官发财剥削人民。因此在毛登嘎西里草原定居后，在那里成立了一个布里雅特旗，他窃据了旗长的宝座，实现了多年梦寐以求的愿望。

从一九三五年始，仁钦道尔吉串通日本帝国主义，迫使已经与沙格德尔结婚的女儿迪米德离婚，重嫁给一个叫加藤（蒙古名叫南多尔吉）的日本特务，明里暗中巴结日本人，依仗他们的权势加强了自己的地位，猖狂压迫牧民，任意殴打、罚款、甚至处死刑，无恶不作。

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五年间，锡尼河的部分（约一百七十多户）布里雅特蒙古牧民移至科右中旗霍林河一带居住。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后，仁钦道尔吉趁机派人去霍林河，对那里的牧民说：“锡林郭勒的日本人都跑啦，原来的秩序已经恢复啦，该过太平生活了”等等，说这些好话拉拢他们，使这里的牧民又迁回毛登嘎布里雅特旗去了。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仁钦道尔吉本应被逮捕法办，但是

他以狡猾的手段逃脱了这一历史的惩罚。当时他采取了两面派的手法，一方面表示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另一方面却暗中勾结国民党，伺机叛变。仁钦道尔吉在苏联、呼伦贝尔、锡林郭勒等地，到处贪污、受贿、盗窃、欺骗，胖得象肥猪一样，因此牧民给他起的绰号叫大胖子仁钦道尔吉。

一九四六年，锡林郭勒盟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当时的盟长潮洛蒙同志亲自去布里亚特旗，向仁钦道尔吉交待了党的民族政策，还同意仁钦道尔吉继续当布里亚特旗的旗长，提出了要该旗建立小学校、医疗所和供销社。并表示在这些工作上，党的领导要给予支持。仁钦道尔吉假装拥护，但在暗中观察察哈尔、锡盟各旗、多伦、张家口等地的动态，同时与锡盟的反动王公、上层喇嘛等人联系、忙于叛变的准备活动。

潮洛蒙同志走后，他又采取两面派手法，以旗的名义作了如下决定：建立医疗所的工作由阿尤勒特贵（医生）负责；成立供销社的工作由哈木苏荣负责。还决定培养根登和道果尔尼玛为干部。并让这些青年跟随潮洛蒙同志去张家口等等。他们接受任务前往张家口的时候，仁钦道尔吉说，成立医疗所和供销社的工作，潮洛蒙同志帮助你们，你们先去张家口做准备工作。在这期间，我们准备运送车辆和价值五万元（银元）的牛羊到张家口去，如果不够的话，还有五万元的后备金等等，说了很多好话。

我们几名青年接受任务骑马去多伦的时候，仁钦道尔吉派了一名叫“黑獐子”的汉人给我们当向导。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个家伙不是向导，而是去多伦同国民党的特务联系。我们到多伦后，换乘汽车去了张家口。潮洛蒙同志在张家口亲切地接待了我们，并向乌兰夫同志作了介绍。乌兰夫主席明确地告诉我们：

“共产党和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一定帮助你们的工作，在布里亚特旗成立医疗所和供销社的问题，潮洛蒙同志从各方面来帮助你们，赵云驶同志帮助供销社的工作，科尔沁同志（科尔沁毕力格当时是负责内蒙卫生工作的，后来当了卫生厅厅长）帮助作医疗

卫生工作”。

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借给我们相当一笔款，我们用这笔款购买了药品、器材、布匹、绸缎、皮制品等必需品，装有十多辆车，送往布里亚特旗。根登和道果尔尼玛两名青年去内蒙军政学校上学了。这些都是共产党对布里亚特牧民的关怀和热心的帮助。但是，仁钦道尔吉一伙坏蛋却看成眼中钉肉中刺。他们坚持反动立场，跑到邻近的兄弟旗、以及察哈尔、锡林郭勒等地区进行骚乱，使人民遭受了很大的灾难，尤其是当地的布里亚特牧民的生命财产遭到很大的损失。这种说不尽的痛苦是永远不能忘记的。

一九四六年九月，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和它的直属机关暂时从张家口撤到锡林郭勒的时候，仁钦道尔吉反革命集团看时机已到，匆忙与旗内外帮凶开始叛变活动。首先，他们扬言：“国民党的军队占领了张家口、多伦等地，美国飞机给国民党投下了大炮、弹药、汽车、坦克”。如此吹捧国民党，诬蔑八路军，散布各种流言蜚语来欺骗牧民，并向邻近各旗宣传。“我们有很多的军队，也有很多的各种武器”等等，向国民党讨好。继而在一九四六年九月，仁钦道尔吉公开宣布：“我旗断绝与共产党的关系，建立同国民党的关系，接受国民党的援助”。同时与邻近克什克腾的伊勒登嘎、阿巴嘎旗的布德巴拉、阿巴嘎纳尔的喇嘛夫、关布、巴扎尔木汉达等反动派相勾结，扩大他们的反革命势力。

这样叛变以后，他们更加猖狂地进行屠杀、抢劫、恫吓等各种罪恶活动。如：

1、一九四六年春，他们秘密绞杀了本旗的牧民齐米德·道恩德格，又公开刺杀了扎布·巴特孟克。这两名牧民熟知他们一些反革命活动，而且是直接反对他们叛变活动的人。

2、一九四六年秋天，他们暗杀了一个包团长和他的两名随行人员。这个包团长究竟是为什么事来的还不清楚。有人说他伪满时，在通辽当过宪兵团长，有的说他是去蒙古人民共和国联系的途中被杀害的，还有的说是去乌珠穆沁为他的孙子娶媳妇

的。仁钦道尔吉则认为他是共产党的间谍。

3、一九四六年，他们杀害了在贝子庙南部巴彥胡哨种地的几名汉族农民（具体人数不清楚），抢去了他们的役牛和其他一些东西。这件事情是从当时在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锡盟工作的赛音吉雅同志的调查报告里了解到的。

4、一九四六年秋天，他们抢劫了在都兰满哈保管的解放军的布匹等军需品。这是由他们的同伙阿巴嘎旗的一名喇嘛报告而枪劫的。

5、阿尤勒特贵、哈木苏荣等人，在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和潮洛蒙同志的帮助下，从张家口采购的布匹、药品等在察哈尔明安旗和正兰旗人民的协助下，有时用牛车，有时用汽车带来的十多辆车物品，运往布里雅特旗后，被仁钦道尔吉一伙劫去，布匹、绸缎被他们个人分掉了，药品和器材之类的东西都被他们打碎扔掉了。

6、一九四六年秋天，锡盟政府让布里雅特旗给做了二百套军用皮裤，当牧民做完送去的时候，仁钦道尔吉下命令不许送给八路军。这样影响了革命军队的冬用衣服。锡盟政府要布里雅特旗出二百辆牛车粮食，当牧民运往边境地区的时候，又是仁钦道尔吉下令停运，迫使那些装粮车又返回来了。

7、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仁钦道尔吉下令，让一部分匪徒（大约二十多名）抢劫了贝子庙锡盟机关的十多匹马，当时在贝子庙革命队伍中的布里雅特青年巴图·多尔吉、桑吉扎布和我骑的马也被抢走了，这时因匪徒中有一人被打伤，他们知道这群马里有巴图·多吉尔的马，为了解恨便在回去的途中杀了这匹马，当做枪毙了巴图·多吉尔同志。他们把这次抢劫的马群赶到多伦，送给国民党，以表他们对国民党的效忠。抢劫马群时受伤的那个家伙，去抢马的时候，曾拿枪威胁桑吉扎布同志的母亲，并说：“我拿这个去会你儿子！”这些问题说明了仁钦道尔吉匪帮与革命人民是多么不共戴天的呀。

8、仁钦道尔吉等少数人叛变后，对革命者或对他们不满的人，采取各种歧视、迫害、暗杀等罪恶手段。有几名青年如：阿尤勒特贵、道尔吉、桑吉扎布、哈木苏荣等四名青年被迫跑到了解放区。他们走后，匪徒对他们家属，进行拷问、抄家。当时逮捕我父亲和桑吉扎布的母亲审问：“你们的儿子到哪里去了？去的时候说了什么？现在他们在那里干什么”等等。把这两名老人带到旗衙门，强迫劳动了一冬一春。逼迫阿尤勒特贵和巴图·多尔吉的全家人搬到旗衙门附近，然后用各种办法调查、询问，连他们的亲属也没能逃脱被调查和追问。结果多吉尔同志三岁的孩子由于惊吓得了重病。他们把这些青年家冲的牛羊赶到旗衙门，给他们的侍从和匪军杀吃了，马群中能骑用的马都被匪徒们抢走了。

9、一九四六年的冬天，同阿尤勒特贵同志一起去讨伐土匪的内蒙古骑兵第十六师的十二名指战员，全部被匪徒抓住杀害了。

10、一九四七年春天，仁钦道尔吉匪徒与克什克腾、阿巴嘎旗的匪徒合伙，连续向克什克腾的达尔汉山、锡林郭勒的贝子底等地袭击，抢劫了许多马、骆驼和枪枝；抓走了革命干部、职工、牧民等多人，在旗里公开杀害了克什克腾的青年干部呼尔勒道嘎尔同志。

11、一九四七年四月，仁钦道尔吉匪徒中一个叫沙格德的头头，带领三十多名匪徒抢劫了在东苏尼特旗贝勒庙（又称陶高特庙）库存的我军重机关枪两挺、轻机关枪八挺、大小迫击炮八门、掷弹筒几个。自此，他们的反动气焰更为嚣张了。

这些是仁钦道尔吉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期间犯下的几个突出的罪恶事实，他们一伙人明里暗里搞的其他坏事还很多。这样给锡林郭勒布里雅特旗的一千多名无辜人民和邻近各旗的人民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一九四七年夏天，人民解放军歼灭了这一匪帮，仁钦道尔吉等几个头头终于被捕归案，受到了应有的惩处。

以上是我所知道的一些具体事实，如有不足和欠妥之处，请予指正。

扎赉诺尔煤矿第一个工会的诞生

何德全调查整理

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但是，沙皇残部还在作垂死挣扎，他们在边远地区流窜，企图把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当时，谢米诺夫匪徒则越过中苏边境，占据扎赉诺尔煤矿和东清铁路沿线。

经营扎赉诺尔煤矿的帝俄资本家司卡杰里什卡（俗称谢杰斯），在谢米诺夫匪徒的羽翼下，继续对扎赉诺尔的矿产进行疯狂的掠夺，对煤矿工人进行残酷的镇压。苏维埃政权对身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工人阶级非常关怀，为了让中国工人得到马列主义真理，为了消灭谢米诺夫匪徒，一些苏联共产党人冒着生命危险，来到了东清铁路沿线，到扎赉诺尔煤矿的名叫瓦西里卡克。

瓦西里卡克为人热情，很快和中国矿工王世杰、张大海等人交上了朋友。他学会了一些汉语，张大海也学会了一些苏联话，语言通了，瓦西里卡克开始讲他亲身经历的十月革命；讲列宁、斯大林；特别着重讲十月革命前后的工人运动和工会情况。

王世杰、张大海等受到了教育，得到了启发。在瓦西里卡克的帮助下，在扎矿俱乐部成立了工会。经过会员选举，王世杰被选为会长，张大海等三人当选为委员。

中国北部边疆第一个工会诞生了，从此扎矿工人有了战斗堡垒和参谋部。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不断得到从苏联来的报刊。这使他们逐步认识到了工人阶级是创造世界的主人，认识到了团结起来就是力量，认识到了只有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工人阶级才能获得彻底解放。一场反对帝俄资本家，反对封建把头大柜，反对军阀的英勇斗争有了坚实的基础。

王世杰及委员和积极分子周密地进行研究后，决定要以罢工来迫使帝俄资本家、大柜把头补发拖欠两年之久的薪金，使他们以后不敢再这样做。

罢工在各大房子，在各矿井串连着，得到了穷苦矿工的支持和拥护。罢工开始那天，上工的汽笛一响，各大房子的工人很快汇合到一起，奔向穆锡九大柜。

穆锡九是帝俄资本家司卡杰里什卡和军阀吴俊升（吴大舌头）共同豢养的一条哈巴狗。平时，他仗着后台的势力，在矿工面前耀武扬威，他手下的把头、拉杆，对矿工张口就骂，抬手就打，从来没把“煤黑子”放在眼里。工会组织的三四百名工人，突然围住了他的大柜，这可把穆锡九吓坏了，他赶忙要电话，向“护路队”求援。

王世杰和张大海等工会领导人，已经来到了穆锡九面前，在穆锡九的耳风中，把王世杰传神啦，什么会武术、什么飞毛腿，是真是假他半信半疑，可到了这时，王世杰身后站着几百名工人，他确实害怕了。

工人们大喊大叫，按预先定规好的条件，逼向穆锡九，让他答复。

王世杰说：“我们工会组织罢工，是你们逼出来的，两年拖欠工资，矿工怎么活？告诉你，不补发工资，我们决不复工。”

这时，接到电话的护路队，对天放着枪，赶到了。枪一响，矿工们可火了，一些人想收拾护路队。

王世杰接着预先合计好的步骤，领着罢工工人撤离了。这使护路队、穆锡九都成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护路队荷枪实弹，分两路贴墙根跟随着罢工队伍。

王世杰把罢工工人领到了锅炉房，工人们立刻大喊起来：“不发工钱拆烟囱，少发一个钱砸他的锅炉。”说着，人们已经拿起砖石瓦块，铁锹大镐干起来。

穆锡九和护路队的人马赶到锅炉房，罢工工人早无影无踪了。穆锡九伤透了脑筋，组织起来的工人，在工会领导下的罢工很难对付，他想挺一下，不上工，不开钱，看看矿工挺住挺不住！

一晃儿一个月过去了，工人没有一个上工的。司卡杰里什卡和穆锡九进行了磋商，统一了意见：由穆锡九出面，分三个步骤对工会进行瓦解。

头一步，穆锡九亲自拜访罢工工人，他带领把头拉杆的挨个大房子转，又是赔礼，又是道欠，张口兄弟，闭口哥们，叫的脆甜，罢工工人等他们表演够了，就开门见山发问：“拖欠的工钱发不发吧？”一入正题，穆锡九的脸色就灰了，揣进兜里的钱，他是不肯轻易掏出来还给工人的。

工会看出了穆锡九要破坏罢工的阴谋，串连各大房子，不理穆锡九这个茬！

头一步失败了，穆锡九使第二招。请王世杰、张大海几个领头的赴宴。

谁都知道这宴是他们的阴谋诡计，去不去，工人们做了研究。王世杰说：咱工会领导的这场罢工，让大伙勒紧裤腰带挺了一个月。现在，咱们不敢出面，理就叫姓穆的抓去了！就是刀山火海也得去。”

工会的领导人分了一下工，王世杰“赴宴”，张大海几个人组织工人当后盾。

穆锡九听说王世杰亲自来，正中下怀。他吩咐手下人，准备了金币、哈大洋，准备了最好的酒菜。

宴会那天，穆锡九穿戴整齐，坐着马车到大房子去接王世杰。他想叫罢工工人看看，你们会长和穆锡九坐到了一辆车上。他赶到大房子，工人们告诉穆锡九：“我们会长已经赴宴去了。”

这时，王世杰已经到了宴会地点。司卡杰里什卡也早来了，穆锡九一回来，王世杰就推了牌：“拖欠的两年工钱怎么办？”穆锡九避而不谈，送上了金币、哈大洋，忙着上菜斟酒。

“我拿这几个钱，吃这山珍海味，他们怎么办？”王世杰指着已经赶来的罢工队伍，说完就回到了工人队伍里。

两招都告吹后，穆锡九走了，他到齐齐哈尔去搬兵，请他的

拜把兄弟吴俊升督军来帮忙。

吴俊升出身土匪，是东三省的军阀之一，当时，掌握着这一带的兵权印把，这人是个糊涂虫，他要起了杀机，罢工工人真要吃亏。所以王世杰、张大海、瓦西里卡克和委员们详细地研究了对付吴俊升的办法。

吴俊升带兵到扎矿，就象一群凶神恶煞从地狱跑出来，闹得鸡飞狗跳墙，人心惶惶！人们知道在穆锡九的煽动下，这家伙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这个土匪，拿着杀人当儿戏，吴俊升在扎矿一落脚，司卡杰里什卡、穆锡九、把头就都把他围住了。

穆锡九对失去了沙皇作后台的司卡杰里什卡，早就离心离德了，他认为这个帝俄资本家已经成了丧家之犬，迟早要完蛋。这次，请吴大帅来，一是镇压工人罢工，二是趁机挤一下司卡杰里什卡的势力，让他掏腰包补发工人工钱，自己取司卡杰里什卡而代之。

司卡杰里什卡对吴俊升的到来，是又喜又怕，喜的是借督军之手，可以镇压工人罢工，怕的是沙皇倒了台，自己没靠山，倘若这位督军老爷一翻脸，自己不但得掏腰包，赔老本，弄不好，连煤矿也丢了。他一手给吴俊升送礼，一手拉拢把头、拉杆，让他们替自己说话，一挡吴俊升，二堵穆锡九，三又发展了自己的势力。

把头、拉杆的也有自己的算计，从沙皇垮台，穆锡九就和司卡杰里什卡分庭抗礼。他们被俄国资本家挤一下，被穆锡九大柜压一下，捞油水的机会很少。这次司卡杰里什卡给了他们好处，本应该去替俄国主子说话，可谁都知道“大帅”是穆锡九的把兄，一但话传到穆锡九那儿，事情就麻烦了。

王世杰和工会的领头人对这些事知道得一清二楚，单等这些狐群狗党咬起来，利用他们的矛盾打它个措手不及。

吴俊升决定用武力把工人大罢工镇压下去，他找来了司卡杰里什卡、穆锡九、大小把头和拉杆的。

穆锡九悄悄嘀咕：“怕是坐不到一起。”吴俊升瞪起眼睛，“管什么俄国资本家，什么大柜把头、拉杆，关上门儿都是一家人”。

吴俊升亲自主持的秘密会议开始了。

王世杰和工会领导人一直在注视着军阀、大柜、帝俄资本家之间的勾心斗角。他们听说吴俊升召集了各方头儿脑儿，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召集起罢工矿工和他们的家属，把会场团团围住。

吴俊升一听就暴跳起来，他喊着：“妈的，闹到本大帅头上来了，给我用枪炮侍候！”

这使司卡杰里什卡和穆锡九慌了手脚，他们央求吴俊升不要盲目开枪。这绝不是他们怕死几个工人，而是怕“大帅”贼性一起，把廉价劳动力全部报销了，那就使他们赔了老本！

这时，王世杰、张大海领着家属和矿工按合计好的口号喊起进来。

“坚决请大帅作主，让穆锡九补发工钱！”

“坚决请大帅作主，叫谢杰斯补发工钱！”

穆锡九和司卡杰里什卡没想到工人会把他们分开斗，捧着吴俊升打他满。

“你们他妈的不是说煤黑子整本大帅吗？他们怎么叫本大帅作主呢？”吴俊升狠狠瞪了穆锡九和司卡杰里什卡一眼，传令叫领头的进来。

王世杰、张大海和另两个委员，穿过层层枪林，走进屋来。

吴俊升劈头就问：“你们为什么领头闹事？”

王世杰把司卡杰里什卡、穆锡九拖欠两年工钱不发，工人实在没法活了的情况说了一遍，是真是假让大帅亲眼看看。

吴俊升看到窗外的矿工，一个个穿得条条缕缕，破破烂烂，孩子光着头，赤着脚站在雪地里，喊着，“饿呀……冷呀——”

王世杰说：“矿工们都知道，大帅明镜高悬，爱民如子，看到老百姓这样苦，心里一定很难过吧？”

“难过！难过！”吴大舌头被两句话捧晕了。他向穆锡九和司卡杰里什卡发起威来，“你们他妈不知道，本大帅从来明镜高悬，爱民如子吗？你们克扣工人工钱是真是假？”

当着矿工和他们的家属，当着杀人如斩草的土匪大帅，穆锡九和司卡杰里什卡谁也不敢说谎，谁也不能把谎话说周全，两个人互相推托起来。

王世杰火上浇油：“老百姓都知道，大帅向来铁面无私，替民作主！”

“对！谁不知道本大帅向来铁面无私，断案如神！”这个土匪当了几年督军，掌了几年印把，也得到了一点知识，手下人告诫他的话他往耳朵里也进了一点儿，“众怒难犯啊！”

穆锡九已经给了他不少好处，还答应给他几千大洋，多少个金镯，作为整倒司卡杰里什卡的条件，于是就宣布：全部拖欠工钱由司卡杰里什卡限期发放。

“我认掏一半，剩的也捞了……”司卡杰里什卡知道顶不住，认了一半帐。

“掏一半，混他妈蛋，别说老子叫你发几个臭钱，就是要你的一个脑袋，你也不能给半拉！”吴俊升的贼性一起，丧家之犬司卡杰里什卡就囫住了。

穆锡九喜形于色。吴俊升早就算计好了，坑了司卡杰里什卡，也便宜不了你姓穆的人，不填满本大帅的腰包，也饶不了你穆锡九。

司卡杰里什卡答应了工会提出的全部条件，所欠工钱照发，穆锡九也没幸免，让“大帅”敲了一顿竹杠，几乎连老本也赔了进去。

扎赉诺尔第一个工会领导的罢工斗争胜利了，扎赉诺尔煤矿的工人阶级在斗争中，认清了一条真理：“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取得胜利！”

“九·一八”事变后，苏炳文军队 在海拉尔的抗日活动

于家田

我是在一九三一年三月间，来到海拉尔居住的。当时海拉尔属黑龙江省管辖。设有副都统府、呼伦贝尔道尹公署，和呼伦县衙门，并设有警察特别二区。

苏炳文是在一九三〇年来海拉尔的，担任旅长职务，人们称他为苏司令，有一个旅的兵力，分为三个兵种：步兵、炮兵、骑兵，驻扎在满洲里、海拉尔、碾子山、朱家坎、富拉尔基各铁路沿线，受马占山的总指挥。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出兵占领了奉天。国民党反动派采取不抵抗政策，由东北退入关内。此时稍有爱国思想的中国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无不痛恨。苏炳文作为军界人物，当时立志反日侵华，浴血奋战。有一天在东头道街体育场内（现在的陵园）召开群众大会，讲演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号召各界人士行动起来，支援抗日救亡运动，在讲演中响起了群众的热烈的掌声。从此，每天都有些军人手持三角红旗，上写“招兵”二字，在各街头巷尾招兵买马，据了解有不少没有职业的人被招去当兵，不久送往前线。到了一九三一年冬日军又继续向黑龙江北部进犯，其目的是要占领海拉尔等地。苏炳文将主要兵力调到富拉尔基、朱家坎、碾子山等前线，奋起抗敌。但坚持不久，传来了停战消息。据当时有些人分析，可能是有以下原因，一是双方力量相差悬殊，抵抗不住；二是伤亡甚重，又无后备力量的援助；三是用缓兵之计，等马占山援兵。在苏炳文突然下令停战后，满洲里某连一个班有十余人，抗命不遵，全副武装拉上山。苏炳文闻讯后大为恼火，立即派出一个连的兵力追捕回来，拿到海拉尔司令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将其中两名主要

发赴人判处死刑。当时我很年青，一直跟到刑场，见他们二人均系廿多岁，每人乘坐一辆马车，他们面不改色，毫不畏惧，车行到两大街益丰商店门前，要求停车，每人要一块红绸子，一双新鞋，只听他二人嘴里不断骂苏炳文“汉奸卖国贼”等，并说，“死也不当亡国奴”。听有人说，“可惜！真不愧是抗日的民族英雄”。走到南烧锅，又要求停车，每人要一大碗酒喝，就这样到南门外刑场被枪决了。

在双方停战后，苏炳文的兵力并未撤退，日本的兵力也未伸到海拉尔。在一九三一年冬，日帝在海拉尔向阳街（现在的三八粮店北部）成立了警备队，大约有三十人，由日本人负责训练。该警备队成员均系上层官僚的子弟、流氓分子。警备队的活动，从现象上看他们每周到飞机场一次，去迎接日本的飞机，日本飞机定期每周来海一次，每逢来时先在海拉尔上空盘旋一周，然后降落在飞机场（即苏侨坟墓地东北山坡）。在降落之前，有警备队成员廿余人到该地，用桦木板燃火为号，方可降落。降落之后，有警备队在周围站岗放哨，戒备森严，除日本人和持证件的人员外一律不放进。以后听说，该飞机是每周互通情报一次。海拉尔的情报是一名日本大奸细叫寺田利光负责，该人是在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华以前派进海拉尔，他是在松江旅馆以接待旅客身份潜伏在海拉尔的。警备队成立以后，他公开活动，他住在海拉尔东头道街路南红砖房（现在陵园的对面），人们称他为寺田顾问，在他的手下有几名佣人，其中有一名汉族姓周（该人在解放时房塌被压死）是寺田的忠实走狗，每次日本的飞机来海拉尔，都是他到机场送递情报。

某一天的早晨，苏炳文的营房周围架起了机关枪，并包围了日本组织的警备队，将他们全部活捉，同时也包围了飞机场，并开枪击毙数人（其中有日本人）其余人大部分逃跑，这些人跑到北山见有骑马放牧人，开枪打死了两名放牧人后骑马逃窜。

当日的十时左右，日本的飞机来了，在海拉尔盘旋，苏炳文

的军队开枪射击，飞机见势不妙，飞跑了，几天后听说该飞机因汽油用尽，坠落在富拉尔基附近。在飞机溜走后，苏炳文的军队开始囚禁日侨，驾驶着大汽车，跟着满街的士兵和老百姓，到所有的日本人开的商店挨门逐户搜查，如昭和盛当铺，各料理店的日侨全被活捉，包括寺田大特务也被捕。听说将这些日侨全部囚禁在“松江楼”料理店内。当时有的人说“还不将这些坏东西杀掉！”也有的说“不用忙，等战争一激烈，全部杀掉”。以后无声自息，直到马占山率部撤退后，才得知一个未杀掉。

一九三二年秋，马占山指挥部队在江桥一带同日军作战。这次战役伤亡甚重，最后弹尽粮绝，只好退守海拉尔。此时中东铁路火车不通，海拉尔通往哈尔滨的咽喉要道被日本人截断。当时，海拉尔人心慌慌，担心买不到粮挨饿，所以曾一度出现抢粮风。

有一天，苏炳文在东头道街体育场召开群众大会，并作了讲演。还有某校的老师也讲话。在讲演中边讲边落泪，慷慨激昂，学生和群众同声高喊“我们要抗日救国！”“誓死不当亡国奴”等等。师生们不怕严寒，手持三角形各色纸旗，上写“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抵制日货！”“中国人不买日本货！”。并为抗日前线英勇奋战的将士们募捐，支援抗日救国。不久传来捷报，说有一个连的守备队，号称铁孩子军，在前线英勇奋战，打退了日寇的多次进犯，这些人年青力壮、精明强悍，装备也好，每个战士一把单刀，一只手枪，专打白刃战，杀得日本兵望风而逃。中国人闻讯后奔走相告。事隔不久，传来不幸息消，说苏炳文败退了。

某一天夜间，马占山、苏炳文率部由满洲里撤退到苏联境内，投往何地不详。该军队撤走的当晚，在新街就有几户商号被抢。

过了三五天，日寇长驱直入，占领了整个中东铁路和滇南铁路沿线。并进驻海拉尔。日本军进入海拉尔时首先从铁路开进一列车。只见有些士兵下车后先将铁路和海拉尔的电话线全部剪

断，就在当夜开进来军用大卡车有百辆左右，全停在中央大街，到第二天就都不见了。接着又进来部分马队，大约有数百人。每天在主要街道上骑马游行，看样子好象是对中国人示威。从此，海拉尔和东北的其它地方一样，沦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使我们过了十四年的亡国生活。

伪满兴安东省的成立经过

巴达荣嘎

一九三一年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东北军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忍辱退出了沈阳。正当此时，以哈丰阿等人为首的东北蒙旗师范的蒙旗学生聚议，要趁此混乱之际组织内蒙自治军，要武装摆脱国民党的统治争取内蒙自治，同时号召各地蒙族组织地方武装起义。当时布特哈达斡尔族出身的日本留学生绰罗巴图尔（郭兴元）、绰克巴图尔（德树元）、吉尔嘎朗（德古来），还有上海美术学校的学生耐勒图（鄂恭元）等人参与组织了内蒙自治军。他们当中的绰罗巴图尔回到布特哈（现在的莫力达瓦旗库如尔齐）一带，和东北蒙旗师范的一些达斡尔学生组织起武装队伍配合内蒙古自治军活动。齐齐哈尔一带也有放瑞平等组织了一些人。

内蒙自治军一度占领通辽以后，未守住，又被国民党军队夺回。正待组织再夺回时，却被日本军占领，并扬言要帮助蒙古自治。日本关东军方面与蒙古王公联系，叫他们出头拥护伪满皇帝。交换条件是：维护蒙古王公的利益，并答应在蒙古地区确立兴安四个省，在伪首都长春成立一个兴安局，管理四个省的事务。后又改为蒙政部。

蒙古王公和上层都表示拥护溥仪当皇帝，而且还都参加了溥仪的登基大典。这样一来，哈丰阿等人所组织的内蒙自治军也没有必要存在了。所谓的自治也由兴安四省所代替了。自治军的历史任务已经完结，也无人提倡什么自治了。内蒙自治闹了短暂的时间，却换来了兴安四省。后来兴安局改为蒙政部以及兴安四省的头头都任命了蒙古王公或者民族上层，对此蒙古王公表示欢迎。因为王公们的利益不但未被侵犯，反而受到保护，并且还当了官，于是哈丰阿等人的主张也就不了了之。

兴安南省的范围是现在的哲盟，兴安西省是现在的昭盟

兴安北省是呼伦贝尔盟。这三个省的土地原封不动，其中兴安东省却占了很大一块土地。原来，东布特哈归洮河县，西布特哈归布西县以后，东西布特哈没有什么土地，只剩下历史的名称布特哈，但由于达斡尔族的青年们配合内蒙自治军活动的结果，分设兴安四个省的时候，也有他们的一份，这就在比原来的东西布特哈还要大得多的地方上建立了兴安东省，省会定在布特哈旗的扎兰屯。兴安东省下设五个旗，即布特哈旗、阿荣旗、莫力达瓦旗、巴彦旗，其中巴彦旗包括现在的鄂伦春旗。另外还有一个喜扎嘎尔旗，旗政府设在索伦。兴安四省刚开始成立时，叫兴安四个分省后来升为兴安省。伪满才年的时候，把兴安四省又合并为兴安总省，原来的省成为兴安总省的派出机构，设一个行政公署。这个时候，兴安局也名存实亡，蒙政部早已撤销，兴安总省直接归伪满国务院管辖。

兴安四个省的省长都是蒙古的王公或民族上层人物。兴安局长是扎嘎尔，原是兴安西省的省长。蒙政部大臣是齐木特、色木石勒，这两个人都是王爷。兴安南省省长开始是业喜海顺，也是王爷。兴安北省省长由达斡尔族凌升来担任。省长下面的厅长、秘书官、局长也都由当地的民族上层人物担任。以兴安东省为例，省长是原洮河县东布特哈八旗筹办处总办额勒春，总务厅长是他的老同学、老朋友、还有点亲戚关系的一个人担任，尽管已快入土也不能上班，但仍拿俸禄。这个人死后由巴金保来担任。巴金保原来是布特哈青年教育促进会的会长，对教育达斡尔、鄂温克族青年出过力，他曾把自己住的房子腾出一半，让那些穷苦的从乡下来洮河县城上学的达斡尔族青年们居住，自己全家挤在一间大房子里。兴安东省的民政厅长是志达图，他在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学习过。其它各旗的旗长，警察局长等都由那些中华民国时期的大小官吏、民族上层们担任。唯有一个特点是：省公署的各科长均由年青的达斡尔、鄂温克族青年们担任。如总务科长吉尔嘎朗（德古来）、会计科长阿恒泰（敖恒泰）、劝业科长绰克巴图尔（德

树元)等人都是二十七、八岁的年青人。“九一八”时组织武装配合内蒙自治军在莫力达瓦旗库如齐一带活动过的绰罗巴图尔(郭兴元)当上了兴安东省警备军司令官。其它参加过武装活动的一些同伙不少人都参加了伪军队,当上了大小不等的伪军官或伪官吏。

兴安东省刚成立的时候,除了有一名日本中村参事官以外,日本人没有几个。实权都掌握在达斡尔族青年知识分子手里,他们为了教育下一代在文化、教育、卫生事业方面下了一些功夫。在各旗所在地,努图克所在地都设立了小学校,卫生院,卫生所等。当时扎兰屯有一所师道学校(初级师范)和一所国民高等学校(等于中学),还有一所女子国民高等学校,只收蒙古、达斡尔、鄂温克族的学生。莫力达瓦旗还设立一所农业学校。从这些学校出去的学生中有不少升入国内各大学,如沈阳南满医科大学、建国大学、吉林师道大学、长春政法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等,还有用蒙旗协助会的钱,去日本留学的。值得提出的是,达斡尔族的女学生也增加了不少。二十年代初期,东布特哈八旗筹办处向南京保送几名达斡尔、鄂温克学生时,其中就有两名鄂温克族女学生,名叫涂景芳、涂景文,当时这种打破封建礼教的阻挠,挺身而出求学的勇敢行为在布特哈地区的达斡尔、鄂温克族人中引起了轰动。在此以前,也有几名达斡尔族女生到苏联学习,在这几名女青年的带动下,到伪满时上学念书的达斡尔、鄂温克族的年轻女子就越来越多了。

随着日本侵略者对东北各地统治的深入,日本帝国主义对兴安东省的殖民统治也加强了。刚开始时,好像是你们的事,你们自己办。但不久就开始大量地派来日本人。从省到旗县的大小参事官都是日本人,而且说了算,一切大权都由日本人掌握,正职从省长、厅长、旗长都成了名符其实的傀儡,后来,连兴安东省的各科科长也都换成日本人。于是有些达斡尔青年对此不满,言论上如有外露,重则以思想不良,反满抗日来整,轻则把你调走,

而且暗中盯住。到了日本垮台以前，日本人对一些有知识有文化的达斡尔族青年更加怀疑，特务们施展了用明暗两种手段对伪满的大小官吏进行监视。

“八、一五”日本投降了，在原来的兴安东省的基础上，又建立了纳文慕仁盟，只有喜扎嘎尔旗划归兴安盟。

解放当时，达斡尔、鄂温克族的知识分子很快接受了马列主义，认识到自己的民族只有跟着中国共产党走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成立了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实现了真正的名符其实的自治，实行了真正民族的自治。

修筑海拉尔北山要塞劳工的悲惨生活

张玉普口述 张福祥整理

伪满康德二年（1935年），日本侵略者在我家乡河北滦县北小渠一带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致使生活无法维持。无奈，我被迫离开家乡，来到郑家屯。当年二月的一天，我在街上碰见一伙招工的人，他们声称：“去东山里开荒，每天工钱壹元伍，吃三顿馒头。”我信以为真，就报名应招，没想到却掉进虎口。

我们这些应“招”的人，被集中在郑家屯一个大四合院的旅馆里，一共有四百多人。第二天，我们这些人就被装进五、六个大闷罐车厢里，车门上锁，只留一个窄缝。车开后，有一个去过东山里对当地地形比较熟悉的人对我们说：“这不是去东山里，这是往北开，到满洲里下煤窑。”我们大家这才知道受骗了，但也没办法，因为想跑也跑不掉了。

火车开了三、四天后，一个夜晚，日本兵把车门打开，叫我们下车。我下车一看，四周军警密布，个个荷枪实弹，当即把我们五十人为一汽车拉到放包山上。第二天天一亮，日本人就逼着我们去干活。到山上一看，山下劳工住的席棚子一眼望不到头，在山上干活的劳工少说也有二、三千人。山四周戒备森严，铁丝网密密层层，相隔不远就有一个岗哨，在山顶最高处有一个瞭望塔，昼夜都有两个日本兵向四周瞭望。日本鬼子还对劳工严加监视，不许劳工们互相交谈。我们私下互相询问，方知来的劳工不是被骗来的，就是被抓来的。家乡大都是辽宁南部，河北北部一带的。

日本侵略军逼着我们给他们修炮台、山洞等工事。我们干的是挑沙子、拌水泥、灌水泥等繁重劳动，住的是四面透风的席棚子。海拉尔二、三月的天气十分寒冷，日本人也不给我们被褥，

睡在硬木板上，每天吃的是两顿带不少壳子的高粱米粥，每天得从天亮干到天黑，夏天天长，一天就是十八、九个小时。干活时稍微慢了点，监工的棍棒、枪托劈头盖脸地打来。我在郑家屯认识的一个老乡，干了一个多月就被折磨死了。还有一个劳工受不了这比牲畜还不如的待遇，逃跑中被抓回来，当天晚上，日本鬼子把我们劳工集合起来，当着我们的面活活地把他打死了。后来，有人悄悄地说，这个人已在这里干了三年了，家里还有母亲、妻子、儿女。我这才知道，这里的山洞至少已修了三年。

繁重的劳动，非人的待遇，很多身体很棒的小伙子很快就累垮了，生病了。但只要你还能动，就强迫你去干活，实在动不了的就送到病号棚。日本侵略者欺骗劳工说，送去隔离，以免传染。实际上送进病号棚，就等于送进停尸棚。据我所知，当时没有一个人能病好后回到工地去的。我在这年九月，因两眼瞎了，看不见东西，被日本人送进病号棚，目睹了这里面的惨状：奄奄待毙的劳工们躺在那里没人管，连水也没有，天气冷了，身上还穿着破烂的和沙布差不多的更生布衣服。

我们那个棚子里躺着六、七十个劳工，每天都有一些人死去，每天都有病号拉进来，隔几天就拉出一汽车尸体扔到坑里（我因为被逼着往坑里扔过两次尸体，所以记住了这个坑的位置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那个万人坑）。后来，我的身体稍微硬实些，心想不能等死，在九月里的一个黑夜我趁看守的日本兵睡觉之机，逃出病号棚。当时，我逃到现在海拉尔市西山飞机场一带，遇到几个打草的中国人，他们同情我，给我饭吃，给我剃了头发（这时头发有半尺多长），这样，我侥幸逃出了虎口，虽然瞎了一只眼，但却成为日本侵略军在海拉尔敖包山残害中国人民的唯一见证人。

敖包山山洞前后修了十来年，到底有多少中国劳工被害死？迄今为止还不清楚。当时，我在山上认识的有三、四百人，其中

有不少老乡。解放后，我曾到处打听这些人的下落，但杳无音信。据说，日本鬼子为了怕放出劳工泄密，在山洞修完之后，将全部活着的劳工都害死了。

解放前，我一直不敢说自己是从敖包山上跑出来的劳工。解放后，党和政府为了使人民不忘旧社会的苦难，搞新旧对比教育，让我讲述这一段血泪史，我才领路找到这个万人坑。这里埋葬的白骨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的铁证。

日寇对鄂温克族猎民的统治

阿方克山德·伊加贝基·库得林口述 玛寇整理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五个日本兵带着短枪和大枪，从海拉尔出发，乘别列考夫（苏联人）商人的马匹，来到了当时乌眉罗夫附近的伊力坎，与数英夫的名鄂温克猎民接触。通过乌眉罗夫的安达克（一），换去了我们的灰鼠子皮、鹿鞭、鹿尾、犴角等猎产品，又通过安达克换给我们面粉、食盐、茶叶、子弹炮、雷弹和别列弹弹壳。记得当时是三张灰鼠子皮换一个弹壳，一张灰鼠子皮换一包火柴，四十分特（三十二市斤）一袋面粉需十三张灰鼠子皮，一瓶白酒需七张灰鼠子皮，一分特茶叶（等于现在八两）需八张灰鼠子皮，一尺更生布需四张灰鼠子皮。这几个日本人在乌眉罗夫呆了十几天，然后同别列考夫一起返回海拉尔。

一九三五年三月份，有三百多名日本军人由海拉尔坐汽车开到乌眉罗夫。他们来了不久，就收缴了猎民的枪支，把男女老幼都赶下山，开了半个月的会，重新选举了鄂温克猎民的阿塔曼（二）。他们是：阿里山德·库达林；嘎瓦日伊拉·尼古来·索拉托斯克；亚克夫·瓦西里·索洛果若夫（当时他是漠河部落的）（注：以上三个人是以前的阿塔曼，这次又重新选任），会议就进行了这么一个内容，然后让猎民上山。

一九三八年夏天，一个自称叫白连成（苏联名叫八月）的蒙族人和日本上尉小野由大维格德给当向导，骑马上山走遍了鄂温克猎民的各个部落。这个叫八月的人，即会说日本话，又会说苏联话，也会说鄂温克话。他们每到一个部落，就宣传不要和苏联人打交道，要和日本人交朋友，建立友好往来。并告诉猎民，乌眉罗夫已建立满洲畜产株式会社，收购猎民的猎产品，供应猎民粮食等日用品。

同年冬天，八月和一个名叫巴拉杰伊的鄂温克姑娘结了婚，两年后巴拉杰伊得病死了。

一九四〇年，在离乌启罗夫三十公里的阿巴河建立了一个日本据点东大营，有四撮木楞房子，驻有三十多个日本兵。这个地方不让猎民靠近。同年五月，八月和一个日本人牵着四不象（三）走遍了当时鄂温克族猎民七个部落，这次主要是通知七月十日让男猎民下山，参加训练。参加这次训练的有八十多名鄂温克族男猎民，其中最大年令70岁，最小年令只有14岁。在这次训练中，八月给日本人当翻译。早晨五点起床训练，训练项目主要是列队、立正、稍息、齐步走。吃完早饭就给日本人干活，打拌子。由于语言不通，训练时动作稍有不对，就受到日本人的拳打脚踢和鞭子抽。扣子系不好、帽子戴歪了，日本兵不由分说就打嘴巴子。打拌子时，日本兵拿着上好刺刀的枪看着，怕猎民逃跑。在这期间，我们受尽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奴役，他们根本不把我们鄂温克猎民当人看待。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当时有个叫大拉非的猎民小伙子（那年他27岁），他为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不出操，不给日本人干活，结果被日本兵用鞭子和棒子打得死去活来，皮开肉绽，最后大拉非因受不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极刑而从悬崖上跳河自尽了。此事引起了广大鄂温克猎民的极大愤慨。广大猎民聚集在一起纷纷要找日本人算账。日本人一看势头不好，怕猎民造反闹事，让猎民阿塔曼出面，把大拉非的尸体从河里打捞出来，按照猎民的风俗习惯，把大拉非安葬了。

日本人集训鄂温克族猎民从一九四〇年七月十日开始，一直到日本垮台前结束。在集训期间，他们把猎民的枪支全部收缴，由日本人统一保管，然后分期分批进行轮训，每批约四十人左右参加，每两个月一换班。轮训期间，吃的是自己的粮食。当时鄂温克猎民的口粮由日本人设在乌启罗夫的满洲畜产株式会社控制。猎民妇女领粮时，交了钱就把男猎民的口粮扣下统一拿到日本东大营猎民训练所。猎民训练，给日本人干活不但不给报酬，而吃的用的都是自己的。男猎民在日本东大营训练，扔下妇女、

小孩在山上，生活实在困难。因男猎民训练不能生产，也就没有猎产品，换不回粮食和生活日用品。家家缺吃少穿，猎民妇女买不起花布做民族服装，只好买白布用牙格达、杜柿染成带色的布做衣服穿，用阿拉成哈（松树蘑菇）代替肥皂。日本统治时期，猎民缺医少药，有病得不到及时治疗。在日本统治鄂温克的十几年中，就有53户猎民200多人死亡。日本帝国主义给鄂温克族猎民带来了灭绝种族的灾难。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夜十二点，苏联红军攻打驻在乌启罗夫的日本兵营。根据苏联红军的指示，广大猎民担当了搜索逃跑的一部分日军的任务。八月二十四日，十五名鄂温克猎民在坤德伊万和伊万杰列果罗夫的带领下，在艾牙苏克河搜索到21名日本兵，经过激战，打死了13名日军和一匹军马，缴获战马八匹和不少枪支弹药。其余八名日军逃到金河附近，被全部击毙。在满归河对面的西瓦里地带，老马嘎拉、小八月、阿里克山德、老八月等猎民，发现了从斯大了克方向逃来的六个日本兵，当场将他们全部击毙。在亚库斯克，嘎年、谢里杰伊、嘎卡克、伊万索又发现了从漠河方向逃跑的九个日本军人，也同样全部击毙。根据苏联红军的指示，把击毙的日本兵的帽子和衣服全部脱下来，交给苏联红军指挥部，以证明打死的日军人数。

注：1、安达克：旧社会同鄂温克猎民做买卖的商人；

2、阿塔曼：鄂温克猎民部落中的最高头领；

3、四不象：驯鹿

（上接25页）

三、根据一个机关不能设平等权利的两个领导的原则，应该将现有希热图分为正付希热图。所以，原来的希热图为正希热图，后任命的希热图为付希热图。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十年内乱开始为止。

以上的改革是我亲自参加的，现概述于此，以供参考。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

将军庙在诺门汉战争中被毁的情景

高其德·玛格苏尔

一

日本帝国主义用武力侵占我国东北后，又日夜觊觎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终于在一九三九年春挑起了诺门汉战争。

在诺门汉战争前，我亲自经历过两件事：（一）当时伪满军队第九团驻防胡和道卜边境，该团以敖敦巴图为连长，日本人西努（音译）为辅的一连兵驻在孟和希里。该日本人以巡逻边境为由带领几名士兵，从冰上越过额尔古纳河侵入了苏联境内，对方开枪以后他们才跑回来，双方继续开火，结果一人受伤，当时在场的士兵们说：“对方抬走一架用白布蒙着的担架”，看来苏方死了一人。

（二），过后不久，有一天夜里，因为驻守在额尔古纳河第六哨所的日本头头，派数人偷越额尔古纳河，放火烧了苏联古平民的草垛，苏联兵还击以后，也烧掉了该哨所的草垛和一所蒙古包，并打死了几匹马。

当时，我是伪满第十军管区机关枪连少尉排长。在发生上述两件事时，第十军管区命令我们二十八名士兵和两挺重机枪去紧急支援。我们乘汽车前往孟和希里，但此事已过去，我未目睹上述经过，也未打一枪。去第六哨所时，虽然也乘汽车，但因到大汽车不能行驶，我们扛着重机枪徒步行走了三十来里路。当我们到达第六哨所时，事情已过去，该哨所十来名士兵正安顿住在山谷里桦树皮搭成的窝棚。我们没有参战，也没有开一枪，不但没看到战斗情景，连苏联兵的影子也没看见。因此，可以推论诺门汉战争是日本人如此挑起来的。

二

诺门汉战争发生以后，伪满第十军管区第八团开赴前线，有的乘汽车，有的骑马至新巴尔虎左旗诺木产索仁地方汇合，然后

到胡鲁苏台河附近。第八团团长是索德那木，团副是叫金泽的日本人。因为当时是战争初期，大批的日本兵还没来到。第八团来胡鲁苏台河之前，这里只有本团其仁达喜为首，日本人大田为副的第三连在驻守。第八团来到后，每天派侦察兵向巡逻在哈拉哈河东岸的蒙古兵开枪，尤其还向巡逻在哈拉哈河西岸的蒙古兵开枪挑衅。不久，因苏蒙两骑兵和别克来三击，这时第八团逃回了将军庙。苏蒙军追至诺门汗附近便撤兵。

三、

第八团逃至将军庙以后，强迫该庙三十来名喇嘛转移到正兰旗喇嘛庙，封闭了这里所有的庙宇和喇嘛住的上房，并严格规定无论如何不得破坏、不得进入，但下了一场大雨以后，就违背了自己的规定，连喇嘛住的上房都被破门而入了。

喇嘛转移后不几天，数百名日本兵乘汽车到将军庙的西南沙漠里挖壕备战。这大概就是日本兵参加诺门汗战争的开端。

将军庙的地势从西到北有大泥潭和沙岗，东面、东南面有柳条等小灌木和沙丘。

日本兵来后不久（阴历三、四月份），有一天早晨天刚朦朦亮，苏蒙军队突然进攻将军庙。第八团除留下我们机枪排的三十来人守将军庙以外，都躲到庙东南的沙丘里去了。苏蒙军队好几辆装甲车从西面开过来冲入了泥潭。这时隐藏在将军庙西南侧的日本兵用重炮击毁了儿辆装甲车，在沙丘上的大炮也接轰起来，接着，它又好好命中了庙西侧的庙。苏蒙军队从西面进攻失败，当天三时苏蒙有十辆坦克从庙后沙丘上爬过来，但首辆的几辆又陷入泥潭中。接着，庙西侧的日本兵趁此机会又带几辆重炮到庙东面，击毁了二辆坦克。这时北面高地上的大炮开了火，又把将军庙的老庙打坏了，庙北又被轰了个大窟窿。又有二、三十发炮弹射向离庙北方向约三里远的将军庙，但陵墓未受到破坏，故苏蒙连开傍晚，可以听到，从苏蒙中弹的别克中衣裳着火的上兵在往外逃。天黑时听见苏蒙方面打了一炮，但

没听见也没看到炮弹落在什么地方，苏蒙军却都撤退了。

因为对方离我们这里超出了我们机枪的有效射程，因此我们接受守护将军庙任务的机枪排，一枪没打，说是“护庙”但性命却险些葬送。

过后一看，庙内巨大的铜制佛像已遭破坏，而将军旗子仍立着没受到破坏。另外，在战乱中我们的几只菜羊跑掉了，因为缺少茶，我们的士兵不但把大佛像腹内的砖茶拿出来喝了，还把庙内的莜面和点心等祭品也给吃了。由此可以看出伪满国兵的武器和物资供应是何等之差了。

概述以上真实的情况，目的是让我们的后代知道受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与当炮灰的耻辱，以激励他们更好地建设伟大的祖国，保卫神圣的国土。

后 记

将军庙是清朝乌力苏台将军哈拉宾·都嘎尔，于光绪十三年（1887）用自费建于乌力吉图宝力格地方。经上报朝廷，皇帝赐名为“德信寺”，派新巴尔虎左翼四个旗的一部份喇嘛住在此庙。故该庙也叫“将军庙”。

该庙于一九一七年“丁年骚乱”中被破坏，约于一九二三年移至贝胡同这个地方重建起来的。一九三九年又在诺门汗战争中，遭到了上述破坏。

花赛·都嘎尔扎布

日寇残害和掠夺牧民的罪行

凌布拉

伪满统治时期，呼伦贝尔各族人民身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压迫和掠夺。地处边境地带的新巴左旗镶白旗（现在的嘎拉布尔公社）的广大牧民更遭受了日寇野蛮的残害和掠夺。下面我仅就我所知的部分历史事实述于读者。

呼伦贝尔地处我国东北一隅，其西与西北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相接壤。过去同蒙古人民共和国相接壤的边境地带，双方往来不那么严格，这是一方面由于畜牧业生产方式——“逐水草而居”的生产方式所决定，如果一方遭受了自然灾害，一般可去对方草场好、灾情不大的地方放牧过冬。另一方面做为同一民族，亘古至今已形成互相往来的客观历史事实。但是“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统治呼伦贝尔地区后，置这种历史事实不顾，竟怀疑这种往来是蒙古族牧民同蒙古人民共和国有某种联系，进而大肆搜捕、关押以致残害蒙古族牧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一九四三年二月，驻满洲里的日本宪兵队及伪警察同几名日本便衣，突然前来东旗镶白旗，搜查了三个索木衙门，虽然什么也没有查到，但却逮捕了索木文书索德那木丕勒、喜拉夫、南吉德等，同时逮捕了当时在他们家里的镶白旗第二佐佐领（索木达）姜巴拉和甘肃省活佛沙拉嘎然萨。过两三天后又抓走了锡林郭勒贝子庙的活佛（住在本旗）以及牧民敖依德布、布和富尔布、达沙代的爱人（已忘记她的姓名），同时被抓走的还有藏族人达西、宫布、嘎然巴喇嘛等，共计十六人。他们被日寇带到满洲里，扣上“反满抗日分子”等帽子，铐上手铐、脚镣，每天拷打逼问，说：“你们常在蒙苏边境地带放牧，目的显然是为了联系蒙古。”你们这些人到嵯岗来，经常去俄国人家里去作客（白俄修中东铁路以来，在嵯岗站有

不少俄国人居住)。你们都会说俄国话，肯定与苏联和蒙古有密切关系”等，罗织罪名扣在这些牧民头上，并用灌辣椒水、炭火烤、绳索双拇指、跪石块等惨无人道的刑法，逼问拷打折磨了三个多月，但这些牧民坚贞不屈，无一人承认其诬陷的罪名。

这些被捕者以后的下落：

姜巴拉（佐领）被判为无期徒刑，送到齐齐哈尔的日本监狱，一九四四年十二月死在监狱里，死后由其弟拉布丹前去齐齐哈尔领回尸体安葬。

索德那木丕勒和喜拉夫下落不明，可能已被日寇杀害。南吉德则在一九四四年冬，被日寇强迫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去搞特务活动，但他在边境上即被蒙古人民共和国抓获，一九五〇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将其释放回家，他在“文革”后期去逝。

札丹苏荣、孟德、阿拉坦格日勒、巴特尔、特木尔巴达尼、孔德日、苏木喜格、多尔吉、罗布桑沙比兰（活佛）等人后被日寇释放，现均去逝。甘肃省的沙拉嘎然萨活佛则在一九四五年光复时，才由齐齐哈尔监狱里放出，以后去了西藏。

布木桑、嘎尔马喜日、安布拉等人，经过日寇拷问，没有逼出罪行释放之。

当时被日本宪兵逮捕后下落不明的牧民还有：敖依德布喇嘛、达西（藏族），达沙代的爱人，阿嘎兰巴（藏族喇嘛）官布，布和富尔。有人曾看见过达西、达沙代的爱人被关押在扎赉诺尔的监狱里，其余四人被抓走后始终无信息，几有可能被日寇杀害了。

被抓走的姜巴拉佐领当时是有钱的富户，日本人抓走他后抄了他的家，抢走了很多财产，仅现在追忆的就有白金、黄金、白银、金框石墨眼镜、金制怀表（两个）、水獭、貂皮衣帽等贵重物品，还有价值千元以上的宝石顶子，并把他的羊群赶到满洲里宰吃了不少。另外，曾在一九四五年春天的一个夜

晚，两名伪警察依日本宪兵队的命令，到镶白旗牧民布德喜日的家，威胁布德喜日说：“你很富有，不要白白地保存这些财富，应该支援大东亚战争。”说着，竟在光天化日之下，搜抢了他的一百多块元宝，装在布德喜日的一辆骆驼车上，还要让布德喜日的爱人给送到嵯岗站。罪恶之极，虽强盗亦叹为不及。

凌升之死

恩克巴图

凌升是伪兴安北省省长，达斡尔族，一九三六年被日本统治者杀害。那是在三月末四月初，海拉尔的日本宪兵队，发布了戒严令，出动了几千人马，包围了海拉尔及南屯、西屯、莫和尔吐屯，禁止行人来往，出入者必带日宪证明，在街道口村落中贴满了布告，其内容是：要在几天内一网打尽不良分子，搜查了不少住户，经过七昼夜才解除了戒严令，各行业恢复正常，报上登载了凌升通苏事件，与凌升事件有牵连的春德（伪井务厅长、凌升妹夫）、福林（伪兴安北省警备军参谋长、凌升的弟弟）、沙德尔吐大尉和井佐沃兴泰也都先后被逮捕。

凌升等四人被捕后，在日宪惨无人道的审问中，没有承认任何罪状，也没交待过其它人，由于案情重大，很快就把他们送往长春军事法庭，他们在长春也没承认任何罪状。同年四月末凌升等四人，在长春的南岭被日宪枪决。

据正珠尔扎布（伪军官）的回忆文章说：新任的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到伪康德皇帝（溥仪）面前说，前几天破获了一个案件，罪犯是陛下认识的兴安北省省长凌升，他勾结外国图谋叛变，反对日本，军事法庭已经查实他的反满抗日罪行，宣判了死刑。当时目睹行刑情况的伪治安部官方长官入江上校，后来对我谈过凌升被枪决的情况，他说，这人真倔强，临刑时面不改色，含着冷笑，叫他带上覆面带时，坚决不带，挺着腰板不在意。问他还有什么说的，他说：“没有，快打吧！”事后听说，凌升被拷问中始终没供出任何通苏事实，只说：“别人无罪，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都是我一个人担当，不要牵扯别人。”

凌升事件当时轰动一时，在报纸上发表，但没有具体事实，谁也不敢议论。现在在文件报刊上难于找出线索。他们四人被捕至枪决只一个月，其后报刊上也不刊登，日本人也不谈，象毫

无其事一样。

凌升被捕当时，日军到他家搜查了好几次，没找到任何秘密文件。登记了所有的财产，到野外散特尔查点了他家的牲口，没有没收。

其后不久，把凌升的儿子色布精太送往日本学习。

伪满洲国刚成立时，凌升是拥护并亲自前往旅顺，参加了各地的“请愿代表团”，拜见过爱新觉罗·溥仪，请他出马上任伪政权元首。但是凌升当上了伪兴安北分省省长以后，在工作中他体会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对日本侵略者表现了强烈的不满和反抗。

有一次和伪满各省省长去日本参观，参拜日本天照大神庙以后，他说这是日本皇帝的祖先，不是我们的祖宗，为何让我们去参拜。

伪满政府给凌升发了勋章，他拒不接受。

有一年关东军为了向苏联挑衅，调来一批精锐部队陈兵到满蒙国境线上，当时凌升到车站去迎接。日本的队长，和他谈过军事情况。当该部队开到西部国境交战时，苏联方面早已布置了大军，超过了日军好几倍，在交战中，日军大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因失职被调回国。当时有一位从长春来海的蒙族官吏说过：“因对方的消息很灵通，所以在几次的国境冲突上日军大败，一定是在兴安北省的大官内有地下活动组织。”

于1936年三月末，在长春召开了伪兴安四省伪省长会议，会上谁也不敢提土地问题。可是，凌升挺身而出，强烈反对日本内地开拓团移入内蒙地区，反对日本官吏的独揽大权，反对日本关东军干涉地方政权等等，惹起了日本军部的恼怒。散会后，凌升和华林太二人回到海拉尔就被捕入狱了。以后又逮捕了春德和福林。这是我所知道的凌升被害的片断。

附 记

关于凌升被杀害的问题：当时的伪兴安北分省公署警务科长板水梧郎（日本人）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二日的夜间在自己的家里用小型电影机放电影的时候，日本军司令部来电话命令说：火速来到司令部。我马上跑到司令部时，那里的接待室里坐着特务机关长寺田大佐（上校），我小声地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用汉语说：“没法子”，过了一会，司令部的参谋长出来正式命令说：

“一、同蒙古人关系密切的三位可能有意见，但是对于这个问题严禁向上级提意见和联系。

二、凌升为首的蒙古人搞蒙古独立的阴谋活动已经揭露，因为今夜早晨四点钟宣布戒严令，要逮捕凌升以下几名蒙古要人，对于有关这个事情的一切事儿都由日本军队来施行”等等。他还写到“对于这个问题我考虑了一些以前的事情，但是没有想到有怀疑的行为，军参谋长说他们搞了蒙古独立活动，但是凌升没有军队的指挥权，或者向外蒙古请求援助么？过去没有这样的行动，头脑聪明的这个人（指凌升）不会做这样的蠢事。但是成立满洲国以前，在呼伦贝尔，他们掌握绝对的大权，成立满洲国的时候，他也有功劳的，这样的情况下，日本人过分干涉省的内部事务，他有些不满意，这是事实。关东军方面，找理由换省长的意图是过去有过。从多方面考虑对凌升事件，不能不说关东军有些阴谋诡计的事情。”等等。

以上是摘自日本人冈本俊雄写的《一名布里雅特蒙古青年和一名日本青年的会见》一本书从第一百一十一页到一百十三页。（昭和五十四年七月、日本奈良市实业印刷株式会社发行，非卖品）此人当时是伪第十军管区司令官乌尔金的翻译官。

花赛·都嘎尔扎布

我所知道的日本大特务寺田利光

宝敦古德·阿必德

伪满第十军管区司令乌尔金的翻译官，现在在日本奈良自由民主会馆工作的日本人冈本俊雄，最近写了一本书，名曰《一名布里雅特蒙古青年和一名日本青年的会见》，一九八一年，他将该书并信件几次寄给我盟海拉尔、鄂温克旗、陈旗等过去曾认识过的人。在此中日正常关系已经建立，中日友好关系日益发展的时候，这本书却引用了伪满在呼伦贝尔的日本大特务寺田利光的日记，继续沿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观点，仍称寺田利光为“呼伦贝尔的父亲”。严重的歪曲了事实真相，令人愤慨。为此，完全有必要把我所知道的寺田利光部分史实写出来，还其历史本来面貌，以正视听。

解放前，在海拉尔市头道街公园里矗立着一个日本军人的大铜像。他就是被日本侵略者称为“呼伦贝尔之父”实际是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大特务寺田利光。

寺田利光生于日本明治二十二年（1884）七月五日，以后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毕业后，分配到日本军队里当了尉官。日本的情报机关为了培训到蒙古地方搞特务活动的人材，选送他到日本东京外语大学，学习蒙古语和俄语。他精通了蒙古语和俄语，还会说一点汉话。

1918至1919年，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了消灭刚刚诞生的年轻的苏维埃政权，蜂拥入侵，日本也派遣了侵略军队，称之为“西伯利亚出兵”。寺田利光也参加了这个侵略进军。并来到海拉尔又去苏联的哈巴罗夫斯克（伯力）。

他正式来到海拉尔是1927年。身份是“国际运输株式会社嘱托”，实际是日本的现役军人，当时他自称是五等高等

官，可能是少佐（少佐）官衔，关于当时的情况，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出国后直接来到了哈尔滨，同哈尔滨的日本人安藤联系后，滞留了一个时期，和过去在哈世罗夫斯克认识的俄国朋友也见了面做了一些准备工作。”他于一九二七年冬天来到海拉尔，在日本人开设的松江旅馆定居下来，他在日记里写道：“在这里雇了一名廿多岁的汉族仆人，这个人过去当过土匪和一个日本妇女结过婚，是个可靠的人。”

寺田利光在海拉尔定居后，就积极开始了特务活动。他在日记里说：“我每天上街散步，平常穿中国服，对汉人说我是蒙古人；对蒙古人说我是汉人；对俄国说我是汉人。”又写道：“有一天，我在公园里坐的时候，有两个俄国人在那里坐着谈，其中有一个人问我你懂俄国话吗？”我回答不知道。于是他俩就随便谈起苏联西伯利亚的一些情况。

一九二八年的夏天，他又和当时的海拉尔国民党军队的长官发生来往。他写道：“我认识了海拉尔的镇守使和他的参谋长。这位参谋长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我的好朋友，我们的关系很好。我给他的儿子教日语。”这样，寺田利光逐步地扩大了他的活动范围，而且把手伸进了牧区，并且公开了日本人的身份，又增加了一些日本特务人员，如猪口，以后又来了一名精通蒙古语的日本人。他还利用从苏联逃跑出来的白俄军官阿塔曼、西苗诺夫、巴其西耶夫等人 and 他们的部下为其服务，唆使他们到苏联和蒙古边境搞破坏和侦察活动。在后期他特别注意呼伦贝尔地区的上层人物，他在日记里写道：“我和呼伦贝尔都统衙门的大官们交上了朋友，我邀请他们到家里作客，也去参加他们较大的盛会。额鲁特旗总管凌升和布里亚特旗总管 乌尔金等人都是我的好朋友了，乌尔金和我是一九二七年认识的，他赠送了我一匹带鞍子的好马。”寺田利光在呼伦贝尔地区还收买了一些当地的流氓分子如汉布丁、桑巴拉、沙拉、那木斯来、宝彦等人，为他搞特务活动。寺田利光这个狡猾的大特务，如果感

到他的走狗有一点不可靠时，就毫不留情地杀掉。比如日本人的忠实走狗，多次去蒙古和苏联搞破坏的沙日、那木斯来，就是在阿尔山附近被日本人所暗杀。

一九三二年冬，苏炳文军队逮捕了寺田利光。但是，经呼伦贝尔蒙古官员说情，两个月就把他释放了。此事他在日记里写道：“额鲁特旗总管凌升和布里雅特旗总管乌尔金是救命恩人。”

一九三三年初，日本侵略者完全占领了呼伦贝尔以后，寺田利光彻底露出了他的真面目。他是日本陆军的现役军人中佐（中校）。日本政府授予过三等勋章，不久就升到了大佐（上校）。呼伦贝尔的一切大权统由他掌握，他在日记里写道：“我的工作太忙了，有三个身体也不行。我有专用秘书，还有寺田公馆，我的公馆门前日夜有岗哨，我已经成了呼伦贝尔的王爷，有人称我是‘呼伦贝尔的父亲’”，我决心为了满洲国，为了蒙古人而干，要为日本帝国打下不可动摇的牢固基础。”

日本侵略军占领呼伦贝尔地区后，撤销了原来的副都统衙门，成立了伪兴安北分省公署，任命原额鲁特旗总管凌升为省长。又成立了伪兴安北分省警备军司令部（后改为第十军管区），任命布里雅特旗总管乌尔金为伪司令官。这些都是寺田利光的安排。他自己当了日本特务机关长兼伪兴安北分省警备军司令部顾问。因此，日本当局称赞他的功绩，称他是“呼伦贝尔的父亲。”而他的野心更大。他在日记里写道：“我当了蒙古的大王爷和“父亲”了。但是，我等待着指挥军队，进攻外贝加尔地区时期的到来。”又写道：“我到新京（长春）会见了关东军司令部小矶参谋长，介绍了呼伦贝尔的王爷情况。”

一九三五年一月，贝尔湖东部哈尔哈庙地方发生了武装冲突。在同年七月，寺田利光就亲自去贝尔湖北部阿斯尔庙附近搭帐篷，住了几天。详细地调查了该地区的地形和其他情况。他去的时候，带着自己的家属，为一般的旅行者。当时一起

去的还有他的女儿寺田英子，这在日记里都有详细的记载。一九三六年二月，日本关东军的涩谷大佐指挥的机械化部队，就是经由此地突然入侵蒙古边境的。而后被苏军全部歼灭。这件事也是寺田利光特务活动的阴谋产物。

一九三七年七月，寺田利光因患脑溢血死去。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纪念他的侵华功绩，在海拉尔头道街公园里塑造了他的大铜像，并称他为“呼伦贝尔的父亲”。但是，中国人民都知道这个铜像，是个地地道道的帝国主义者，是个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法西斯大特务。日本投降后，海拉尔人民早已把它砸得粉碎。

忆海拉尔第二国民高等学校的始末

董泽远

教育的兴衰是与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等历史背景紧密相连的。

三十年代初期，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三省，大好河山沦为殖民地，人们在水深火热之中呻吟、挣扎……

海拉尔地处大兴安岭西麓，为中东铁路所设的一个大站，连通哈尔滨、天津等大商埠，交通方便，是呼伦贝尔畜产品——羊毛、皮张的集散地。在旧中国，这里一直发展缓慢，人口不多，一九三一年前仅一万五千多人。居民，大部分是从山东、河北、山西等省流迁过来的，多从事商业、手工业和季节性生产，即所谓“三打”（打羊草，打旱蕨子、打拌子）“三拣”（拣羊毛、拣蘑菇、拣杂骨与山产品）户。市区西部为达斡尔族聚居区；北部为铁路职工和俄国人、无国籍侨民聚居区，做侨民生意的小商店和小手工做坊杂布其间，通称之为“新街”，有单独的市政管理机构 and 商务会组织。

旧中国的蒙旗地方仍沿用清政府蒙汉分治、旗县并存的政策。呼伦贝尔地方隶属黑龙江省，省政府在这个地方设两个行政机构一是呼伦贝尔道尹公署，管辖呼伦、庐旗、室韦、奇乾四县，一是呼伦贝尔副都统，统辖四县以外的牧业旗。这两个行政机构统归黑龙江将军节制，副都统衙门设在城西（现呼盟歌午团即副都统衙门旧址）。由于旧社会政治腐败，又受帝国主义侵略压榨，弄得民生凋弊，市井萧条，文化教育落后，一个边陲重镇有只三所学校：一是路办校即东省特别区第二学区第十一小学；一是县办校即呼伦贝尔小学；一是副都统衙门办的学校，专收蒙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子弟，此外，还有侨民会办的外国人学校。汉族学生，小学毕业后，只有少数成绩优异、家境富裕的（至少也得能拿得起宿膳费的小康之家）才有条件到远离家乡的大商埠——哈尔滨去读中学，而能去哈尔滨读书的学生，

多数是铁路小学的毕业生，因为路立校的师资水平高一些，毕业生的升学率较高。如宋恩吉、马镇山、董余久等都是从路立学校毕业而考上哈尔滨一中、二中，然后又上了大学的。

一九三二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全境，它进一步覬覦苏联，强行收买中东铁路，进而在兴安岭以西地区构筑所谓“永久性军事工程”（利用廉价雇佣华工或抓劳工为它修筑）。因而，海拉尔的人口便随之增加，市面上也曾出现过畸形的繁荣——日本人开办的茶楼、酒馆、洋行、商店遍布于市区的主要街道上，由中国人办的销售日货的商店以及影院、戏园赌场、饭店、妓馆等也多起来了。与此同时，各界要求办中学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一九三七年五月，经伪兴安北省公署的批准，拨了一笔少得可怜的经费，办起了海拉尔第一所初级中学，沿用旧中国的两级中学制，招收了一班学生，共三十余人。校址在当时的西二道街（现在的橡胶厂）。校长战镇寰（是省公署督学兼）语文教员谭守惠（毕业于北京一所私立大学）数学教员王殿武（北京某大学毕业）体育、生物教员麻锡庆（回族、齐齐哈尔师范学校毕业生）日语教员兼“主事”（等于副校长）叫田代又作。战校长因系兼职，不经常到校上班，学校的实际负责人是谭守惠老师，日籍老师田代又作，教授日语课，不大管学校的事务。

这所中学是租用侨民的私人住宅，座落在西三道街和文化街的拐角处，房舍座北朝南，还有几间东厢房联接着主房。有一间教室（原是房主的客厅），能容纳三、四十名学生；一间教员办公室一间寄宿生宿舍，能住四至五人；一间校工室一间厨房兼餐厅；一间洗脸室兼浴室，浴池是利用灶膛点火温水的日式家用澡塘，寄宿生可每周洗澡一次。当时的寄宿生只有四人，我是其中之一。我和谭守惠老师一起吃住（他的家眷在辽阳，未迁到海拉尔）师生们关系比较融洽。

这所中学授课的内容：数学课上查理斯密小代数、平面几何；语文则以古典散文选读为主，不学现代文；还开音乐课。进入二年级后，增加物理、史地、化学、至于日语课在一九三七年是做为外语课讲授，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强化对满洲的殖民统治，到一九四一年后定日语为“第二国语”，强制学生必读。此外，还有修身课，由校长战镇寰上，讲的是孔孟之道，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那些封建说教，学生对这门不感兴趣，战校长在讲台上照本宣科，学生在下边偷看小说打瞌睡。

到一九三九年，第一届初中毕业，接着便改变学制，成为职业中学。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三年为商科，增加商品学、商事要项商业会计等课程，均用日文课本，中级教师不懂日文的至此就无法授课了。学生也因日文水平很低，难以学懂。我在这个学校读了二年商科，就算毕业了，是这所学校的第二届毕业生。首届和第二届毕业生考入高等学校的寥寥无几，记在首届毕业生中升入长春（当时称新京）法政大学、吉林师范大学各一人即张振运、戴有韬、王敏中；在第二届毕业生中有考入伪建国大学、沈阳医科大学、政法大学各一人，即胥庆澜、孟公阿、傅进山，还有一些考入中等专业学校的。这所学校应届毕业生的升学率为百分之七或八左右。自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四年共毕业五个班（每年一班）。

从一九三八年起海拉尔有三个国民高等学校，即：一高专收蒙生，为农牧业专科；二高，以汉族为主兼收少数蒙生和达斡尔学生；三高系俄侨中学，学制都是四年。

海拉尔第二国民高等学校在一九四四年改为土木工程专业学校，到一九四五年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时，这个专业还没有毕业班。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在我国广袤的土地上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日帝为保证其侵略战争的需

要，除在政治上，经济上强化对东三省的殖民统治外，在文化教育上也采取种种高压政策，加强控制。一九四一年施行征兵法，在中等学校中开军事课，配备军事教官。我四年毕业那年，这个学校的军事教师是林学谦上尉（东北旧军官，行伍出身）每周用一、二节课时进行强制式训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愈加残暴地对学生施行法西斯奴役统治。学校开办八年半，日本“主事”三易其人。第一任主事田代又作，任职共有一年时间，此人留给我印象颇深，看起来他不象一般殖民官员那样骄横跋扈，对待学生及中级老师态度和蔼，从没打骂过学生，很有些学者风度（私下里曾听说他原来是日本共产党党员，一九三一年日本统治当局对日共大正肃后，来到我国东北）；第二任主事叫櫻井广（高等师范毕业），大约任职二年，从他开始做学校主事起，主事就成了学校的实际校长，中级校长一切得听命于他；一九四一年换了田口耕作，此人极为凶暴（每周他都要有几次训话，实行高年级生管低年级生制度，遇有学生淘气或“违反校规”，他就指令学生列队，互相打嘴巴）中级教师对其畏之如虎。日伪时期，机关、学校都是大办公室，只是校长、“主事”单独坐在一个角落里，人们在后来才明白：之所以这样，是为了监视下属勤惰，观查是否有交头接耳者。因此，老师们在上班时只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备课、批改作业很少互相谈话，特别是日本“主事”在座的时候，大家都惊若寒蝉。给我印象很深的事如，谭守惠老师是这个学校的创始人之一，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的时候，他热情很高，教学很认真，师生关系也很好，但由他是北京大学的毕业生，又不懂日语，田口耕作上任之后对他很歧视。在我临毕业那年，谭老师情绪非常低沉，谨小慎微。就整个学校来看，师生之间不能谈心，教师之间不能来往，都相互戒备。社会上，饭馆、戏园是隔座有耳，到处贴着“莫谈国事”。由此可见日本帝国主义在它灭亡的前夕，对其殖民地的思想统治使人

不寒而栗。

在殖民主义高压政策下，东北人民的英雄儿女——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怒吼奋起，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从东北沦陷之日起一直浴血奋战于白山黑水之间。一九四四年，东北抗联之一部王明贵领导的抗日救国部队还抗击敌寇于兴安东省的崇山峻岭之间。在日寇统治的中东铁路线上也有一些爱国志士在活动着。一九四〇年我因病辍学时，就听说在海拉尔知识青年中有“反满抗日读书会”。还记得一九三五年我在小学读书时，班主任老师杨鸣皋（一九三六年，他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搜捕中牺牲了），曾讲过日本侵略军的罪行，表示中国人应爱国，要有中国人的良心……。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我在铁路小学读书时，海拉尔也出现过抗日救亡活动。

一九四一年底我从海拉尔二高毕业，此后这个学校情况我就不太熟悉了。

海拉尔第二国民高等学校从一九三七年创立到一九四五年八月东北光复，历时八年半。毕业生约一百八十多名，加上一九四五年时的肄业生二百多人，共是三百八十多人。在人民解放战争期间，从这个学校出来的学生除极少数跑到国民党统治区去的绝，大多数参加了革命。三十多年来，在各条战线上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抗日联军奇袭伪格尼努图克

耿天乙口述 曹庆丰记录

一九四二年，在日伪统治时期，伪格尼努图克座落在阿荣旗北部的镇威庄。这个努图克有正房五间，西四间是办公室，东一间是警察分驻所，还有五间厢房，是厨房带宿舍，四周是土围墙。全旗头号大地主刘绍一就是这个努图克达（即区长——编者注）他家住在努图克的西面，距离一里地左右，刘家有正房七间，还有东西厢房，在刘家还驻有一个警察分队，刘的家属住在正房的西四间，东三间全部住着警察分队，厢房住的是长工、伙计们，门前较努图克更为森严恐怖，岗哨是荷枪实弹、厉狗相随。

我十八岁那年在这个努图克庶务系当雇员，那时就听说抗日宿军王明贵支队经常在马河、三岔河一带活动。这个努图克的警察分队，可能主要的是为了阻击和防御抗联部队增设的，当时其他别的努图克都没有这个配备。由于日伪政权的宣传，我们都非常恐惧抗联部队，不了解抗联部队是什么样的队伍。

这年七月中旬的一天夜间，外面正下着大雨，努图克的整个院内就住着我们四个人：有民籍系雇员宋殿坤，警察敖尔巴图和一个姓陈的伙夫。伪努图克达刘绍一和分驻所长等人，前几天就到旗公署去了。由于下雨没有什么事，天黑我们就躺下睡觉了。傍十一点多钟，突然被一阵枪声惊醒，我正睡的迷迷糊糊，还以为是警察队放的枪，接着又是一阵枪声，子弹打碎了宿舍的玻璃窗，我猛然坐起来，正在愣神的时候，就听到伙夫老陈在地上喊我：“还不快下炕！”我随着喊声，立即用被裹着身子，一轱辘从炕上到地上，时间不大，就听到外面喊：“缴枪不杀！”我们四人中就是敖尔巴图有杆大枪，老陈催促我赶紧交枪，还没等敖将枪扔出去，门就被撞开了，闯进四、五个人，枪和手电筒一齐对着我们，将我们每人身上搜查一遍，然后

让我们头顶头的趴在屋地，随着就开始到各层进行全面搜查，经过半个多小时，又将我们叫起来，穿好衣服到厨房做饭。

这时从外面进来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黑黝黝的大高个儿，面目和善的瞅着我们，还没等他说话就从外面又进来一个战士，向中年人敬过礼之后，就说：“报告支队长，西面（指驻扎在刘绍一家的警察分队）全部缴械完毕，打死两个警察狗子。”中年人听完报告脸一沉说：“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开枪打人。”战士赶忙解释说：“我们摸进后，喊了声缴枪不杀，这个家伙还操枪反抗，才不得已打死。”中年人点点头，随着出去了。

我们把饭做好以后，他们已将卷柜和金库全部撬开，搜出伪币约有六、七百元，见我年纪小，还给我二十元，我那时一个月伪的薪金才二十四元。全部搜查完后，又让我们将行李搬到院子尿中，并告诉我们准备将努图克全部烧毁，还让我们事后往旗里打电话报告，以开脱我们的责任，他们将能用的文件等堆放在办公桌上，洒上火油，连同房子一把火点燃，顿时熊熊大火，将努图克烧成一片废墟。

抗联战士拍手唱歌，欢庆胜利，对我们不时地讲述着抗日救国的道理，还动员我们参加抗日队伍，当时由于我年龄小，家有老人牵扯错过了机会，现在回想起来，悔之已晚。

天将放亮，队伍集合，并向我们做了简短的训话，让我们多为老百姓做好事，不要危害老百姓，还把一个平时对老百姓最凶狠、民愤大的山林员姓金的带走了（据说被镇压了），这时我才看清这支队伍，他们穿戴齐整，一色黄雨衣高腰水靴，每人一长一短双套家伙，大部分都是年轻轻的棒小伙子，他们骑在马上真是威武雄壮。事后才知道这是王明贵的队伍，这次接触对我的感受极深，开始惧怕，感到自己的性命难保，但在接触中，他们都是和颜悦色的对待我们，不打不骂，觉得每个人都非常亲切，努图克西面有个小杂货铺，部队分毫未动，老百姓

都说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好的队伍，我更深有体验。

火烧伪努图克以后，伪旗公署派出大批警察队，还有日本鬼子队伍，闹腾了好几个月，也没有找到王明贵的队伍，而火烧努图克则是老百姓一件大快人心的事，这件事一直传颂至今。

抗日联军在伊列克得活动的、一二件事

许长华

王明贵率领的抗日联军在呼盟伊列克得地区活动情况，我知道一二件事，写出来也许能够起到补遗作用。

一九四二年我在伪政府工作出差到伊列克得的时候，听到当地百姓盛传有这么一件事，说的是东北抗日联军在该地区游击活动最盛时期，联军带着一个姓曲的翻译，到处寻找一个外号叫“四个眼”带眼镜的日本人，要枪毙他，这个日本子命不该死，到海拉尔出差去了，结果没找着，幸免一死。嗣后，联军把林区附近的日本人集合在一起，向他们讲话说：“联军并不是见着日本人部杀，最痛恨者，是那些上层掌权执政者，你们不过是跟着走的，但不许你们虐待中国劳动人民，如果“四个眼”今天在，话，非要杀鸡给猴看一看不可。”当时使日本人感激万分。其中有一人向联军索取一颗子弹，留做纪念，联军就送给他一颗，并说，你要好好保存好，给“四个眼”留着。

抗联来到伊列克得地区后，伪索伦旗纠集各市旗的警察成立了“讨伐队”，由旗参事官（副旗长）日本人江川任大队长。有一次讨伐队追击联军，行至途中，追上联军埋锅做饭地点，水正开着，但人已不见去向，讨伐队顺着足迹追踪，追来追去又到了做饭地点，只见残汤剩饭，人又不见，联军吃完饭后又撤离了。

还有一次两下正面交锋，忽然讨伐队的后面，也响起了枪声，形成腹背受敌，打得讨伐队，蒙头转向，狼狈不堪。联军为什么对密林山路这样熟悉，据说，是因为山中的鄂伦春人给作向导的缘故。

又听说，有一个夜晚，联军袭击了警察居棚。当时，有个蒙族警察，拿着枪来回摸索，迟迟不缴械，联军认为他有反抗之意，开枪击中其臂，枪支落地，他单手拾起枪支，乖乖的缴了械。这时候有个日本人警尉渡边，听见枪声，就来到棚帐，口

中“八嘎牙噜”（日语骂人的话——编者）的骂个不停，他以为是各旗来的警察，又为赌博闹事开枪。有个警察低声对他说：“红军、红军来了。”渡边并未看准联军人员在那儿，就慌忙的操起一架轻机枪，准备卧倒射击。当时联军抓住他的领子，一枪结束了他的性命。

后来，抗日联军为什么撤离伊列克得林区了呢？据说是江川讨伐大队见到自己不是联军的手对手就想了个绝招，把所有的采伐工人都赶出了林区，把粮食和所有能吃的东西都带下山去，以致联军吃粮发生困难，才被迫离开这里。

抗日联军路经郭恩、卡布楚两屯的情景

敖立山等人口述 敖顺整理

郭恩、卡布楚两屯座落在莫力达瓦旗腾克努图克西北部，两屯相距约八里左右，每屯居住着30户左右达斡尔族人。

一九四一年的秋末冬初，在一个寒风刺骨的深夜里，东北抗日联军由王明贵、王钧带领的一支队伍，来到我屯。部队进屯时，全屯百姓均已入睡。他们一进村，没有惊动老百姓，以和蔼的口气，叫醒了群众：“老乡！不要怕、我们是抗日联军，是打日本鬼子的军队，在这里暂短休息。”老乡们一见这支队伍为数不多，约八十名左右，衣服都很单薄，有的甚至没有穿鞋子，骑的马都很瘦弱，实在走不动了。但是，因为语言不通，群众也不了解他们，带着同情和疑虑的眼光看着他们，也有的躲着，不敢接近。于是他们就讲解抗日救国的道理，并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经他们这一宣传，取得了两屯人的信任和支持。加上这支队伍不打人，不骂人，态度和蔼，群众看出这支队伍是好人，就和他们亲近起来，拉着战士的手问长问短。为了支援部队迅速起程，全屯人民通宵不眠，不分男女老幼全部出动，连夜为抗联战士烧水端茶、做饭，有的替他们站岗放哨。各家各户拿出衣服鞋帽粮食、黄烟等给战士，一面向战士们说：“你们还需要什么只管开口呀！”白发苍苍的鄂维义老大娘（立山的母亲），看见一位十七八岁的小战士，脚上没有鞋，只把麻袋片裹脚当鞋穿。她马上把他拉到炕上坐，把给立山做的“奇卡米”（冬天穿的乌拉鞋）拿出来给他穿，激动地说：“你们太辛苦了，天气这么冷，不穿“奇卡米”是会冻坏脚的，孩子，穿上吧穿上这鞋好打鬼子！”有的自动把自己仅有的皮衣、皮帽送给战士们。郭恩屯老乡佩信保，看一位战士衣服褴褛，他就从头到脚把自己的衣服鞋帽全部脱下来送给战士。卡布楚屯老乡勒莫日根也把心爱的狍皮衣服送给一位战士，这位战士要付款，

他说什么也不收，后来这位战士托一个叫小沃珠的孩子替他到部队取款，小沃珠回来交款时，他感动的说：“我从来未见过这样的好军队。”抗联部队到卡布楚屯后，因语言不通，和老乡们接触有点困难，年仅十五岁的小沃珠，看到此情景自动要求说，“我能听懂汉语，你们需要什么我替你们来回传达。”于是小沃珠变成抗联战士和老乡之间的联络员、宣传员和翻译。六十二岁的敖风兰回忆当年情景时说：“我很敬佩战士们在那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的高度乐观情绪，抗联部队到我家后，在我给他们做饭时，战士们虽在短暂休息中还向我们说快板进行宣传。当时的条件那样险恶，生活异常艰苦，但战士们一个个都是那样地坚定、乐观，对胜利充满着信心。我以感激的心情杀了一只心爱的母鸡，给他们做了芥面“合饸”。

在那艰苦的岁月里，这支抗联部队打游击时，经常断粮缺马，尤其沿途打了几次小仗，敌人在他们后面紧追，敌人的封锁越来越厉害，处境一天比一天更困难，当时急需补充战备物资，特别是能不能搞到粮食、马匹，已经成了部队存亡的大问题。为解决粮马不足，郭恩屯支援了二十七匹马，卡布楚屯支援了五匹马，各家各户又支援很多的粮食、衣物。

黎明之前，在夜幕的掩护下，抗联部队由卡布楚屯出发向东北方向走了。临走时，两屯的达斡尔族人民，扶老携幼，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赶来为部队送行。

当抗联部队离开这里，刚走不远的时候，大批伪军和讨伐队就来了。他们的到来给老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到处是闪亮的刺刀和皮鞭的响声，人们的心头充满着难以压抑的愤怒。讨伐队一进村，向老百姓问抗联的去向时，群众为掩护部队，故意向相反的西北方向指引，实际上部队正向东北方向疾进。这帮口伪军在老百姓面前神气活现，杀鸡宰羊，打人骂人，无恶不做。有一个套爬犁的伪军来到郭恩屯，叫一位老人修爬犁，老人为拖延追赶抗联战士的时间，故意慢慢腾腾地磨时间，伪军气得一个劲

骂，并象一只咆哮的野兽一样，抡起皮鞭，劈头盖脑地打了下去，但老人却默默地忍受了这一切。

在短短的时间内，两屯的达斡尔族人民，接触了两种不同的队伍，和抗联部队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和血肉相联的关系，敌伪军罪行，激起了人们满腔的仇恨。

现在，战火的硝烟早已逝去，敖立山等老年人还经常给屯子里的年青人，讲当年抗联部队在郭恩河一带活动情景和他们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讲抗联战士们当年在那样险恶的条件下不畏艰险、英勇作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对每个青年都是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他们的事迹将永远被我们全屯达斡尔族人民所铭记。

敖立山现在六十五岁，他说：“我78年8月代表我屯达斡尔族人民，为表示感谢共产党、感谢抗日联军，特意到哈尔滨拜访了抗联老领导王钧同志，王钧同志在百忙中，亲切地接见了我们，在交谈中，我们两人情不自禁地想起当年的情景，我向他汇报了现在的幸福美满生活的情况，他鼓励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征途上，要发扬抗联的艰苦奋斗精神，为祖国的“四化”建设多做贡献。”

抗日联军在郭尼屯和日本鬼子

浴血奋战的回忆

敖长青口述 敖顺整理

郭尼屯座落在莫力达瓦旗登特科努图克东部，东南与讷河小居窝棚隔江相望，西与多西浅屯相距八里地。全屯有30户达斡尔族和汉族居民，其中达族为多数，汉族只有六七户。郭尼屯是一个山村，地势险要，村北紧靠一座大山，村南有一片大岗子，过路人不到近前，看不到村子。

在日伪统治时期，这一带劳动人民受尽了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警察的重重压迫，长期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特别是江东的小居窝棚和江西的多西浅两处警察分所，反动气焰嚣张，到处敲诈勒索，民不聊生，达汉两族人民深受其害。两处警察分所隔江不过十里左右，可能是为了阻击和防御抗联部队才增设的。

敖长青说，在我十三岁，徐金十七岁那年，也就是一九四一年阴历七月份，抗日联军的郭铁坚率领的一支小分队，经常在这一带山区活动，同日伪展开了英勇的游击战。有一天分队决定袭击这两处警察分所是其目的。一是为老百姓除害；二是为部队搞到一些枪支弹药；三，为分队活动铲除障碍。于是在七月二十七日晚十点左右，他们悄悄摸进小居窝棚，立即将伪警察分所包围。正在蒙头大睡的十余名伪警察全部被活捉。为避免纠缠，分队带着缴获的枪支弹药，迅速撤出小居窝棚，在屯西高粱地过一宿。第二天早晨分队派两个侦察员化装成农民的模样，到郭尼渡口（鱼房子），通过一位打渔的叫李忠信的，侦察了解经郭尼到多西浅的地形和敌情，李忠信曾多次秘密帮助红军来回渡江。这次侦察员来到鱼房，正好碰上来买鱼的两个警察，（实际是在背后盯梢的），伪警察发现了两个可疑的人，就开始盘问从何处来，向何处去、有无良民证？侦察员回答说：我们是进山搞副业的农

民，来时未带通行证，请让我们过去吧。两个警察纠缠不休，硬逼他们拿出通行证。两个侦察员，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猛地从腰里掏出手枪，对准警察胸口大声说：“这就是路条！”这时两个伪警察吓得瘫了下去，跪着求饶。侦察员了解到这两个警察无恶不做，群众早把他们恨之入骨，不除此害群众过不了安宁日子，他们就把两个警察绑在一起挂上一块大石头，抛入大江里。这一带老百姓听到这两个警察的死讯后，无不拍手称快，都说红军又替我们除了一个大害。

把两个伪警察抛入大江的当天晚上，抗联小分队拟定了夜袭多西浅警察分所的作战方案。郭铁坚率领小分队（28名），奔向郭尼渡口，早已约定好的李忠信在夜间接应他们上了小船，队员一个一个全部渡到西岸上来。十点左右，分队悄悄地进入郭尼村。这时全屯均已入睡，只有郭崔雅一家有灯，四个老头正在炕上玩牌。支队一进屋用和蔼的口气对他们说：你们不要怕，我们是抗日联军，为老百姓打仗的军队，现在我们要打扰你们几家。于是四人各自领回七、八个人，暂时给部队安排了住处。部队进村以后，宣传八路军的抗日主张和民族政策，并向老乡们解释抗联的严明纪律。达汉群众深受感动，给他们做饭、烧水并杀了一口猪慰劳他们，红军无奈只得接受了老乡的盛情接待，并让管理人员一律做价付了钱。群众对他们的秋毫无犯的严明纪律深受感动，都说从来未见过这样的好军队。

红军在郭尼屯休息中间，邻屯郭通明等几个人路经郭尼屯要到登特克屯去办事。碰上了本屯放牧人赵永程，赵就向他们说，我屯有八路军，请不要进屯。与郭同来的人听到此情况后，都在半道回本屯去了。但是郭通明这个坏蛋，不但没回本屯，反而绕道到多西浅警察分所告密去了（郭已被我政府镇压，赵因透漏消息也被压二年）。

在洮河的消息得信儿后，立即派一个33人的分队，四面包围了郭尼屯，午后两点左右开始向老乡家里开枪射击，子弹从南

北穿入屋里。我抗联战士为使郭尼屯免遭破坏和损失，很快离开了老乡家里，撤到屯前小河口。眼看居高临下的敌人火力更加密集，情况万分紧急，红军的阵地无险可守，只依靠在村前的小弯沟，但也在敌人炮火射程以内，容易被敌人控制。北山的东北角，南岗的东南角，这两个制高点是最主要的，打不下这两个山头，就拖不住敌人，而且全分队的生命很难保住。因此，小分队为争夺制高点，五名机枪手不顾生命危险，分别往北山和南岗制高点冲上去。但是，敌人已夺占优势地位，在南北高地夹击的火力下，红军两名战士牺牲在北山的半山腰上，三名战士牺牲在南岗的东南角。激烈的战斗持续到黄昏五点左右。红军在往西北方向突围中，又牺牲了四名战士，受重伤的三名，共伤亡14名。虽然敌人的兵力强大并占据了优势阵地，但红军以不怕死的精神连续退击了敌人的几次冲击，敌人的伤亡也很大，33名敌人被我击毙一半。

狂妄的敌人，满以为在经过一阵猛烈的袭击之后，可以全歼我军，大获全胜，殊不知红军所剩14名战士，由本屯兰田玉老乡冒着生命危险自动掩护伤员突围，机智灵活地隐蔽在山北森林内。这时，敌人的枪声，稀稀疏疏地在阵地上响着，在敌人疲惫不堪的时候，小分队以神速的动作，在夜幕的掩护下，由兰田玉作响导，离开了农村向诺敏河一带深山密林中撤离。

战后的当天夜里，老乡们把未突围出去的三名重伤员藏在西南草甸子上的草里，同时每天早晚，敖富林老乡偷偷来到草甸给伤员送饭、送药。第二天大批日伪军、警察来郭尼屯，把全屯老乡集中起来，逼他们交出伤员，但没有一个人告诉伤员藏在何处。日伪军还领着全屯男女老少，挨家挨户、满山遍野搜查八路军。日寇伪军走后，屯里的达、汉族人民组织起来，把11名壮烈牺牲的勇士尸体一个一个找到后，掩埋在东山高处。并按当地达族习惯祭酒烧纸以示悼念，并暗中在墓前立一石碑作为纪念。

战火的硝烟刚停不久，日寇伪军和反动政府、伪警，到处抓与抗联有关系的人，曾多次护送抗联队伍渡江的李忠信也被小尼窝棚警察分所抓去关押三个多月，兰田玉也因为给红军带路，被多西浅分所扣押一个月。他们被抓进监牢，受了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被打得皮开肉绽，李忠信的肋骨被打折了两条，但他们守口如瓶，始终没有透露出抗联队伍的情况。

敖长青、徐金二同志回忆当时情景时说，抗日联军为了我们的解放，战斗十分残酷，生活极其艰苦，不少同志壮烈牺牲。我们屯里的不少先辈们为抗日事业作出一些贡献，不顾生命危险帮抗联军队、把伤员藏在家里或者当向导，因而被牵连坐牢受到各种酷刑。他们的英雄业绩，永远铭记在我们心里。

记抗日时期盖山和柱占梅的事迹

王淑珍整理

盖山是鄂伦春族一部落有名望的头领。盖山和他女儿占柱梅（现在是鄂伦春自治旗政协委员）曾在一九四一年前后配合活动在呼伦贝尔林区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三支队打击日本侵略者作出了很大贡献。

在旧社会，深受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残酷剥削压迫的鄂伦春族猎民，常年游猎在大兴安岭的深山老林里，过着食不裹腹，衣不蔽身，有病无处医的困苦生活中。占柱梅五岁时，母亲就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不久奶奶和两个姐姐也相继病故，哥哥博勒格布也到别人家当养老女婿，只剩下父女俩相依为命。

一九三八年，占柱梅跟随父亲从呼玛河流域游猎到毕拉河流域。这时，日本侵略者在各族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打击下，为强化其统治，在鄂伦春族部落中实行并屯，并以不并屯不给狩猎所用的枪支弹药进行要挟。盖山对此非常气愤，他硬是统领他的部落拖着不办，充分表现了对民族压迫的反抗精神。

一九四一年七月，东北抗日联军三支队再次开进呼伦贝尔，来到毕拉河一带建立后方基地。当时，三支队队长是王明贵同志（现任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负责人还有王钧（现任黑龙江省视察室主任）、陈雷（现任黑龙江省省长）等同志。一天，王明贵同志从望远镜中发现远处有几个“仙人柱”（是用桦木杆支起的尖状住棚），“仙人柱”附近散放着马匹。他判断这里有鄂伦春猎民居住，立刻派人前去联络，并嘱咐一定要把猎民请来。不久，鄂伦春猎民盖山等四人应邀前来，三支队的同志热情接待了他们。王明贵同志向盖山等人介绍了三支队的情况，并向他们说：“我们只有团结起来，赶走日本侵略者，解放祖国，各族人民才能过上好日子。”盖山等人向部队领导述说了积压在心底的苦闷。共同的民族愿望，使盖山等人在抗联的影响下，走上了与

各族人民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道路，

伪满统治时期，日本侵略者规定谁同情抗联，为抗联送信、带路，若被发现要杀光全屯老弱妇孺。但是这并涉有吓倒鄂伦春人民。盖山利用自己的威望和头领的身份在猎民中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组织猎民帮助抗联做工作。他们有的白天为“讨伐队”带路，故意往没有抗联活动的山林里钻，拖得日本鬼子筋疲力尽。一到晚间还为抗联传送情报，特别是盖山父女不顾生命危险，多次为三支队带路、搜集和传送情报。为解决部队给养，他们常常把猎获的孢子、野猎送给三支队食用。占柱梅和其他几位猎民妇女用孢爪皮、孢筋线缝制猎民常穿的“齐哈密”（靴）“沙拉巴克”（手套）送给抗联战士。占柱梅还常找自己的表妹托托尔金和姑母乌娜吉到三支队驻地，为战士拆洗、缝补衣服。三支队负责人之一王钧同志在一次战斗中腿部受了伤，占柱梅亲手剥下鲜桦树皮里的“吴斗克”（最嫩层），用水煎后洗伤口，使王钧同志很快恢复了健康。

共同的战斗，共同的命运，使盖山、占柱梅和三支队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一天盖山提出要和三支队党委的领导结拜把兄弟。经过三支队党委会研究，同意了他的要求。在一个晴朗的天气，王明贵、王钧、陈雷和盖山等人相聚在一起，由陈雷同志执笔写了誓词，然后插草为香，大家举手宣誓：打日寇、救祖国、不告密、不背叛、同生死、共患难。因盖山年龄较大拜为老大。

此后，盖山曾组织部分猎民协助三支队成功地袭击了日本侵略者的经济掠夺工具——“义和公司”，解放了大批劳工，缴获了大量武器、粮食和其他物资。之后，由他们带路又打下了位于博克图附近的“二十六”号车站。这里有日军的许多仓库，储有大量支弹药、粮食、布匹、汽油、马匹和车辆。三支队将拿不走的全部烧掉，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在袭击“义和公司”后不久，有一次盖山为三支队带路途

中得了“砍头疮”病，当时部队缺少药品，又要行军打仗，王明贵派两名战士护送盖山回家医治。但因无医无药病情迅速恶化，盖山不幸去世。几天后，王明贵率部又一次转战到占柱梅居住地，得知盖山病故，十分难过，他同王肖、陈雷等同志到盖山墓前沉痛祭悼，并拿出三百元钱救济占柱梅。占柱梅因继母去世时留下一个八个月的妹妹无人照管，没有随三支队走，尽管这样，她不忘父亲的临终嘱咐，继续为抗联做工作。

一天，外部落的两名鄂伦春族青年猎民来到占柱梅家，打听三支队的去向。占柱梅感到蹊跷，首先设法稳住了两个青年，然后自己假借找马一口气跑了几十里路，把情况报告给三支队首长。王明贵等人占柱梅一起商量，决定先把这两位青年找到驻地进行说服教育。经过两天的工作，这两位青年终于觉悟。原来，日本讨伐队因到处撒网也找不到三支队，就利用鄂伦春猎民来侦察三支队行踪，但却被占柱梅的高度警惕所识破，日本侵略者的这一阴谋没有得逞。

又有一天，占柱梅长期不见面的哥哥博勒格布突然回来了，还领了七个日本人。博格布在日本人的指使下，软硬兼施逼问三支队的去向。占柱梅说：“我一个姑娘家那里知道什么是抗联”，她哥哥又让她带路，但她不管哥哥如何吼吓，就是不肯带路。

占柱梅同志是一位普通的鄂伦春妇女，然而她做出的事迹确是不平凡的。她的事迹直到一九六四年九月王明贵同志在《黑龙江日报》上发表寻找占柱梅的启事后，才为人们所知。一九八一年十月一日，王明贵同志应邀参加鄂伦春自治旗建旗三十周年庆祝活动集会，他在讲述抗联三支队活动在大兴安岭战斗岁月时，伸出大拇指激动地说：“占柱梅了不起，要是记功，当年应给她记个一等功。”

伪满第十军管区所属部队

投降苏联红军的经过

正珠尔扎布

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当时我任伪满第十军管区参谋长。在这以前，第十军管区派出一批人员去满洲里进行征兵检查，除兵事处有关人员外，还派出一批军官协同工作。司令官郭文林也预定在八月九日赴满洲里视察征兵实施情况。

当时，伪满第十军管区所属部队的分布情况是：骑兵第四团团长金永富上校率领三个连在红花尔基构筑阵地；第四八团团长郭美朗中校率领一个连在哈克附近构筑阵地；普尔布苏伦上尉率一个连在阿木古朗守卫日本军的阵地（后来他们就地投降了苏军）。其余部队则驻在南屯（今鄂温克族自治县所在地）。

八月九日晨五时，我在海拉尔西大街家中刚起床，忽然听到空中轰轰地响，我赶忙起来从窗户朝天上一看，只见十余架轰炸机在西大街上空由北向南飞。我马上意识到这是苏联飞机，因为那时当地日军飞机一架也没有了，显然苏联对日宣战了。我还没查清架数，炸弹轰隆隆地响起来，我本能地缩头往后一蹲，窗户玻璃被震碎飞扬地满屋都是，我幸而没伤。我穿好军装，准备了军用行李，赶快跑到司令部，下了全军准备出动的命令。这时，郭文林也因在去火车站的途中遇到轰炸，中止了去满洲里的计划而来到司令部。

据说驻海拉尔的日军队，在八月八日午夜就得知苏联对日宣战和出兵东北的消息，但是，日军当局没有通知我们。

看到苏联进攻，我就准备向苏军投降。这个想法不是偶然的，因为在太平洋战争上日本军队节节败退，眼看就要完蛋了。日寇被打败，伪满洲国当然就垮台。如果国民党蒋介石收复东北，我的下场不是被捕就是被处死，所以只有投降才是一

条活路。苏联红军进攻东北，对我来说就有了极好的投降机会。我想我向苏军投降，帮助苏联打日本还能立功赎罪，是减轻自己罪责的唯一的好办法。再者，局势的急剧变化，引起部下官兵们思想上激烈动荡，也使我十分不安，我若一意孤行跟着日本打苏联，肯定会被部下打死，这也是促成我走投降道路的另一主要因素。

投降！越快越好！这是我唯一的想法。但怎样进行呢？怎样安排？思想上毫无准备。苏联突然对日宣战，进兵神速，不容我多想，心里不免忐忑不安。

当天上午十时左右，驻海拉尔的日军盐泽师团（师团长已退至兴安岭）派野村参谋传达命令（根据日满议定书，一旦发生战争满军听从驻该地的日军指挥），命第十军管区派主力部队到兴安卡（兴安岭日军阵地）阻止苏军进攻。野村参谋还拿出一瓶酒来，要为日满军的胜利干杯，这时，市里很多地方被轰炸火光烛天，人们奔走避难，乱成一团。

我得到郭文林的同意，下令全军于十日二时由南屯（是第十军管区主力，两个骑兵团、一个炮兵营的驻地）向兴安岭进发。计划第一个目标是锡尼河，到锡尼河后整顿部队待命。九日夜，郭文林和我到南屯骑兵四十七团本部等候出发。屋里只有我们俩时，郭对我说：“参谋长好好想想！”我点了点头没吱声，看出郭文林和我有同样的意思，心里轻快了一些。

十日晨二时，我们向锡尼河出发。刚要渡河（伊敏河），后面就响起了爆炸声。回头一看，兵营的弹药库火焰冲天，轰隆轰隆地爆炸着，破弹片落在南屯附近，我晓得这是日系军官干的勾当。我把高级副官南中校叫来，故意此责了一顿，我说：“谁命令放火的？我们还要补充弹药哩，胜利回来，营房都没了怎么办？”他说：“大概是团里随便搞的。”我也没往下追问。走了好长时间，天还没亮，我趁休息的当儿，大胆地跟郭文林说：“我们准备投降，先得把日系军官全部打死”。郭文林

表示同意。于是，我就在行军途中盘算着如何下手，当时，两个团长都不在司令部里，其它部门蒙系军官很少，各处长都是日本人。部队又分散，万一泄漏机密，跑掉一个日本人，给日本军报告，海拉尔市内的蒙古人定遭日寇的屠杀。最后决定把整个计划先告诉各部队的蒙系军官，然后相机行事。我与副官鄂信台中尉计议此事，他欣然赞同，在这次行动中，他的确起了很大作用。

天亮之后，在行军之际，我把骑兵第四七团的玛克斯尔连长叫来，告诉了他整个计划，并给他一只三号马牌手枪和一些子弹，还让他把这个计划告诉第四八团的伊喜诺尔布连长，他很高兴地拍马走了。部队到了锡尼河后，我又把这个意图告诉了炮兵营的阿拉木斯连长（营长是日系）、宪兵团（宪兵团原来不属军管区管辖，因与宪兵总团断绝了联系，应团长内海的请求而编入的）包俊德上尉，通信队某中尉，辎重队某人，他们都很赞同。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现在只剩下动手的时间和地点没决定了。

部队断断续续地来到了锡尼河。这时，苏联飞机在上空盘旋着，撒下了传单。我对投降后是死是活，苏军能否利用我们，心里没有把握，便拣了张传单，背着人仔细地看了起来。传单指出：苏联红军打日寇，为的是解放被日寇压迫近十四年的东北人民。号召我们打死日本人前去投降。我心里不出的踏实起来。

我们派人去乌兰哈尔嘎尔和海拉尔打探苏军的情况。十日晚，我们在一个小学校的院子里宿营。黑幕沉沉，日系军官这一团那一团，揣着手榴弹不知在嘀咕什么。包俊德和苏伦儿来请示如何下手。最后我告诉他们，明天无论在什么地方，听到司令部枪声一响便动手，并嘱咐他们，要慎重，千万不要一掉一个。我叫苏伦通知玛克斯尔，让他派几个能干的战士来夜袭司令部的日本人。同时我还加强了岗哨，注意日系军官的动向。我和鄂文林、鄂信台三人一夜没敢合眼。

翌日（八月十一日）早八时左右，在锡尼河沙坨子上集合

了全部军官，郭文林讲话后我宣布：“我们先不上兴安岭，暂时在这里占领阵地，摸探敌情，这里地形好，敌人的战车行动不方便。我们如果白天行军，有遭受敌机轰炸的危险，而且到了兴安岭，粮秣的运输也成问题。”我刚说完，炮兵营长大岛少校执着军刀气势汹汹地冲我说：“我们上兴安岭是皇军的命令，为什么不执行命令？”我说：“命令，看情况是可以变更的。”跟着我就喊：“南高级副官到阵地前沿侦察，各部队就地占据阵地，解散。”于是各部队军官都回到自己的部队，司令部也开始进入阵地。

心里正盘算着什么时候下手，突然，玛克斯尔连长带着五、六个军士，手里都拿着匣子枪跑来，他们边跑边喊：“司令官、参谋长快跑，躲开这儿。”我和郭文林、鄂信台拍马就跑，跑出有三百多米，后边一声枪响，接着就乒乒乓乓地响了一阵枪，机关枪也响了。我很惊奇，这还得上机关枪吗？枪声断断续续地响到十时左右，听说都打死了，于是集合部队。我怕汉人对这事误解，请司令官讲话，大意说，我们打死的是日本人，蒙汉人都同样遭受日本人的欺负，他们是我们的仇人，我们蒙汉兄弟要团结起来。这样安慰了汉人。当时我还有这样的想法：现在不能得罪汉人，日本被打垮，将来国民党蒋介石来接收，他们都是汉人，过去我们搞过反汉独立，今后是汉人的天下了，我们要联络他们。后来，我们改变部队的名称，用上兴安蒙汉第一路军的字样，就是这个思想反映。

以后我才知道，因为打死日系军官的事情只有一部份蒙系军官知道，所以枪声一响，士兵就乱了，有的没有防备，被日本军官打死了，有的机关枪被日本军官夺去。厮拼结果，蒙族士兵死了两三人，四、五人受伤。日系军官除跑掉几名外，共打死日系军官和军属三十几人。我们把伪满军的帽章和肩章全部摘下，改变名称，称兴蒙汉第一路军，共有两千多人马。

当天下午，我们派出打探苏联红军情况的人回来报告：南

屯、乌兰哈尔嘎那都有苏军。我们考虑，要是到南屯投降的话，苏日军队正在交战，那里居民也多，不合适。因此，到乌兰哈尔嘎那去投降，正在这时，索伦旗（现鄂温克族自治旗）旗长色仁来了，他是布利亚特蒙古人，精通俄文俄语。由我口述，色仁执笔写了投降书。写毕，当即请色仁当军使到乌兰哈尔嘎那向苏军递交了投降书。

这天夜里十一时左右，色仁回来说，苏军叫我们明晨二点到那儿去，并要打着红旗。全军于是在十二月十一时出发，由色仁领路前去投降。这夜下着雨，天很黑，色仁这样很熟悉路的人也走了弯路。到达乌兰哈尔嘎那已是早晨五点多钟了。先由色仁渡河与苏军联系，交涉结果让我们司令官、参谋长两人先过河（伊敏河），然后部队排成一行，过河后下马把枪扔在地上。我们遵照行事，就这样投降了苏军。

（此文根据正珠尔扎布先生1962年12月26日遗稿整理）

蒙古自卫军五旅参加解放齐齐哈尔 市战役的前后

鄂秀峰

蒙古自卫军五旅，是由原齐齐哈尔地区蒙民自卫大队扩编后组建的。该大队（注一）是由东北民主联军嫩江军区组织的部队。蒙古自卫军五旅下属两个团，六个连，骑兵五个连，步兵一个连，人数约一千名左右。

齐齐哈尔市的地理位置很重要，是近几百年来，北方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上的重镇，从清王朝以来一直定为省会，布置重兵镇守，日本侵占东北后，更以此地为进攻苏联的据点。

—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根据雅尔塔协定，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东北，八月十五日解放了齐齐哈尔市，原东北抗日联军将领王明贵同志也率部进驻齐市。中国共产党中央作了重大决策即：全国战略方针向东北发展，一定要控制东北。根据这一决定，大批干部很快来到齐齐哈尔市，记得有于毅夫、王盛荣、吴富善、励男、朱久、刘锡五、张瑞林、郭维城、王化一、夏辅仁、迟万钧、马识途、王光伟、尚磊等，都是先后来齐市的。他们来了以后和抗联干部一起着手组织各级政权，组建武装部队，进行各项改革，废除旧制，建立民主秩序，安定人民生活。据东北规划为九省的决定，嫩江省省会定为齐齐哈尔市，于毅夫任主席，王盛荣任省委书记兼城防司令部政委，马识途任秘书长，励男任公安厅长，张瑞林任财政厅长。鉴于嫩江省境内有不少蒙古族（包括达斡尔族），根据党的民族政策，省政府内设蒙政厅，第一任厅长是吴尔吉朗（吴为帮），同时组建了省军区，王明贵任司令员，刘锡伍、朱光任政委，下设两个深安旅王化一任一旅旅长，夏辅仁任政委，张××任二旅旅长，另外齐市成立城防司令部吴富善任司令员，又组建了齐齐哈尔铁路分局（属西满铁路局管辖）郭维城任局长兼护路军司令员，嫩江省属

各县均组建县政府和县公安队。于十月中旬根据嫩江军区指示，组建了齐齐哈尔地区蒙民自卫大队，也就是以后扩编的蒙古自卫军五旅。我担任旅长，鄂嫩为旅政委，直接归嫩江军区领导。

齐齐哈尔市自共产党民主联军接管以来，截止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中旬经四个多月的努力，已经建立了各级政权，恢复了民主秩序，努力改善人民生活，受到各族各界群众的衷心拥护和赞扬。

二

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苏联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签定了《中华民国和苏联友好同盟条约》。该条约规定“一俟收复区域任何地方停止直接军事行动之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即担负管理公务之全权。”据此，苏联红军要将东北交给国民党政府。美蒋反动派认为可以利用这一条约束缚共产党的手脚，使之屈服。为此国民党接收大员要来齐齐哈尔市了，据说苏联红军不许东北民主联军抵抗，要和平的完整地交出齐齐哈尔市，以执行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友好同盟条约。

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民主政府和民主联军，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为了顾全大局取得国共两党全面合作，故将已恢复安定实现民主生活的齐齐哈尔市毫无条件的和平的、完整的交给了国民党政府。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国民党委派的嫩江省政府主席彭济群率领一批大员来齐市接收。他们到达后，立即着手建立他们的政府，在省政府内根本不设蒙政厅，不予考虑少数民族的愿望。以往对国民党抱幻想，总认为他们是正统的人，现在看到他们仍然施行民族压迫政策，幻想破灭了，在对比之下，认清了只有依靠共产党才能有少数民族的解放。但是仍有少数人中敌伪宣传之毒，迷信美械化，不相信小米加步枪的共产党能胜利。因此，在国民党进入齐市后就有一些不坚定分子脱离革命，有的逃回家里躲避；个别的投奔国民党光复军。记得我们部队撤出齐

齐齐哈尔市的第三天，在龙江县长岗子屯驻扎期间，一夜之间就逃跑二十多名战士，有的甚至携械逃跑，另外共产党组织的县一级武装公安队中也不断发生叛逃或投奔国民党光复军事件。我们部队转移到阿荣旗境内休整期间，又有一名副排长带走二十多名战士，集体逃到科右前旗被一师三团缴械。

在国民党进入齐市后，我个人也有一番思想斗争，心情矛盾，一则本人出身伪军官受过正规化和系统的军事教育，对军事技术有一定的认识，因而总认为国民党有美国的全力支持、武器装备现代化，后勤充足；而共产党组织的部队包括我的部队只有日伪丢弃的步枪、手榴弹，缺乏武器来源，更严重的是没有时间进行训练（行动作战频繁），因此产生怀疑，带领这样的部队是否能打胜仗，缺乏信心；另一方面，我对国民党的少数民族政策是深受其害而共产党对少数民族是一律平等，在某些方面还给予优先照顾，从而深得人心。在纪律方面，国民党抓丁、拉夫、打骂群众、收编大批土匪，而共产党一切为人民利益上下官兵一律平等。我受命组织齐齐哈尔地区蒙民自卫大队之初，王盛荣同志首先教我学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并要我教战士唱，而且要坚决执行，由于上述原因我坚定了跟共产党革命到底的决心。

我们部队撤出齐齐哈尔后，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下旬（国民党已进驻齐市），通过内部关系，得知苏联红军要雇用一批人员，看守日军遗留下来的仓库，并且指定要蒙古自卫大队的战士去当看守，于毅夫主席把原蒙政厅秘书处主任鄂英海介绍给苏联驻齐齐哈尔市代表都如克上校，光复军占领齐市后苏军找鄂英海联系，后经鄂英海派人专程来我部队驻地联络，我们当时请示了嫩江军区励男同意（撤出齐市后他兼军区参谋长）他指示可以派，将来以此为据点侦察光复军。为此我们派出四十名干部战士，队长是吴文华同志，付队长是多国祥，另派张英海、特格喜巴雅尔、吴自新、鄂景方等骨干人员，这四十名人员徒手去的，武器弹药由苏军发给，并每月发工资（伙食费和零用钱）看守地

点有两处：一是南仓库，方圆二十多华有里专用铁路线，仓库内有草席、食盐、大米、高粱米、药品、军用慰问袋等（绝大部分已被苏军运走），另一处，是市内军用仓库，装的都是汽车零件和其他机械零件。根据龙江县公安局长肖磊同志提供的线索，在南仓库廖机井内发现日军的枪支弹药，我们派去莫尔根巴图连长，利用夜间（白天有苏军军官值班不叫往外搬运）从机内掏出枪支弹药（前后共得子弹六万发、手榴弹和掷弹筒用弹五千多枚）。

于一九四六年二月下旬，嫩江军区下达一份紧急通知，内容大意是苏军应国民党政府彭济群的邀请出城剿匪，实际上就是苏联红军围剿共产党组织的民主联军和地方武装。为此要我们要部队在两天内撤往甘南以北阿荣旗境内，并且要避开公路线。的

三

倪志亮同志率领部队于三月来到昂昂溪，召开军事会议，由倪志亮、刘锡五、王明贵、朱光等同志主持成立了联合指挥部，倪志亮任总指挥，王明贵任副总指挥，我被召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确定解放齐齐哈尔的时间在苏军撤退后。据了解苏军可能在四月未撤出齐市。这时，齐齐哈尔市人民在国民党光复军压迫下，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纷纷派人来请求民主政府和民主联军解放齐市。于是各部队加紧准备，并下达了各部队的任务。我们蒙古自卫军五旅的任务是：从梅里斯以东嫩江流域到卧牛河布防首先要断绝市内交通，防止敌人突围，其次派出警戒部队向李三店、磨菇气方向警戒，及时了解光复军第七旅的动向，另一任务是把在齐市内看守仓库人员交总指挥部侦察参谋指挥，以两个仓库为据点侦察齐市内国民党光复军的布防和动态。根据上述决定我们进行了部署：其一，由于嫩江已经解冻到处可以摆渡和涉渡，为防止光复军偷渡，以屯为据点修防御工事布置监视哨和游动哨，昼夜执行监视断绝交通；其二，派莫尔根巴图为联络员前往昂昂溪负责司令部和旅的联系；其三，派人前往李三店

方向侦察警戒；其四通知给苏军看守仓的吴文华、多国祥岸队长，前往昂昂溪总指挥部取指示，并令其侦察参谋直接指挥。据了解齐市的国民党光复军对出入城检查很紧，对苏军汽车也要查通行证，城内主要街道和重要机关都用沙袋垒工事，巡查队一个跟着一个，摆出一付在市内决战的阵容。齐市内的国民党光复军的武装力量约七至八千人，比较有战斗力的除了彭济群带来的自卫队外，光复军第五、第六旅，其他各县的武装组成二十四个大队都是受降的上匪和各地区逃来的自卫队、警察等，都冠以挺进军、先遣军、光复军等番号，这些乌七八糟的队伍绝大部分都住在市内各牛马圈及小旅店，没有统一服装（从乌市撤出前发了黑色的单军衣），只带袖标，武器用的是日军遗留下来的步枪、手榴弹，很少有机枪更没有重武器。据说光复军有十辆日军的战车（八至十五吨的小、中型），两辆装甲车，这是齐市的光复军概况。

四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一日，我军下达了作战命令，决定于二十二日攻打齐齐哈尔市，各部队的具体行动计划分别下达。命令我部（蒙古自卫军五旅）于二十一日晚进入阵地，坚决阻击一切企图突围之敌和右邻部队加强联系，互助求援。由于国民党政府彭济群首先闻风逃跑，其它光复军认识到守城无望，为此改变了计划，从二十二日午夜起，全面撤退，这实际上就是各自逃跑，多数向榆树屯、炮台屯方面突围，当时遭到围城部队的堵截，大部分被俘或被杀伤，少数逃跑了，十辆坦克车和两辆装甲车全部缴获，由于大江的阻隔在我们防守的地段没有大批光复军前来突围，右邻五团亦是这样，因此没有发生大的战斗，我们只截获零星逃跑的散匪和光复军约五十多名，其中抓到一名自称撤退总指挥的光复军上校李某（名字忘了）他腹部负伤，和其他俘虏一并送交嫩江军区司令部。

解放齐齐哈尔的战斗只进行一天就全部结束。四月二十五日

召开了庆祝齐齐哈尔市重新解放大会。

齐齐哈尔市解放后，我们蒙古自卫军五旅受嫩江军区的命令留下一个教导队约一百八十多名（实际上只有一个加强连）在富拉尔基由莫英宝和徐兰亭负责，进行扩兵和训练以补充部队，外一方面受嫩江军区保安二旅指挥维持地方治安，原守卫仓库的吴文华和万国祥把任务交给城防司令部，领队回归部队。其它由我率领沿宾洲线由齐齐哈尔、朱家坎、成吉思汗、扎兰屯向海拉尔方向挺进，配合保安一旅王化一（他们乘火车）收复沿途城镇。我们于五月初到达扎兰屯时，得知王化一向志率部已到满洲里市。我们部队到扎兰屯的第三天夏辅仁和克力更同志找我，转达嫩江军区和兴安军区的联合通知把我们旅由嫩江军区转属兴安军区和鄂诚同志的部队合并改编为兴安军区第五师。

以上是我个人回忆所及的概述，因事隔多年难免有遗漏或失实之处，请知情者指正。

（注）蒙古自卫军五旅合并成立兴安军区第五师情况：于一九四六年五月在扎兰屯组建兴安军第五师，原蒙古自卫军五旅改编为四十二团和教导团（在富拉尔基留守的教导队扩编到二百四十多名，后为教导团的基干）在莫旗组建的部队改编为四十三团，在扎兰屯组建的部队为四十一团，在磨菇气受降的土匪称伪独立团因人员不到二百人，后在乌兰浩特被缴械遣散。

参加内蒙古自治军五师及 一些战斗情况的回忆

姚凤贤口述 王平记录整理

原纳文慕仁盟第一支民族武装力量内蒙古自治军第五师在党的建军路线指引下诞生了。那时我担任参谋长，兼四十一团团长。回忆起内蒙古自治军五师建立的前前后后，使我想起我们鄂温克人常讲的一句话：星星和月亮在一起，各族人民永远和党在一起。

一九四五年十月末，西满军区派敌工部部长、共产党员夏辅仁同志到阿荣旗建立武装，开辟根据地。

那时苏联红军进驻扎兰屯，民主政权还没有建立，外围的国民党纠合日伪的残余山林队，组成光复军和小股匪徒互相勾结，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特别是光复军的黑七旅企图南移和齐齐哈尔、四平一带的国民党正规军集结，因此，建立一支民主自卫的武装力量已迫在眉睫。

十一月初的一天夜里，有一个鄂温克乡亲老那骑马急驰，从阿荣旗日夜兼程，悄悄越过苏军严密封锁，来扎兰屯见我。

他说：“八路军西满军区指名要你马上回去组织武装力量。夏部长要和你面谈。”

我的心不由的紧缩起来，我在日伪军官学校毕业，曾经在伪满军队里做过事，共产党能信得过我吗？我心里敲起小鼓。

老那说：“夏部长讲，绝对保证你的安全。”

我思忖了好几天，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从扎兰屯步行走了九个多小时来到阿荣旗。夏部长因急事赶回西满军区（甘南县）留信让我去甘南县见他。这儿留下和夏部长一起来的二十多名学兵队队员，他们大多是我在军官学校的同学，我是第一期毕业生，他们大都是十二期和十三期的毕业生，他们由于接受了党的教育，思想开窍早，听说要组织民族武装，个个欢欣鼓舞，鼓励我

为建立自己的民族武装出力。我也目睹阿荣旗一带因没有政权机构，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散兵游勇土匪恶棍到处敲榨勒索，是应该掌握住枪杆子。但对怎样建立自卫的武装力量我连想都没有想过。我抱着观望态度和学兵队的负责人之一乌兰巴特尔（蒙古族）同志骑马在夜里出发，走直路，一个半小时来到甘南县原县公署的旧址。这是两扇黑漆大门，乌兰巴特尔一敲大门。通报姓名，警卫人员马上领我们去见夏辅仁部长。这时已是夜里十二时了，我怕打扰他休息，和乌兰巴特尔同志合计明天再去见他。

这时走来一个文静、潇洒的三十岁左右穿着八路军军服的年轻人，乌兰巴特尔同志介绍说：“这就是夏辅仁同志”！他中等身材、圆脸、红润的面孔，浑身上下焕发着朝气和力量，操着不太重的山东口音：“你来了，太好了”！紧握着我的双手，把我拉到椅子上坐下，又亲自为我倒茶倒水。我的疑惧和惶恐顿时被赶走了一半，他谈的即简明又扼要。他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循循善诱，态度既友好又平和。我第一次听到好多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道理。他从日寇侵华，奴役中华民族，谈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谈到华北及各解放区令人鼓舞的形势，讲到了纳文慕仁盟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他说：“爱国不分先后，爱国不分民族，中华民族要团结起来，少数民族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建立自己民族武装力量。汉族和各少数民族要联合起来，建立自己的新国家。过去的账记在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身上。我们知道你热爱自己的民族，热爱自己的祖国。现在汉人和少数民族的同志都推荐你来搞自己的武装力量，党相信你”。

我再也控制不住，顿时热泪盈眶。第一次感到平等和受人尊重的民族自豪感。我们整整谈了一个通宵。临走前，他告诉我：“王司令员还要见你。”

“谁？”我禁不住惊异了：“就是当年威震东北的抗联的英雄王明贵？”

“是啊，王司令是你们东北人”夏部长点了点头，又转身叮

嘱我“先睡一觉，明天我们继续研究武装力量的组建和一系列方针政策问题。”

早餐后，夏部长带我去见王明贵司令员。王司令员高大魁梧，说话直爽，不绕弯子，他先讲了几句话，他说：“咱们是打出来的朋友，过去的帐就算让大风刮跑了。咱们都是嚼着黄连根长大，把脑袋掖在腰带上的带兵人，过去的一笔勾销，重新立账”。

接着，王明贵同志又问：“阿荣旗少数民族多不多，他们的生活怎么样？有多少枪，开始能拉出多少人？”我一一做了回答。

接着西满军区副政委刘锡五讲了东北解放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特别是讲了组建民族武装的意义。

然后我们坐下来一起确定建立民族武装力量的方针和政策。王明贵司令员攥起了拳头，用力一挥，说：“蒙、汉和少数民族要团结一起，攥成一个拳头，为穷苦人打江山。”他那大将的风度和对未来必胜的信念，深深地激励、感染了我。

当天晚上，王司令员亲自给我发了八路军军服、手枪，并初步定名叫阿荣旗自卫队，我感到无限光荣，终于成了人民的战士。

我到回阿荣旗那吉屯后，根据党的指示，深入到鄂温克猎民中去，广泛地进行发动，学兵队员成了骨干，经过耐心细致地组织动员，把布特哈旗和阿荣旗有枪的猎民组织起一个六十多人的队伍。我们还派人到莫旗和齐齐哈尔达斡尔族自发的武装队伍去做工作，最后这两个地区也派来代表，夏部长苦口婆心地和这些代表一个一个地谈话。又派人到这些地区对部队战士做动员。经过三四个月的酝酿协商，三个地区的自卫队实行联合。于一九四六年春天，成立了纳文慕仁盟蒙古自治军第五师。三个地区的自卫军分别确立为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三个团的建制，经过党培养教育的学兵队员大都在基层连队担任连长和指导

员。

一九四六年九月，内蒙古自治军来电报正式批准为纳文慕仁盟自治军五师。师部设在扎兰屯，当时，五师师长是鄂嫩日图同志，政委是朱志秀同志，我担任参谋长并兼四十一团团长。

当时的斗争形势十分尖锐复杂，我们这支队伍如果没有党的领导，那是一步也前进不了的。我们除了受西满军区司令部驻扎兰屯办事处的领导，还直接和西满军区司令部联系，并架起了由甘肃通往阿荣旗那吉屯的电话线。

我们这支民族武装力量建立后，第一件事是剿匪，整顿维护社会治安。

当时的光复军黑七旅活动猖獗，还有大小各种土匪二十多伙最厉害的是一个外号叫红毛子姓胡的土匪头子。他的队伍有三十多人，都使短枪。这个叫红毛子的人双手使枪，骑马技术高超，神出鬼没，到处骚扰。屯落里的老百姓一提红毛子来了都惊恐万状，我们配合西满军区战斗了两个多月，土匪在屯子里已绝迹，都跑到山里去。我们发扬人民军队勇往直前的战斗精神，穷追猛打消灭了大小几股匪徒，并捉到了红毛子，交给了人民处理。这样不仅维持了社会治安，还配合了路军在部分地区开展的减租减息斗争顺利进行。

一九四六年三月五日，苏联红军撤走，光复军的黑七旅要乘机攻占扎兰屯。我们据报西满军区密件指示，立即出动便衣120人进驻扎兰屯，占领车站、邮局、银行、酒厂、油坊等要害部位，另外在外围留守一百七十多人驻守，以防光复军。随着民族武装力量的壮大，西满军区司令部先后两次在齐齐哈尔和富拉尔基召开联委会议，指出我们五师的任務主要是剿匪，维护社会治安，保护工作组开展减租减息，建立地方政权。当时古伟同志和陈立新同志分别率领工作组在阿荣旗和兴安旗一带开展工作，以后这两个同志分别担任阿荣旗和兴安旗的第一任工委书记。

国共谈判破裂以后，国民党军队和八路军在通辽四平一带拉

锯，我们的任务是牵制光复军黑七旅南下去和国民党正规军汇合。我们在四六年的冬天，主动向驻在蘑菇气一带的黑七旅发起了进攻，这个黑七旅有一千多人，使的完全是日本的枪炮，又是骑兵。人员比我们多，装备比我们强，我们使用的都是老式步枪，没有一件重型武器，加上天气寒冷，大部分指挥员和战士由于给养供应不足，穿不上棉衣。我们打了七天，也没攻克蘑菇气。西满军区派旅长王化一同志赶来增援，重新部署。第一次进攻，就把黑七旅打散，其中一部分人骑马或者坐上汽车南下，西满军区司令部命令我们派骑兵去堵截，追了一天，在扎赉特旗大山前的峡谷中，我们封锁住山路，迫使光复军退回朱家坎子野猪窝一带，我们打了一个大胜仗，歼灭敌人一千多人，打死了光复军一个少将，黑七旅旅长宋某也被击毙，缴获了一辆汽车和山炮、日本平射炮、速射炮、迫击炮多门，受到上级的表扬。

这支民族武装建立后，经过党的培养教育、整顿，逐渐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经过大大小小战斗的考验，不断提高了无产阶级觉悟，增加了战斗力。一九四七年改名为蒙汉联军，不仅保卫了土地改革斗争的进行，还参加了著名的四平战役、辽沈战役，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一九四九年八月一日，举行了隆重的命名典礼，正式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斗行列。

鄂温克族自治旗解放前后的情况

宝敦古德·阿必德

鄂温克族自治旗，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的纯牧区。1689年清朝政府先后同沙皇俄国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和涅格特条约，根据条约规定，在蒙古地区划定边境，两国在各自的边境上设立边卡。当时的呼伦贝尔地方是荒无人烟的原野，原因是在十七世纪年间，蒙古民族的统治者之间发生内部冲突，所以在这一带居住的蒙古族逃散到大兴安岭南部的嫩江一带，一部分去现在的昭乌达盟和乌兰察布盟地区；一部分迁到鄂嫩河、贝加尔湖南部地区。清朝政府为了要设立边卡军队，决定移民充边，由布特哈地区迁来少数民族编制军队。雍正十年（1732年）由布特哈地区迁来了索伦（鄂温克）、达斡尔、巴尔虎等3766人（其中鄂温克1636名、达斡尔730名、巴尔虎275名、鄂伦春357名）从中选出三千名壮丁，编两翼八个旗五十个佐，执行边卡军的任务。

为了解决移民的生产和生活问题，从达日岗嘎地方的国有苏鲁克给他们15735匹马、9734头牛（每头按五两银子计算，共付买牛价钱48685两银子）另外又给95140只羊。

同年，额鲁特首领斯布登旺宝、佐领阿由喜等人领导的两个佐，也被派迁到呼伦贝尔草原。给他们的迁移费和生活费是一千两银子。乾隆五十五年（1790）杜尔伯特太吉布特和布仁、嘎拉吉德太吉达喜泽格伯、明安部的布吉日等人领导的三姓额鲁特也迁到了呼伦贝尔。在这些额鲁特中选出一百名壮丁和执行边卡任务的哨兵，当时额鲁特的人口数字不清楚，据说有一千多名，在1897年副都统衙门调查户数为185户，男227、女230，计457人。他们成立了额鲁特旗。

1918年在索伦左翼两个旗的巴尔虎部，离开索伦左翼四旗单独成立了陈巴尔虎旗。

俄国十月革命后，一九二二年从苏联来到呼伦贝尔锡尼河定居的布里亚特蒙古有三千多名，还有鄂温克五百多名，成立了布里亚特旗。陈巴尔虎出去后，所剩的就是现在的鄂温克族自治旗的基础。

一九三二年末，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呼伦贝尔后，为便于殖民主义的统治，于一九三三年（伪大同二年）取消了原来的行政编制，将索伦左右八旗、布里雅特旗、额鲁特旗合并，成立了伪索伦旗，旗公署最初设在海拉尔，不久就迁到南屯。任命了当地人为旗长，但有职无权，不过是个傀儡而已，一切大权掌握在日本人的参事官手中。一九四三年又将原来的基层组织改为北辉索木、南辉索木、莫和尔图索木、巴彥托海索木等九个索木，两翼的副总管和布里亚特与额鲁特旗的副总管为伪旗参领（当时各总管已经安排别的职务而不存在）设立了佐公所（索木公所）。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下，警察特务横行霸道，南屯的人到海拉尔买东西或办事，串门也要到警察署在居民证上签字，经警察分所查验才敢去海拉尔，否则就要遭到警察的打骂、拘留或处罚。

人民的生话更是在死亡线上挣扎，生活必需品实行配给制度，吃的是发霉的包米面，穿的是“更生布”，穿不了几天就坏了。各种疾病蔓延，莫和尔图、辉河、伊敏、南屯等地伤寒病到处流行，很多人死亡，有的全家人死亡。再加之性病泛滥，致使人口下降。日本人以所谓“出荷”的名目，掠夺大批的牛、马、羊，还按照牲畜头数定数量征收各类皮张、羊毛、牛奶等畜产品。如果不完成任务，则以违反战时经济法论处，受到惩罚。

一唱雄鸡天下白，一九四五年秋祖国光复了，解放了的呼伦贝尔向何处去，这是当时的一个大问题，也是鄂温克族各族人民的一个大问题。

当时苏联红军解放了东北，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蒙古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影响传进来了，人们见到了马、恩、列、斯以及乔巴山的肖像，和他们的某些著作；国内革命形势迅速发展，不少在海拉尔地区有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著作，如《论联合政府》、《论解放区战场》等，多年受日本帝国主义压迫的各族人民，尤其是中青年知识分子，向往革命，向往民主、平等、自由。解放当时，呼伦贝尔地区出现了欢庆解放、欢呼自由的一派节日景象。但当时，在旧职员、旧知识分子中的某些人，公开的和秘密的组织了各个派系，要搞“事业”，各自扩张本派的努力，一时闹得相当起劲，如有的组织了“哈达派”等秘密组织，一些年轻的知识分子也参加进去了，但不久，他们从实践中认识到要想真正干革命绝不能在这些派系中胡闹，自动脱离这些派系，投身到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中来。

一九四五年十月末，呼伦贝尔成立了呼伦贝尔自治省政府，主席是伪兴安北省省长额尔钦巴图，还有不少伪满时期当官的索伦人在自治政府里作负责工作。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东北行政委员会批准，成立了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仍以额尔钦巴图为主席，贡果尔扎布为副主席。

一九四七年五月成立了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同年十月在海拉尔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呼纳地方工作委员会。一九四八年元月取消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成立中共呼盟工委，正式归于内蒙自治政府管辖。吉雅太同志被任命为书记，呼伦贝尔地区正式地公开地受党的领导，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等有关群众组织。在党的培养和教育下，广大青年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解放初期参加各种派别的各族青年相继脱离那些派别组织，接受了党的领导，积极参加了革命工作。党很重视对牧区青年的培养教育，把不少青年选送东北军政大学和内蒙古军政大学，培养出了很多青年积极分子，这些青年成了呼盟革命的骨干分子，其中鄂温克族的青年也不少。

据党的牧区民主改革时期的具体政策由上而下改造的方

针，一九四八年五月，原索伦旗长内勒布辞职，党派去从东北军政大学毕业的青年共产党员孟和那苏同志当了旗长，因而旗一级政权掌握在共产党手里，在上一级党委的领导下，团结各族人民进行了民主改革。当时旗政府工作人员情况是：旗长一人，设有秘书科、财政税务科、牧业科、民政科、供销科以及公安局和公安队，大约有四五十人。索伦旗管辖有巴彦托海、巴彦嵯岗、锡尼河、伊敏、辉河等五个索木，和哈克、扎罗木得、免渡河等三个区，居住有鄂温克、蒙古、达斡尔、汉族等民族，约二万人口。

解放初期的索伦旗各族牧民，因遭受日本帝国主义十四年的掠夺，生活非常困苦。当时在农村正在进行土地改革，一些流言蜚语纷纷传起，说什么牧区也快要分牲畜，要清算斗争啦等等。牧民思想很波动，加上伪满时期的日本特务等反革命分子利用这个机会煽风点火，抢劫牧民的牲畜、财产，恫吓革命干部，诱骗和威胁少数不明真相的牧民跑到林区潜伏。如日本特务巴拉迪·巴特扎布、伪军官乌兰扎木苏荣、反革命分子斯日特尔、安迪等人，勾结新巴左旗跑来的乌恩和等人，猖狂活动，大肆破坏和骚乱。针对这种情况，按照呼盟工委的指示，在旗的直接领导下，各索木大力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对那些逃跑者的家属进行耐心说服，动员他们说服自己的亲属回来安心生产，政府绝不问罪。盟和旗领导又派索木达阿必德等人去林区找逃亡分子头头谈话，宣传党的政策，规劝他们回来，经过各方面的工作，不少人回来了，交出了武器回家生产。但是日本特务巴特扎布和伪军官乌兰扎木苏荣等少数反革命分子仍坚持反革命立场，带几名坏分子跑到乌旗东部的乌那盖河地区，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不久内蒙骑兵队全部歼灭了他们，反革命分子斯日特尔、安迪等人潜伏在兴安岭深处，索伦旗的自卫队将他们逮捕归案。

一九四八年在那达慕大会（旧甘珠尔庙会）的开幕会上，中共呼盟工委书记吉雅太同志宣布了党在牧区执行不分不斗不划级、人畜两旺等政策。此后，牧民认识了党的政策解除了思想顾虑。

虑，牧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牧业生产发展的比较快，牧民的生活也得到逐步的提高。民主改革顺利开展，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解放当时索伦旗大约有六万多头（只）牲畜，一九五二年末发展到十三万七千多头（只）。在锡尼河索木，牧民认识了牲畜改良的好处，积极地着手大畜的改良工作，因而改良牛马的头数很快地增加了，随着生产的发展，各方面的工作也好转起来了。

过去的鄂温克地区的教育是很落后的，南屯以外的牧民儿童几乎都不能上学。一九四七年牧民自愿出钱修建小学，儿童开始受到教育，当时青年和中年人几乎全部是文盲。一九四八年开展了在中、青年牧民中的扫盲工作，效果很好。在一、二年的时间里，大部分都识字了，有的人当了干部。

一九五二年，索伦旗锡尼河牧民自愿集资成立了供销社，这是我鄂温克草原上的第一个半社会主义性质的供销社，对牧民的生产，生活起了积极的作用。深受牧民的欢迎，有的牧民一户就加入了一千只羊的股份。

旧社会牧区泛滥各种疾病，人口不断地下降。解放后，党采取了果断措施，成立了大型的驱梅医疗工作队，派到牧区，彻底地消灭了性病。牧区的人口很快的增加，出现了人畜两旺的景象。牧区人民歌唱共产党的歌声响彻了鄂温克草原的上空。

鄂温克旗的各族人民，在清朝政府、国民党的民族压迫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法西斯统治下，长期在一起生死与共，紧密地团结，结成了兄弟般的血肉关系。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更加团结互助，共同努力为建设繁荣昌盛的鄂温克族自治旗贡献力量。

一九五八年八月一日，根据聚居的鄂温克民族的具体情况成立了鄂温克族自治旗。

“九·三”后扎兰屯地区情况

包德华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苏联红军先遣部队在八月十六日通过扎兰屯。这时扎兰屯伪满政府的职员、警察、特务等都跑光了，二十五日苏联后继部队进驻扎兰屯，边防司令员哈尔·钦克夫、宪兵司令员尤金，立即发出联合布告，宣布暂行接管条例，命令当地各机关、单位工作人员照常上班，伪镇长志达等勉强出来应付。

这时国民党政府东北行辕主任派黑龙江省接收大员肖达三，接管该省军、政事务，扎兰屯也出来一批投机分子，其中伪兴安省协和会本部部员张旺跑出来积极活动，暗中联系黑龙江国民党组织，把布特哈旗改成雅鲁县，吴宪茂当县长，梁桂富为警察局长，张旺担任县总务科长，金声为县保安大队长。这些人准备将雅鲁县划归黑龙江省，但计划未成，雅鲁仍归兴东地区领导。长军又派出国民党东北挺进军第一军军长马川跃来中长铁路沿线扩大军事力量，马川跃在长春至满洲里的铁路沿线共组织了九个旅的兵力。他们认为扎兰屯地区是这条铁路线的重点地区，所以在布旗境内就组织第一、六、七三个旅的兵力。第一旅在扎兰屯附近，吴玉言为第一旅长，第六旅长尹影甫，第七旅长宋通山。他们两个旅盘踞在蘑菇气一带，这些军队在地方无恶不作，抢草抢粮，杀害良民。有一次突然袭击了萨马街乡屠杀少数民族农牧民二十三人，其中打死该乡两级小学校校长沃勒吉图，匪军惨无人道，一刀刺死娘儿三口人，匪军惨绝人寰的血腥罪行，造成了民族间严重的裂痕。他们更积极准备等待苏军回国后妄图占领扎兰屯地区。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六日，内蒙古东部召开东蒙自治人民代表会议，会议由博彦满都等人主持，来自东六盟的农牧民代表二百多人参加会议，会议宣布成立东蒙人民自治政府，选博彦满都

为主席，哈丰阿为付主席，阿斯根为军区司令员，会议又选出中共代表胡秉权为军区政委，大会公布了自治政府组织法、施政纲领等文件。会议结束后，我们兴东地区代表们回到扎兰屯后积极筹备建政建军工作。

同年一月间，鄂嫩日图、吴泽民等在齐齐哈尔乡公安小队的基礎上积极扩大了人民武装力量。并在黑龙江省主席于毅夫和王明贵等领导人的大力支持下，拨给一百五十支步枪及轻重机枪等武器弹药，并帮助组织了一个旅的兵力，鄂嫩日图为旅长。根据黑龙江省人民自卫军的番号编为第二旅，驻在布、阿两旗境内，很快消灭了在附近地区流窜的冯玉田为首的反动地主武装，继而又将梁有才等百余人的匪帮全部消灭，缴获了很多武器、马匹，扩大了自卫军的力量。同年三月间在黑龙江军区的积极支援下与黑龙江人民自卫军副司令员张汉臣为总指挥，鄂嫩日图为副指挥，组织二千余人的兵力，将盘踞在布旗境内的国民党挺进军第六、七旅打出去，该匪逃奔敌占区郑家屯。以后又继续肃清了扎兰屯附近的第一旅吴玉言的反动武装与“扫北”等股土匪。

一九四六年四月，根据东盟自治政府的指示在扎兰屯召开了纳文慕仁人民代表大会，来自原布、阿、莫、巴四个旗与其它地区少数民族代表一百余人参加了会议，由金跃洲主持了会议。会议宣布成立纳文慕仁盟政府，选出金跃洲为盟长，中共代表苏林为参议长，敖玉祥为总务处长，会议决定代表们回去后继续积极扩大人民自卫武装力量和建立各级政府。但是虽然盟政府成立了，扎兰屯地区仍存在雅鲁县的伪组织，有些政策仍然行不通。不久一一四月二十八日午后九时，苏军归国，雅鲁县吴宪茂为首的主要成员都跑了，这样，纳盟自卫军第二旅进驻了扎兰屯。

这时，内蒙宣布解散东盟自治政府统一成立了内蒙古自治区运动联合委员会，乌兰夫为主席，哈丰阿为副主席。纳盟自卫军

第二旅根据内蒙军区指示改编为“内蒙古自治军第五师”，鄂嫩日图为师长，中共军事代表朱子修同志为第五师政委。中共黑龙江省委与军区经党派军政高级领导干部如王盛荣、刘锡五、张第、王明贵等来帮助和指导各项工作。四八年夏季，夏辅仁同志来纳盟开展土改工作，首先在莫、阿两旗开展起来。于是纳盟军政工作迅速发展，工农业也都开始恢复生产。

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在中国共产党的热情支持和正确领导下，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乌兰夫为主席，哈丰阿为副主席，阿斯根为内蒙古自治区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派刘春、张第、胡昭衡等大批高级干部来担任政府领导工作。

自治政府成立后，很快把东北军大毕业生与干校毕业的青年分配到各盟，这批青年干部来到纳盟后，立即积极地参加各条战线工作和斗争，宣传党的各项政策和没收敌伪财产，这时中共内蒙党委又任命夏辅仁同志为纳盟副盟长兼铁路军事代表。克力更同志为扎兰屯分区工作团团长兼第五师政委。四七年下半年夏辅仁同志抽调在阿荣旗搞土改的王恩同志组成布旗土改工作团，全面地开展了布旗的土改工作。从此，贫苦农民才真正得到了翻身当家作主，尤其是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的民主政策和无微不至的关怀下，真正得到自由平等，生活逐步得到了改善，实在是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少数民族的彻底解放。

解放初期《呼伦贝尔报》

（蒙文版）出版情况

杨·布图格奇

1946年5月，内蒙在乌兰浩特市成立了兴安省。当时，根据解放战争的需要，为了建设大后方，在当年的六月份，决定迁往海拉尔市。由铁路方面给组织一列专列，兴安省机关的成员及其家属，还有克力更同志一起来到海拉尔市。我当时亦乘坐了这趟专列。同车运到海拉尔的还有当年四月份东北民主联军第一次解放长春时带到乌兰浩特的印刷机。到海拉尔以后我就着手修理厂房（现在呼盟民族歌舞团楼南的几栋家属宿舍），安装机器。这些工作基本就绪后，在当年的8月份成立了呼伦贝尔出版社，出版蒙文版的《呼伦贝尔报》。当时，委派玛尼扎布同志为主任，负责全面的领导工作。我与锐锋同志负责车间工作，另外还有技术工人宝勒绍布（已故）和那仁满都拉同志（女），以及几位鄂温克、达斡尔族青年工人组成了报纸的拣排、印刷队伍。

印刷设备除伪满青旗报社的（32页印刷机一台，12页印刷机一台、铸字机一台）以外，另有东北民主联军在1946年4月份第一次解放长春时，由后勤部李富春的护照批给内蒙的印刷机。当时内蒙想要制革机，因为找不到技术人员，所以在护照上指定的伪特殊印刷株式会社、监狱印刷厂拆卸了二十几台各种印刷机（铅印平台15台、铸字机1台、胶印机2台、制版机2台）。当时出版报纸只用其中的四台，其余部分内蒙古日报社、呼伦贝尔报社、牙克石报社、通辽市印刷厂、贝子庙印刷厂等分用。

当时出报需要铸蒙文铅字的蒙文字模子，这在伪满统治时期是很缺少的。解决蒙文字模子是个难关，恰巧锐锋同志在东北

光复时，从工厂带出一套解决了这个问题。

大约是在1946年冬季出的报，开始是周刊，以后是四日刊，报纸是八开的，每期大约是一千份左右。呼伦贝尔报（蒙文版）出版到1948年夏季停刊了。停刊是因为内蒙古日报社出版了蒙文报，编辑人员都调到内蒙古日报社工作，而工厂仍留在海拉尔市（此厂在1954年内蒙古日报东部版印刷厂迁来海拉尔时与之合并），转为地方服务，印刷社会需要的印刷品。1946年冬季，毛泽东同志发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文章公布后，当时呼盟地委书记吉亚泰同志指示出版社，并将我找去，提出要印制这篇文章，供海市地区职工人手一份。当时工厂只有蒙文铅字，在没有汉文铅字的情况下，在海市找到了石印和石印工人师付完成这项任务，共印四千份。

1948年冬季，东北战场形势好转，内蒙开始安排蒙文教科书，汉文课本在东北排印，蒙文课本得自己印制。当时在乌兰浩特市印刷设备不足，白天又没有动力电，内蒙古日报社派人（指导员：色道尔吉，工人：孙庆林、嘎尔迪等）来我厂赶印教科书。当时我在12月末之前，在室外露天突击安装从长春带来的印刷机。于1949年2月末，才顺利完成了这批教科书的印、装任务。这批教科书是解放后第一批教科书，就这样在海拉尔市生产出来了。在完成这批教科书的任务之后，原呼伦贝尔出版社印刷厂的工人大部分调到内蒙古日报社印刷厂（我也在其中）工作，一部分印刷机也调拨到内蒙古报社印刷厂。

《呼伦贝尔报》蒙文版排版和印刷过程中，材料不足，同时在电力不足的情况下，大家千方百计地想办法。铅字不足，只好排一块印一块，印完一块，再排另一块。一份八开的小报，前后两块版得排两次印两次。没有铅条用纸片代替，没有5号一倍铅空，就用2号2分中间断开用。当时海市白天没有动力电，印刷机就用手摇，载纸用手刀切。职工工作都是不分昼

夜，团结互助完成了任务。

记得当时在待遇上，参加工作早的是供给制，晚的都是每月给点津贴，仅能维持个人的生活费用，但大家工作情绪都很饱满。

1947年苏林同志出面在海拉尔市开始建政时，组织了各阶层代表参加的参议会。在参议员中有十名工人代表（其中有谭俊、范继先等同志），其中分配给呼伦贝尔出版社印刷厂一个名额。工厂的同志们推选我去参加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产生了第一届海拉尔市民主政权——海拉尔市政府。

以上是我回忆所能记得的一些情况，很不全面，请了解情况的同志补正。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呼伦贝尔文史资料选编第二

作者 =

页数 = 1 3 7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目录
正文